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車臣、新疆與菲南之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活動—
文明衝突在伊斯蘭文明斷層線之再檢視



指導教授：邱穎壤博士

研究 生：劉宇軒

學 號：99922016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論文考試委員簽名頁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劉宇軒 碩士學位論文

車臣、新疆與菲南之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活動－文明
衝突在伊斯蘭文明斷層線之再檢視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論文考試委員

江流輝

胡瑞舟

邱穎壤

指導教授

邱穎壤

系主任

江流輝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7 日

研究生論文文責自負聲明書

本人 劉宇軒 瞭解並保證所撰論文完全遵守著作權法及學術倫理，師長業已善盡告知、監督暨審查之義務。論文倘有抄襲、改作、妨礙他人著作權，或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之情事，及衍生相關民刑事責任者，概由本人負責，與指導教授、論文考試委員及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专班）或其他師長無關。

論文題目：車臣、新疆與菲南之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再活動－文明衝突在伊斯蘭文明斷層線之再檢視

指導教授：邱穎壤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聲明人：劉宇軒

學號：99922016

簽名：劉宇軒

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請以正楷書寫)

謝 誌

—謹以此論文獻給我最親愛的家人—

論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邱稔壤老師，願意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並花費無數時間、心力指導我。老師除了在學業上的諄諄教誨，同時也是我的人生導師，屢次為我提供事業與生涯規劃的指南與方針，老師是我的良師益友，更是我生命中的貴人。老師招牌親切的笑容與幽默的話語與回憶令我難忘，而在政大綜合院館樓下咖啡座及 Yummi Hub 咖啡館向老師請益學業的時光，是我在政大最難能可貴的收穫。誠摯感謝老師這段期間的指導，這篇論文如能對相關研究領域有些許貢獻，都是因為老師指導有方；至於本論文的缺失，則是因為我的資質愚魯，能力不及所致。

感謝本論文的口試委員胡瑞舟老師、汪毓璋老師及本論文計畫書的審查委員連弘宜老師，您們的專業與建議讓本論文更為完整。此外，在政大上課期間，另必須感謝林正義老師對我的鼓勵與耐心，不厭其煩回答我的愚蠢問題；感謝 99 年入學的政大外交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在職專班同學們，特別是才學兼備的大學長祝立宏對我的關心與問候；令人稱羨的賢伉儷曾程、夢庭的溫暖友誼與經驗分享；求學路上與清安的相互砥礪與切磋。在政大學習的日子轉瞬而過，我很珍惜各位師長及同學們的情誼。另特別感謝國中同班同學兼老友陳威志博士在國外進修期間仍提供給我許多關於本論文的文獻參考與寶貴意見。

此外，我要感謝曾經共事過的辦公室長官、同事們的體諒與協助，讓我自考進研究所開始，能在工作、學業與家庭間處於平衡的狀態，首先要感謝警政署國際組曲來足組長、張文瑞副組長、李日彬科長及林妙齡科長支持我報考就讀政大外交研究所的決定，並讓我在工作之餘兼顧家庭與學業；感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外事科邢一民科長、柯政君專員與蔡佳華股長在我撰寫論文期間全力的支持與照顧；感謝曾共事過的警政署國際組學長姐以及新北市外事科的同事們，在我上課期間對業務上的幫忙與對本論文所提供的建議，能成為您們的部屬、學弟及同事是我的福分。

感謝我最親愛的爸爸、媽媽以及姊姊，感謝爸媽從小對我的細心照顧與課業

指導，我才能一路長大並取得碩士學位，以及在我育嬰留職停薪結束後，願意接手幫忙照顧品序，使我能無憂專心於工作及學業；感謝姊姊、姊夫、沛綻、震緯對我及弟媳、品序不時表達關心與問候；感謝岳父、岳母、阿叔、駱姊、姊夫及暉騰來自高雄的溫暖，高雄人的熱情常常讓我跟品序念念不忘，每次一有長假就想往高雄跑；感謝品序在這麼幼小的年紀就能體諒爸爸要寫論文無法陪伴他玩樂的心情，願意自己在客廳玩耍，雖然有時也不忘跑來敲書房的門進來調皮搗蛋一下，看我有沒有真的在讀書，品序想跟爸爸玩的渴望(或是其實我更想跟品序玩)更堅定我要趕快把論文完成，走出書房的念頭。台北和高雄的家人們的支持總是給我無比的力量與勇氣，而您們所給我的人生智慧則是我無窮的寶藏。

最最感謝一生的摯愛姿螢，特別是最後1年撰寫論文期間，在星期六日放假時全心全力協助照顧品序、專心於家務，讓我在書房認真用功，而在我撰寫論文遇到瓶頸時，適時提供我建議，我才終於能把論文完成。謝謝老婆大人的支持與鼓勵，未來我們還要一起努力加油，攜手共度人生直到白首。

摘要

本論文藉由研究車臣、新疆及菲律賓南部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活動之成因，檢視文明衝突理論在個案之適用性。首先從個案衝突發展之歷史背景著手，再以資料庫檢視內部衝突之原因，最後檢討內部、外部因素及種族政治因素對個案衝突的影響並做出文明衝突理論並未比其他政治性因素更能解釋衝突產生之原因的結論。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1)未發現「文明衝突」對個案衝突具一致性的解釋力，衝突的發生與個案歷史背景、種族文化、內部及外部政治因素有關。(2)宗教的教義是可以被政治所影響的，甚至是為政治而服務的。(3)國家與團體的「利益」仍為影響衝突發生之重要因素。(4)個案專制或民主政體內部因政治體制的不同，使得人民在選擇衝突的形式上會有所不同。(5)雖然同屬伊斯蘭教，同時具有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但個案恐怖主義活動發展現況並不相同。(6)「文明」的分類過於簡化。(7)個案確實存在文化上的衝突，但不至於演變成全球性的「文明衝突」。(8)伊斯蘭教本身並非恐怖主義的溫床，但確實有分離運動或恐怖主義組織利用伊斯蘭教來團結群眾、招募人力、獲取國際資金來源或鞏固其領導勢力之情形。

關鍵字：文明衝突、分離意識、恐怖主義、車臣、新疆、菲南

目 次

目 次	I
表 次	IV
圖 次	V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6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9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0
第二章 文明衝突、分離意識及恐怖主義之探討	11
第一節 文明衝突的爭辯	11
第二節 文明與分離意識	20
第三節 文明與恐怖主義	24
第四節 小結	31
第三章 分離意識與恐怖活動之歷史背景	32

第一節	俄羅斯加盟共和國—車臣	33
第二節	中國大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38
第三節	菲律賓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46
第四節	小結.....	51
第四章	衝突量化數據整理與初判	54
第一節	風險少數(MAR)資料庫所載個案衝突.....	54
第二節	國家失敗問題集資料庫(PITF)所載個案衝突	59
第三節	戰爭關聯計畫(COW)資料庫所載個案衝突	63
第四節	蘭德公司恐怖主義年表資料庫(RAND)及研究和應對 恐怖主義國家聯盟(START)資料庫所載個案衝突	66
第五節	小結.....	75
第五章	衝突內外因素比較分析	77
第一節	衝突量化數據與內部因素相關性之分析	78
第二節	外部因素對衝突之影響	88
第三節	共同歸因：格爾之種族政治衝突模型	99
第四節	小結.....	103

第六章	結 論	105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5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112
附 錄	114	
參考書目及資料	121



表 次

表 2-1，尼可拉斯・夏隆關於文明衝突研究之整理。	17
表 2-2，福克斯對文明衝突文獻之整理。	18
表 2-3，主要學者們對於文明衝突的研究發現整理。	19
表 3-1，1946 至 2009 年個案種族權力關係。	52
表 3-2，車臣、新疆與菲南衝突之歷史背景因素比較表。	53
表 4-1，個案 1970 至 2006 年抗議規模分析表。	56
表 4-2，個案 1970 至 2006 年反叛規模分析表。	56
表 4-3，RAND 資料庫所列與個案相關之恐怖組織分析表。	67
表 4-4，START(GTD)資料庫所列與個案相關恐怖組織分析表。	71
表 5-1，俄羅斯車臣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81
表 5-2，中國新疆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83
表 5-3，菲律賓南部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85
表 5-4，個案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歧視與個案衝突發生之相關性分析表。	87
表 5-5，依據 Gurr 的衝突假設分析個案衝突發生之因素表。	102
表 5-6，車臣、新疆及菲南產生衝突共同根源彙整表。	104

圖 次

圖 1-1，1990 年後的世界文明。	2
圖 1-2，各文明的全球政治情況：即將登場的結盟關係。	2
圖 1-3，文明衝突概念下冷戰前後主要衝突形式演變與分離意識、恐怖主義交集圖。	4
圖 1-4，伊斯蘭文明與車臣、新疆、菲南三地與文明衝突「伊斯蘭文明斷層線」示意圖。	5
圖 1-5，2001-2011 跨境恐怖攻擊分布圖。	5
圖 1-6，個案文明衝突假設示意圖。	8
圖 1-7，研究路徑圖。	8
圖 2-1，冷戰後文明衝突取代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示意圖。	11
圖 3-1，俄羅斯疆域圖。	33
圖 3-2，車臣共和國邊界與相對位置圖。	34
圖 3-3，中國疆域及行政區畫圖。	39
圖 3-4，菲律賓疆域圖。	46
圖 3-5，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47
圖 4-1，1970 至 2006 年個案抗議及反叛規模圖。	58
圖 4-2，1972 年至 2012 年個案武裝衝突死亡人數變化圖。	61
圖 4-3，1972 年至 2012 年個案參加武裝衝突戰鬥人員或活動人員數	

目變化表。	62
圖 4-4，俄羅斯與車臣交戰雙方死亡人數比較圖。	63
圖 4-5，中國大陸與新疆穆斯林交戰雙方死亡人數比較圖。	64
圖 4-6，菲律賓與菲南分離運動團體交戰雙方死亡人數比較圖。 ...	65
圖 4-7，RAND 資料庫 1975 至 2009 年個案受恐怖攻擊次數變化圖。	68
圖 4-8，RAND 資料庫 1975 至 2009 年個案因恐怖攻擊受傷及死亡人 數變化圖。	69
圖 4-9，START(GTD)資料庫 1975 至 2012 年與個案相關之恐怖攻擊 次數統計圖。	72
圖 4-10，START(GTD)資料庫 1975 至 2012 年與個案相關恐怖攻擊受 傷及死亡人數統計圖。	73
圖 5-1，分析種族政治衝突歸因圖。	101

第一章 緒論

今日的社會系統再次受到混亂的威脅，宗教現在似乎變成亂源，而非撥亂反正的良策。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緊張關係動搖了世界秩序。這緊張關係復受到三教聖典的推波助瀾…三大以救贖為職志的宗教合力把世界推向亟需拯救的地步。…911 事件之後，很多人把兩個陣營說成誓不兩立：這陣營的一方是穆斯林，另一方是基督徒與猶太人。有時，這對立關係還會被過分簡化為「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保羅·賴特，《神的演化》：440，444。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種族、族群、文化與宗教的差異，一直是人類歷史上社會衝突的主要因素，1993 年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一文，並於 1997 年出版《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經杭亭頓所提出文明衝突的基本概念為，在冷戰期間，美蘇自由民主 V.S. 極權專制、資本主義 V.S. 共產主義相互對抗之意識型態，主導了該時期的國際政治衝突，成為當時用來解釋國際事務與衝突的主要結構。而文明上的衝突則因冷戰意識形態的關係，暫時被忽略。在冷戰後，原先潛藏在美蘇兩極意識形態對抗的霸權穩定體系下的文明衝突，可能成為冷戰後國際衝突的一種主要形式；即世界在脫去意識形態的外衣後，未來的國際政治可能趨向各文明間的對抗。

杭廷頓將全球「文明」概分為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伊斯蘭文明、中國(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及日本文明(如圖 1-1)；杭式指出，在各文明中，以伊斯蘭文明最可能在未來與各文明加劇衝突，並給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所產生的「文明斷層線(fault line)」一個特殊名稱—伊斯蘭的血腥邊界(bloody border)—杭式並認為，伊斯蘭文明最終可能結合中國文明，共同對抗西方文明。(如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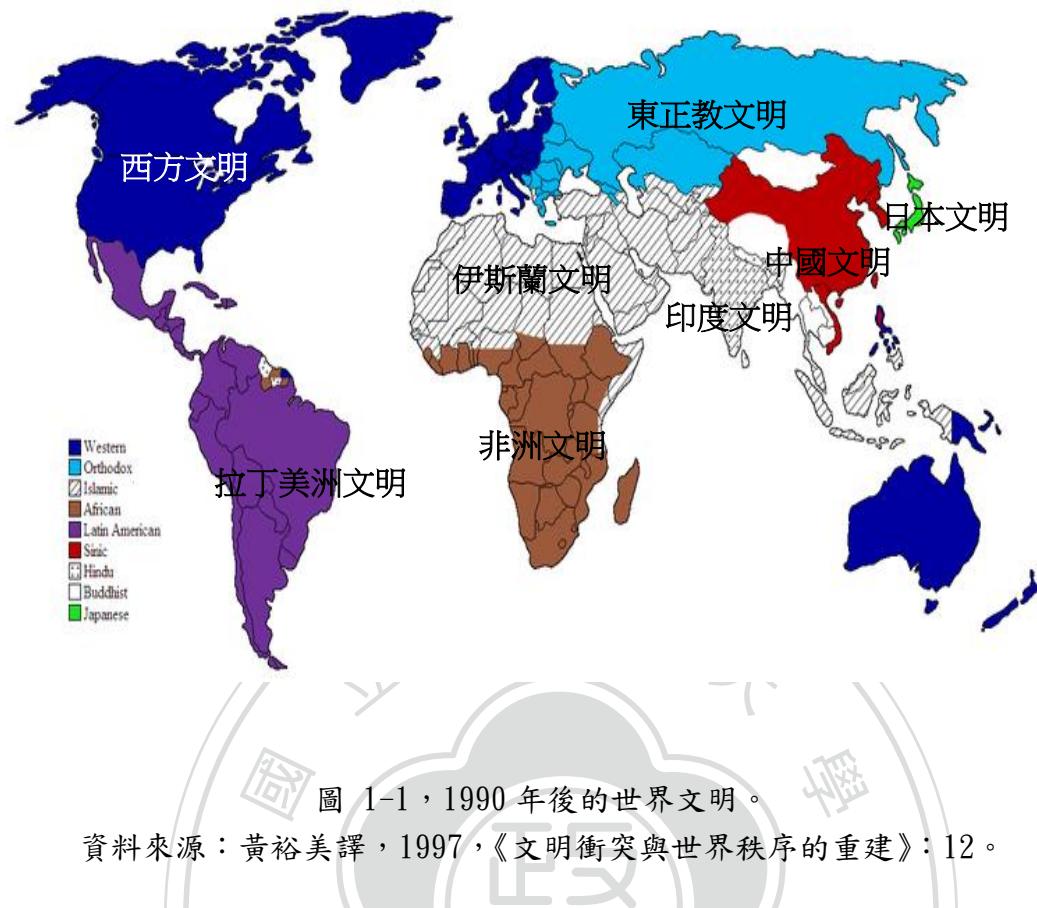


圖 1-1，1990 年後的世界文明。

資料來源：黃裕美譯，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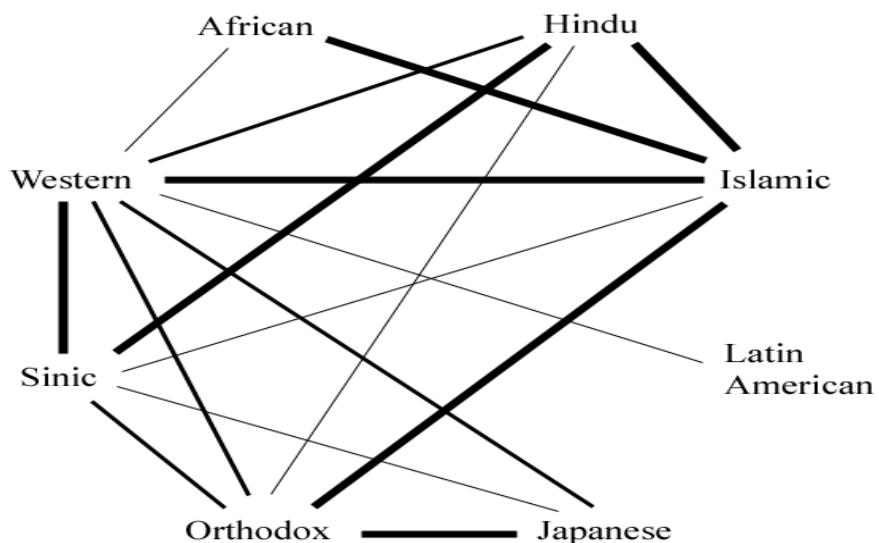


圖 1-2，各文明的全球政治情況：即將登場的結盟關係。

圖片說明：粗線代表文明間的對抗加劇。

資料來源：黃裕美譯。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329。

杭廷頓教授提出文明衝突論後，引來正反兩面評價，有學者認為其論述是一種「製造敵人的文化」，不利文明間的融合，忽略文化與文化間的互透性，只是正當化美國外交政策的論述，也是恐怖分子將其行為合理化、正當化的藉口(Marc Crepon, 2005)；911 事件後，許多學者以文明衝突論來解釋伊斯蘭極端分子發動恐怖主義攻擊西方世界的衝突，將其視為伊斯蘭文明對西方文明的不滿與反撲，也有學者認為，文明衝突形式的恐怖主義，是一種「新恐怖主義」，與民族分離型的恐怖主義不同，無法跟恐怖分子談判、更不易受控制，且以製造大量傷亡主要目標，恐怖主義本身變成了一種目標，而非達成目的的手段(Simon and Benjamin, 2002 : 18; Martha Crenshaw, 2008 : 128)。

杭廷頓引用政治學者湯瑪士·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經典名言¹，「最有用的解釋，就是最好的解釋」，認為這是冷戰結束後 40 年間取代冷戰兩極結構，對於國際關係理論最具解釋力的理論(Llewellyn D. Howell, 2003:180)。該理論自提出迄今已超過 20 年，與文明衝突相關實證研究亦陸續出籠，其中有討論文明衝突與國家間戰爭、文明衝突與國家間低度武裝衝突、文明衝突與恐怖主義等文獻；少見有關於文明衝突、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之探討，而在新聞時事上時常看到俄羅斯車臣(以下簡稱車臣)、中國大陸新疆(以下簡稱新疆)與菲律賓民答那峨自治區(以下簡稱菲南)的衝突發生，若依杭式的分類，車臣、新疆與菲南分別屬於主要文明為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中國文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方文明(天主教)的菲律賓，其所屬的伊斯蘭文明為國家內部的「少數」民族與宗教勢力，且均產生分離意識深受恐怖活動影響。為理解車臣、新疆及菲南之特殊性，筆者以文明衝突概念加上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繪製「文明衝突概念下冷戰前後主要衝突形式演變與分離意識、恐怖主義交集圖」如圖 1-3：

¹ Llewellyn D. Howell 之原文為 ‘He cited Thomas Kuhn’s classic tex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in arguing that what is the best explanation is the most useful expla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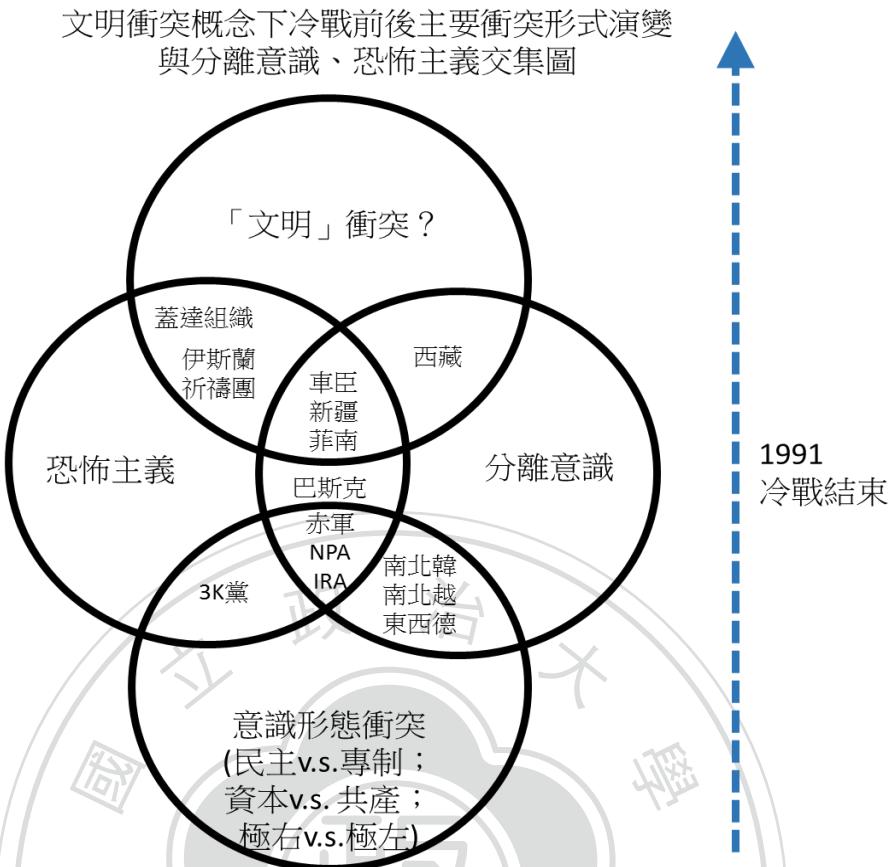


圖 1-3，文明衝突概念下冷戰前後主要衝突形式演變與分離意識、恐怖主義交集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上圖係以杭廷頓文明衝突論為基礎，繪製冷戰前後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衝突案例的概念圖，有些案例與文明衝突與恐怖主義相關，如蓋達組織與伊斯蘭祈禱團，而有些案例與政治意識形態及分離意識有關，如屬革命性質，目的在推翻政府建立新政權的南北韓、赤軍、NPA 等。上圖為筆者在研究初期對文明衝突、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三者結合的概念思考，以便將三者連結，並由此凸顯車臣、新疆及菲南之獨特性。

圖 1-4 從地理的角度出發，標註個案在伊斯蘭文明斷層線上之地理位置。另有學者以地緣政治分析方式，整理 2001 年至 2011 年全球跨境恐怖攻擊模式如圖 1-5，根據圖示，跨境恐怖攻擊仍密集分布在杭氏所指的「伊斯蘭文明斷層線」—即其所稱之「伊斯蘭血腥邊界」上。但伊斯蘭文明斷層線與上開全球跨境恐怖攻擊間之關聯性，仍有待進一步研究，不能逕以其恐怖攻擊發生之地理位置大致與伊斯蘭文明斷層線相符，而逕以「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間之衝突導致恐怖主義攻擊作結論。



圖 1-4，伊斯蘭文明與車臣、新疆、菲南三地與文明衝突「伊斯蘭文明斷層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The Geography of Terrorism

Global patterns of attack, 2001-2011

a) Transnational attac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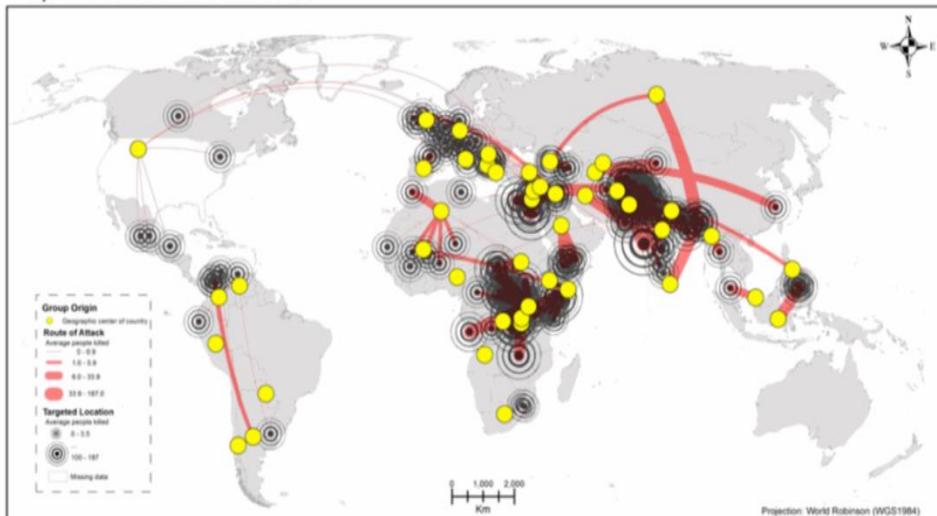


圖 1-5，2001-2011 跨境恐怖攻擊分布圖。

資料來源：Karim Bahgat and Richard M. Medina (2013) An Overview of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in Terrorism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7, No1 : 50. <http://www.terrorismanalysts.com/pt/index.php/pot/issue/archive>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上開車臣、新疆與菲南均產生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其是否與文明衝突有關？究竟以上三地的衝突是否符合杭式所稱的文明衝突特徵？冷戰後文明衝突將取代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的理論是否也適用在個案？是文明衝突導致分離意識進而發生恐怖主義？或有其他不同的內部及外部因素影響？其中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分析之處，因此引起筆者的研究興趣。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與文明衝突相關的研究中，少有針對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個案進行之研究，因此本論文希望能達成目標如下：

- 一、整理與文明衝突、分離意識及恐怖主義有關之文獻以供研究參考。
- 二、對個案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產生之歷史背景進行了解。
- 三、藉由衝突研究之資料庫蒐集個案分離意識相關之各種層次衝突(抗議、武裝衝突、戰爭、恐怖主義)事件資料。
- 四、藉由上述資料分析個案內部政治、經濟及文化政策與衝突之相關性。
- 五、分析個案衝突外部影響因素，如其他國家或非政府組織之干預，國際事件對個案衝突之影響。
- 六、試圖比較分析個案衝突主要因素之異同。
- 七、對個案與文明衝突之相關性、個案同時產生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之因素歸納並做出結論。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論文採「歷史研究途徑」為出發點，此並非很嚴肅地指某一問題的歷史，而是指該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時研究的性質。藉分析與該問題有關的既存資料，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王玉民，1994：243-247)本論文藉由整理車臣、新疆、菲南分離運動及恐怖主義發生背景歷史資料及影響三地分離運

動與恐怖主義發展期間之國際情勢，探討三地衝突發生之原因。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以「層次分析法」與「文獻分析法」為主，「比較分析法」為輔。層次分析法係將事件的觀察層面分為個人、國家及國際三個層次來分析，其目的主要在認定及勾勒不同的分析層次，使觀察的現象得到解釋。(耿曙、姚源明, 2007: 150-151) 藉由層次分析法，將衝突界定在個案「國家內部(Intrastate)」之衝突，如政府與分離運動、恐怖主義團體間的衝突、恐怖主義在該國內部發動之攻擊等；衝突因素的研究則將其分為國家內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及國際(Global)因素作分析，惟因特定恐怖分子、分離運動人士及國家決策者之個人資料蒐集與訪談不易，因此本文不對個人層次進行分析進行討論。

文獻分析法是針對特定的研究問題，進而傳播媒介的訊息或文件內容進行分析，分析來源可以是從理論專書、期刊、新聞及報章等蒐集相關資訊。也就是針對文件的內容及字面性意義，系統而客觀的進行敘述性的研究。(Dane, 1990 : 169-170)藉文獻分析法，整理歷來國際關係學者所發表之論文、專書、研討會之談話、報告，及報章雜誌上相關學者之意見、評論，加以俄羅斯、中國、菲律賓政府所公佈之官方文件、宣言、新聞稿等資料，以作為本文之文獻參考。

比較分析法旨在了解不同文化、民族、國家的特質，但又希望「異中求同」加以比較，在矛盾中求統一，亦即此一研究途徑是用以發現某些「定律」或「類似組態」，抑或用以描述、解釋某一廣泛性之現象。(張紹勳，2001：520)本文蒐集個案衝突資料庫的衝突資料，並以相關性分析切入，找出衝突的內部因素間的關聯；另整理比較個案衝突的外部因素資料，同時針對以上所觀察到衝突發生原因加以比較、分析，找出個案衝突原因的異同。

透過上開各面向研究方法，可了解本研究主題在於找出同屬伊斯蘭文明之車臣、新疆及菲南，面對深受民族分離主義影響，最終均導致衝突及恐怖主義產生之原因。在檢視個案產生衝突之內外因素後，論證個案是否因為「文明衝突」而產生分離意識，進而產生衝突及恐怖主義(如圖 1-6、圖 1-7)。

個案文明衝突假設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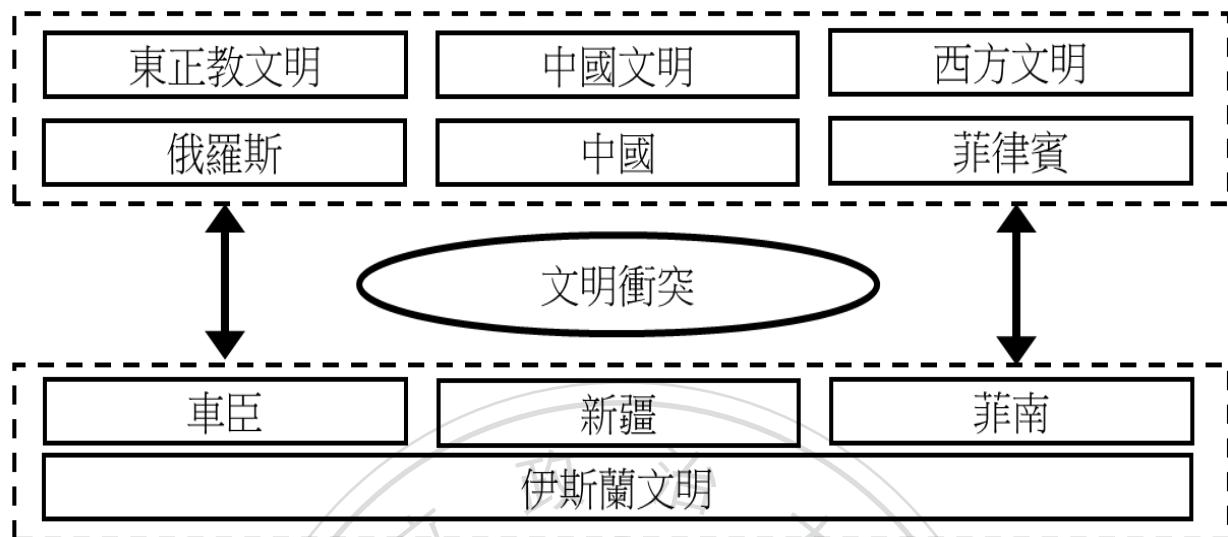


圖 1-6，個案文明衝突假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研究路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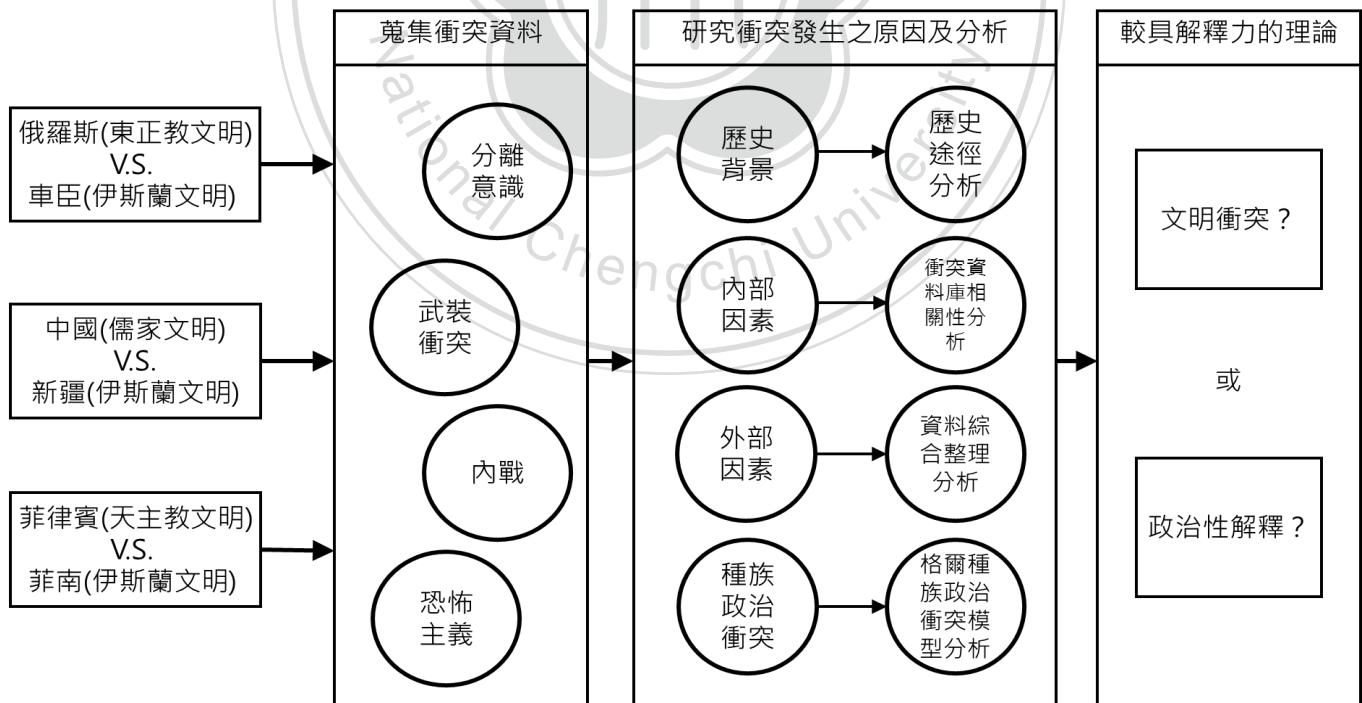


圖 1-7，研究路徑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論文探討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合流之因素。研究範圍須從時間、空間及議題三部分劃定：

1. 時間範圍

因杭廷頓稱文明衝突於冷戰發生後，因此基本上除必要之歷史資料外，本文資料之蒐集主要以冷戰結束之 1991 年前後 20 年間為資料蒐集之主要範圍，另如有其他與個案衝突有關之特殊重要歷史事件則不在此限。

2. 空間範圍

以個案為主體，探討影響衝突的內部成因(俄羅斯、中國及菲律賓)，以及外部成因，即在國內與國際層次探討衝突產生的原因及影響。

3. 議題

議題範圍分別為：(1)個案之分離意識與歷史背景。(2)個案衝突量化數據。(3)檢視「衝突」發生之成因與分析。

本論文的限制如下：

1. 受限於經費與地理因素，筆者無法實地前往三地進行研究調查，訪問當地學者看法，故而無法取得貼近當地輿情之第一手資料，然而透過參考當地文獻素材盡可能將影響降至最低。
2. 採用層次分析法，但因資料蒐集困難及經費限制，無法分析三地恐怖分子與恐怖組織領導人、政府領導人、民眾感受等個人層次，探究恐怖分子與民眾、政府官員內心想法。
3. 有關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之研究尚包含蘇丹、南蘇丹；英國與北愛爾蘭；巴勒斯坦與以色列；斯里蘭卡與泰米爾；印度與喀什米爾等，因篇幅限制及筆者能力有限，未能盡數探討，僅能以三個案案例分析。
4. 本論文內容涉及多種不同語系國家，惟參考資料仍以中文和英文為主。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大致分為六章，各章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限制、文獻探討、論文架構等基本概述。

第二章 文明衝突、分離意識及恐怖主義之探討：針對文明衝突的爭辯、民族與分離意識、宗教與恐怖主義相關定義、文獻及理論進行檢視與整理，釐清相關概念並發掘可供進一步研究之部分。

第三章 個案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活動產生之歷史背景：介紹三地分離意識產生之歷史背景，深入探討因歷史、政治、經濟、人口、宗教等所造成分離意識之根本因素。

第四章 個案衝突量化數據與初判：以風險少數資料庫(MAR)、國家失敗問題集資料庫(PITF)、戰爭關聯計畫資料庫(PITF)、蘭德公司恐怖主義年表資料庫(RAND)及研究和應對恐怖主義國家聯盟資料庫(START)取得個案衝突量化數據並初步分析之。

第五章 個案衝突內外因素比較分析：個案衝突量化數據與內部因素相關性之分析、外部因素影響及以學者格爾之種族政治衝突模型所找出衝突之共同歸因。

第六章 結論：總結上述章節論述，根據論述探討文明衝突與分離意識、恐怖主義間之關係，以及三地分離意識、恐怖主義間之異同，以及可否將三地的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歸因於文明衝突。

第二章 文明衝突、分離意識及恐怖主義之探討

第一節 文明衝突的爭辯

在後冷戰世界，文化同時擁有分裂和聚合的力量。因意識型態不同而分道揚鑣的人民，卻因文化而凝聚再一起，兩德和兩韓是最現成的例子，兩岸三地的中國人也將踵武這種模式。(黃裕美譯，1997：7) 根據杭廷頓的推論，冷戰後因意識形態分裂的同一文化將重新聚合，而因意識形態而被強迫綁在一起的不同文化將產生分裂。在後冷戰時期，文明衝突是否將成為未來國際衝突的主要形式？亦即，以杭廷頓的說法，除了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至上與自由主義的互利共榮外，國際關係中，尚另存在著因為文明間異同而影響著國際關係局勢的因素，且其重要性將會與日俱增，以此概念繪製冷戰後文明衝突取代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示意圖如圖 2-1。此外，杭氏對未來的預測較為悲觀，認為文明間的衝突將大於合作，其此部分則與現實主義角度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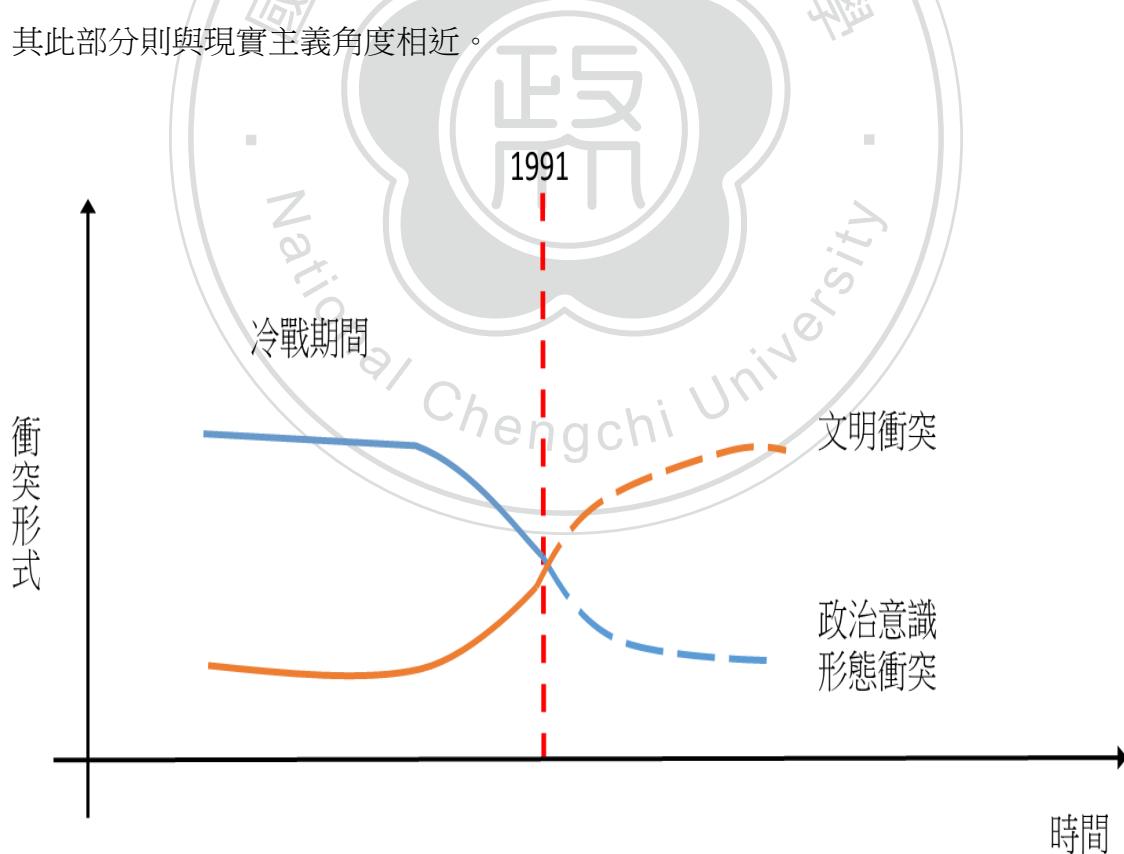


圖 2-1，冷戰後文明衝突取代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首先我們應該定義，何謂文明？對此杭廷頓指出，文明和文化都指人類整體生活方式，文明不過是文化的擴大，兩者都涉及「價值觀、規範、制度及思考方式，據此某個特定社會世世代代的人民都賦予根本的重要性。」《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定義的「文明」，是一種文化領域，是某種歷史總和，是一個特定民族發揮其文化創造力的特定過程，是血緣、語文、宗教和生活方式，是價值觀、信仰、制度和社會結構，是最廣泛且長久延續的文化實體，歷經政治、社會經濟甚至意識形態的變動而生生不息(黃裕美譯，1997：35-38)。

杭廷頓引述愛德華(Edward A. Tiryakian)觀點指出，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應推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文明和世界最大的宗教信仰幾乎融為一體。即使同文同種，如果宗教信仰各異，也可以彼此兵刃相向，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印度次大陸是典型的例子。文明是最廣義的文化實體。(黃裕美譯，1997：35-36)

杭廷頓另引述湯恩比(Tynbee)與梅爾科(Melko)對文明的概念為：「文明包含但無法為其他要素涵蓋，文明是整體性的，有某種程度的整合，如果文明是由國家組成，這些國家彼此間的關係，必定比非屬於此一文明的國家間的關係要密切，他們也許更常打仗，但也更常建立外交關係。他們在經濟上更互相依存，也有更多共同的美學和哲學潮流。」(黃裕美譯，1997：36)

文化同質性助長不同國家人民間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差異則加深了衝突與裂痕。(黃裕美譯，1997：169)分裂的國家如果在領土上跨越不同文明間的斷層線，在維繫其團結統一時尤其棘手。(黃裕美譯，1997：181)

我們也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文明或文化間的衝突，國內學者蔡文輝指出：「人們常常以自我為中心，認為自己的文化才是好的，才是高人一等的。這種心理在人類學裡通常稱之為『文化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1.可幫助提高社會或團體的士氣...2.可用以反抗社會變遷...3.保護利益團體現有權勢。」(蔡文輝，2001：85)社會學衝突理論觀點認為，社會變遷是不可避免的，社會是不同目的和觀點的團體與團體間的鬥爭，衝突可激起社會變遷。(蔡文輝，2001：161)

在描述文化與政治間的權力關係的論述除文明衝突論之外，還有奈伊(Joseph

Nye)的「軟實力」論述，奈伊將軟實力簡單地定義為透過吸引而非強制或者利誘的方式改變他方的行為，從而使己方得償所願的能力。而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存在於以下三種資源中：1.文化 2.政治價值觀 3.外交政策。(Nye, 2006) 因為文化與異文化間本身具有魅力，而「軟實力」可以讓別的國家追隨它，崇尚它的價值觀，學習它的榜樣，進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從軟實力的觀點切入，文明衝突或許可視為欠缺軟實力的國家或團體對具備強勢軟實力國家或團體的一種反彈。

福山(Francis Fukuyama)談到伊斯蘭教文明容易對其他文明產生衝突的宗教、歷史、政治、經濟因素²：「沙特阿拉伯 10 年級學生指定使用的教科書裡說：穆斯林必須互相忠誠，並把非信徒視為敵人...他們在美國花數億美元建造學校和清真寺...使賓拉登及其追隨者能收買一個國家—阿富汗，作為基地訓練整整一代阿拉伯狂熱分子。這一點美國也有責任，因為他在蘇聯退出阿富汗以後也離開了，沒有承擔起在那裏建立一個穩定而溫和的政治秩序的責任...貧困、經濟停滯和中東的獨裁政治...對政治極端主義是易燃物品。」

在提到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文獻中，學者豪威爾指出：「重點並非是否我們向伊斯蘭文明或其他文明開戰，而是他們是否對我們從事文明戰爭？根據杭廷頓教授的理論，我們應該回答：1. 恐怖分子如何定義他們自己？ 2. 恐怖分子是否對美國政府、軍隊或文化發動攻擊？」(Llewellyn D. Howell, 2003: 180) 豪威爾又指出：「恐怖分子對美國華爾街、雙子星大廈及軍事設施的攻擊，是否意味其嘗試攻擊『美國文化』的象徵？另外，許多塔利班神學士認定美國回應 911 恐怖攻擊而進攻阿富汗，是一個文明在對抗另一個文明，一種對伊斯蘭教全體的攻擊。包括總統在內的許多美國人，在回應 911 攻擊時希望『上帝(God)』保佑美國、罹難者及克敵制勝，而這『上帝』是西方的，不同於伊斯蘭教的。甚至有美國高階官員以『十字軍聖戰(Crusade)』來稱呼對抗恐怖分子的戰爭。」其實文明的衝突早已深入人心。(Llewellyn D. Howell, 2003: 180)

福山認為，現代民主是基督教人類普遍平等教義的世俗版本；西方文明中的

² 福山。2001/12-2002/2。〈恐怖主義與文明衝突〉。《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頁 81。

特質強加在其他文明中造成了文明的衝突³：「美國人往往相信，他們的制度和價值觀—民主、個人權利、法治和以經濟自由為基礎的繁榮—代表著普遍的願望，如果有機會的話，全世界人民將最終共享這些制度和價值觀。」

從微觀面向來觀察文明衝突時，我們可以發現，文明衝突表現在地方或微觀層次時，「文明斷層線衝突」(fault line conflicts)會產生於不同文明的鄰國之間，或同一個國家不同文明團體之間，而文明衝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尤其普遍。在全球或宏觀層次，「核心國家衝突」(core state conflicts)發生於不同文明的主要國家之間。(黃裕美譯，1997：282)

而杭廷頓的理論係屬一預測未來可能發生事件的理論，在理論提出的當下無法提供實證研究之數據，但隨著時間經過，許多研究陸續發表，其中有符合文明衝突的論述，也有認為文明衝突不存在者。

針對文明衝突論的批判指出，文明衝突論可能提供恐怖分子合理化的藉口。馬可·克黑朋 (Marc Crepon)認為，一旦我們從只考量惟一因果關係理論基礎上，嘗試分析近年的歷史和當前的衝突紛爭，結果無異於給予此一最簡便的解釋方式某種特權。更嚴重的是，這樣一來，這種解釋變成最具破壞力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的工具。文明衝突理論無異提供恐怖分子絕佳的利器，因為，這樣的詮釋恰是正當化恐怖活動最好的辯護之詞。(李鳳新譯，2005：43)其批判並指出，文明與文明間的界線相當模糊，而且歷史已明證，人類文明的進展就來自於文明與文明間的交互融合與交流，我們在文明境界的邊境地帶，目睹到文明間最廣大的滲入、穿透過程，不是正好與所謂的文明正面衝突論相反嗎？杭廷頓所不想正視且拒絕理解的，就是伊斯蘭世界的「某些東西」成為西洋文明的一部分—如同西洋文明的「某些東西」成為伊斯蘭文明的一部分一樣。正是這「某些東西」從一方通過另一方這件事使得恐怖分子大發雷霆。由於文明之間混和交雜的異質化，正是歷史的真實面，恐怖分子只有以恐怖的手段來封鎖並阻止它。(李鳳新譯，2005：47-48)。

³ 同前註，頁 75-77。

另有學者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批判指出，文明衝突的言論可能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Bruce Russett, John Oneal, Michalene Cox. 2000 : 589; Nicolas Charron, 2004 : 121)。在看待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問題上，羅伯賴特 (Robert Wright)認為：「『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其實是一場非零和遊戲的兩造，換言之，兩者的利益具有正相關性。理由是，凡是對穆斯林大眾有好處的事，便對穆斯林激進分子有壞處。如果穆斯林在世界的地位愈低下，愈惱恨西方對待他們的方式，那激進穆斯林愈會獲得支持，而西方也會愈不利。反之，如果更多穆斯林覺得受西方尊重，覺得可以跟西方打交道獲利，那伊斯蘭激進分子便會愈無法得到支持，而西方人也會愈不受恐怖主義威脅。」(梁永安譯，2013 : 445)

對以「文明」因素作為「衝突」發生的解釋，羅賽特等學者認為⁴：「一些現實因素如政治、地理與經濟因素仍然是目前國際關係主要考量因素，且可與文明或文化分開觀察。如二戰前的德國與日本，戰敗前還奉行納粹與法西斯主義，戰敗後隨即蛻變為民主及非軍事武裝國家，且兩國文化實際上仍然沒有多大改變。」(Bruce Russett et al., 2000 : 587，轉引自 Berger, 1996) 另以中國及蘇聯、俄羅斯宗教信仰人口比例變化來看，自俄、中擁抱共產主義後，無宗教信仰人口大幅提升成為宗教信仰調查時之主要人口，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又恢復以東正教信仰為主要信仰之國家。由此觀之，政治體制仍可能影響「宗教」或「文明」。因此，釐清究竟衝突的產生係經濟、政治等因素造成，抑或如杭廷頓所言係文明的衝突至關重要，羅賽特等學者因此整理 1950 年至 1992 年間戰爭之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戰爭之發生與兩國間是否相鄰之地理因素有很大的關係。另外，如果將以色列與伊斯蘭文明間之衝突排除於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間之衝突外，其實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還少於「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及「西方文明與儒教文明」間的衝突(Bruce Russett et al., 2000 : 592-598)；惟羅賽特等學者仍坦言⁵，若

⁴ 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之原文為”As Huntington acknowledges, the political cultures of Germany and Japan changed radically after 1945 from their prewar fascism, in both cases becoming democratic and substantially anti-militarist. Yet both Germany and Japan remain deeply rooted in their distinctive civilizations (Berger, 1996).”

⁵ 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之原文為”Of course, if the clash thesis is simply a prophecy about what may happen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 would immunize it to any current empirical test”

杭廷頓的理論係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以經驗主義的方法檢視可能不具意義，另此研究也欠缺非國家行為者(恐怖主義活動)與國家內部衝突等的資料⁶ (Bruce Russett et al., 2000 : 590, 602)。

接續羅賽特等人於 2000 年的以經驗主義的量化研究後，學者尼古拉斯・夏隆(Nicholas Charron) 於 2010 年以新的數據如低度衝突(low level)的國家間軍事爭端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 資料加上高度衝突(high level)的戰爭 (War) 資料，做出的量化研究數據支持著杭廷頓的「文明衝突」推論⁷；其亦引述學者福克斯等(Fox and Sandler, 2004)的研究，比較了種族衝突中因文明不同所帶來的宗教及分離因素，福克斯等學者發現⁸：「即便在冷戰後，文明差異並不一定會增加種族衝突的機率及暴力性」。韓德森(Henderson)在 2005 年的研究則指出，同一文明內部的衝突反而比不同文明間的衝突情形更為顯著。然而，突西西斯尼 (Tusicisny, 2004)的研究則顯示了，文明間的差異，特別是伊斯蘭與非伊斯蘭團體間的衝突機率在冷戰後顯著增加，他也發現文明斷層線可比起其他研究更能準確預測暴力衝突的發生。」(Nicholas Charron, 2010:111-112，轉引自 Tusicisny, 2004:498)。

夏隆的研究指出⁹，文明斷層線的國家較非文明斷層線的國家更容易發生衝

⁶ 布魯斯・羅賽特等學者之原文為”We did not consider acts by non-state actors, such as terrorism, to which Huntington devote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Nor have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civiliz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trastate conflict.”

⁷ 尼古拉斯・夏隆之原文為”Contrary to earlier analyses, the data show stro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CoC, particularly when focusing on violent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the results are robust when testing the hypotheses with alternative data on international crises.”

⁸ 尼古拉斯・夏隆之原文為”For example, Fox and Sandler (2004) compare the effects of religious and separatist factors with civilizational differences on ethnic conflict. They find that civilizational differences have not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ethnic confli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at 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do not give rise to more violence than other factors, such as separatism. Most recently, Henderson (2005) uses data on armed conflict through 1999 and finds that intrastate conflicts within civilizations are much more prominent than conflicts between civilizations. However, Tusicisny's results (2004) demonstrate that civilizational differences, especially between Islamic and non-Islamic groups,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conflic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While such differences do not account for conflict duration, he does find that fault lines are much better predictors of violent conflict initiation than in previous studies (Tusicisny, 2004: 498).”

⁹ 尼古拉斯・夏隆之原文為”states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a militarized disput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findings. (Russett et al., 2000; Henderson and Tucker, 2001; Chiozza, 2002)”

突；而與羅賽特等學者研究相符的是，不同文明間確實較不易發生軍事衝突；然夏隆將國土是否相鄰的變因加入研究後發現，若不同文明的國家彼此相鄰時，則發生衝突的頻率顯著較高(增加 358%)¹⁰，此研究符合杭廷頓有關文明斷層線的假設。夏隆另亦發現¹¹，西方國家與伊斯蘭國家發生衝突的機率係非西方國家與伊斯蘭國家的 8.3 倍，且除國家間軍事爭端(MIDs)外，伊斯蘭血腥邊界(bloody border)與國家間之暴力衝突有正相關¹² (Nicholas Charron, 2010 : 114-116)，茲將夏隆的研究摘述如表 2-1：

結果摘要			
假設與預期	國家間軍事爭端	國家間戰爭	國家間危機(行為)
文明斷層線(+)	正相關	正相關	正相關
西方與伊斯蘭(+)	負相關	正相關	正相關
西方與儒家(+)	正相關	負相關	負相關
西方與其他(+)	負相關	些微相關	正相關
血腥邊界(+)	負相關	正相關	正相關
文明間(-)	多因素混雜	多因素混雜	多因素混雜

表 2-1，尼可拉斯・夏隆關於文明衝突研究之整理。

資料來源：Nicholas Charron (2010)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 A post-Cold War empirical analysis of Samuel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or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5 : 119.

另有學者福克斯(Jonathan Fox)整理針對文明衝突理論量化之研究如表 2-2

¹⁰ 尼古拉斯・夏隆之原文為”that the presence of a fault line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a dyadic MID more than three-fold (358%) when holding all other variables constant.”

¹¹ 尼古拉斯・夏隆之原文為”Substantively, the odds of a dyad consisting of a Western state and one from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going to war are 8.3 times greater than non-West-Islamic dyads.”

¹² 尼古拉斯・夏隆之原文為”The ‘bloody border’ hypothesis received no support when considering MIDs, yet was supported when focusing solely on violent conflict.”

表 2-2，福克斯對文明衝突文獻之整理。

Study	Type of conflict	Years included in study	Results
Chiozza (2002)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46–1998	Intra-civilizational dyads more likely to go to war
Ellingsen (2000)	Ethnic conflict	1946–1992	No change in conflict dynamics after end of Cold War
Ellingsen (2002)	UN voting behaviour	1979–1996	No civilizational influence
Fox (2004)	Ethnic conflict and state failure	1945–2001	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are less common and violent; less conflict after end of Cold War; Muslims are involved in high levels of conflict but most of it is with other Muslims
Gurr (1994)	Ethnic conflict	early 1990s	No support for CoC
Henderson (1997; 1998)	International militarized disputes	1820–1989	Cultural factors have no consistent impact
Henderson (2004)	International militarized disputes	1950–1992	Economic growth, material capabilities, alliances and contiguity are all better explanations than CoC
Henderson (2005)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78–1999	Civiliz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Henderson and Singer (2000)	Civil war	1946–1992	Political factor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cultural ones
Henderson and Tucker (2001)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1992	Civilizational differences make states less likely to go to war
Leng and Regan (2002)	Inter-state mediation	1945–1995	Mediation is more successful in inter-civilizational disputes
Roeder (2003)	Ethnic conflict	1980–1999	Civilization has less of an impact than religion and ethno-linguistic differences; no change in conflict dynamics after end of Cold War
Russett et al (2000)	International militarized disputes	1950–1992	Intra-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are most common; inter-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waned after Cold War ended
Tusicisny (2004)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flict	1946–2001	Civilizational conflict is less common and drops at end of Cold War; civilizational conflict is more violent in post-Cold-War era; Muslims are involved in high levels of conflict but most of it is with other Muslims

資料來源：Jonthan Fox (2007) The rise of religion and the fall of the civilization paradigm as explanations for intra-state conflic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 : 3, p. 366

茲彙整表 2-2 內容為以下 5 個有關文明衝突文獻之要點：

- 一、冷戰前後與文明相關之衝突並無明顯升高之趨勢。
- 二、以政治性的因素來解釋衝突發生之原因，如同盟、或經濟成長等比起文明衝突理論更具解釋力。
- 三、同一文明間反而更容易發生衝突。
- 四、種族與宗教之差異比起「文明」更容易發生衝突。
- 五、伊斯蘭文明確實容易產生較高程度的衝突，但大多均是與其他同屬伊斯蘭文明產生衝突。

因此，我們綜合整理幾個主要學者們對於文明衝突的研究發現如表 2-3

表 2-3，主要學者們對於文明衝突的研究發現整理。

	研究層次	文明斷層線容易發生衝突	冷戰後文明衝突升高	文明差異導致衝突	伊斯蘭文明容易與西方文明發生衝突	伊斯蘭文明容易與伊斯蘭文明發生衝突	文明衝突對冷戰後衝突的發生較具解釋力	認為對衝突較具解釋力的因素
福克斯(Fox)	國家間與種族衝突	未提及	X	X	X	○	X	政治與宗教
夏隆(Charron)	國家間低度衝突與戰爭	○	未提及	X	○	未提及	未提及	國家間地理疆界是否相鄰；文明斷層線
韓德森(Henderson)	國家間與國家內部	未提及	X	X	X	○	X	政治因素、經濟成長、物質能力與同盟以及地理疆界是否相鄰
羅賽特等(Russet et al)	國家間與國家內部	○	X	X	X	X	X	政治、地理與經濟因素以及國家間地理疆界是否相鄰
突西西斯尼(Tusicisny)	國家間與國家內部	○	X	未提及	○(冷戰後顯著增加)	○	未提及	文明斷層線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根據表 2-3 我們可以歸納出，多數研究文明衝突的學者們同意「地理疆界」為衝突發生之重要影響因素，亦即地理疆界相鄰之國家間發生衝突的頻率高於地理疆界未相鄰之國家，而不同文明又地理相鄰之國家，則具有更高發生衝突之機率；另外，學者們也認為，「文明」並非解釋衝突之主要結構或唯一因素，衝突之發生仍然為政治、經濟等其他因素所影響；而多數學者們對於文明衝突理論的「文明斷層線」論點以及「伊斯蘭文明」較容易與同屬「伊斯蘭文明」發生衝突之假設，均以量化研究做出與文明衝突假設一致之結論；惟在其他的文明衝突假設論點上，沒有證據顯示文明衝突確實存在於冷戰前後的世界，文明衝突也未比其他因素更具解釋力。

第二節 文明與分離意識

杭廷頓教授提出文明衝突論時，也觀察到國家內部因為分離意識所產生的衝突：「幾乎所有國家都由於至少包含兩個民族、種族和宗教派系，因而是異質的。很多國家因為這些團體間的歧異和衝突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分裂，分裂的幅度則隨時間改變，但一個國家的大分裂可能導致血腥暴動，甚至危及這個國家的存亡。當文化歧異和地理位置歧異相符時，最可能危及國家生存及為自治或分離運動催生。如果文化和地理位置不合，這些國家又可能透過大屠殺或強迫移民使兩者合一。」（黃裕美譯，1997：180）

在進一步談到分離意識之前，我們應先釐清民族主義的本質，再由民族主義中少數族群的理論來看分離主義的產生，則可將分離意識的概念與脈絡釐清。有關民族主義的概念，國內學者江宜樺整理如下（江宜樺，1998：39-40）：

- 一、全世界分成不同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民族性，如種族起源、歷史文化、語言宗教、生活空間或共同命運。
- 二、民族是個別人類在生存狀態中最重要之集體歸屬，一個人對民族的忠誠應該高於他對其他集體歸屬的忠誠。
- 三、為了確保民族的歷史文化得到良好的延續與發展，一個民族必須具備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或充分自治。

四、政治獨立或自治的具體表徵是本族人由本族人統治，一個民族的子民不接受異族統治，統治者必須為自己人。異族統治不可能真正照顧、保存本民族的歷史文化與現實利益。

五、至少在某個意義上，我們的民族乃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人類歷史上必然有某個階段是屬於我們民族發揚光大的時刻。

方天賜等政治學者談到民族自決權時認為：「民族主義主張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型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因此，民族為『國家存續之唯一合法基礎』，以及『各民族有自決建國之權』。它促成新興國家的產生及分裂國家的統一，也導致國家的分裂及瓦解。」(方天賜、孫國祥，2007：194) 有關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問題，方天賜等學者認為：「民族自決是指各個民族有權自由決定該民族的命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正式提出以此原則來解決殖民地的獨立問題，聯合國憲章則承認人民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的權利。但是對多民族國家而言，一旦境內的少數民族都依民族自決的主張而要求獨立，其結果必定造成國家的分裂，衝擊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因此，從多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民族自決的主張等於是主張分離主義(secessionism)運動，需要予以抑制。」(方天賜、孫國祥，2007：203)

冷戰結束後，蘇聯的解體誘發許多原服膺在蘇聯共產體制下的大小國家紛紛分離而獨立，學者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觀察此現象時指出，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引發了族裔民族主義的狂潮。建立已久的民主制國家中的許多因素也更加凸顯了族裔問題：「移民和難民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引起本土主義者的激烈反應；原著居民的覺醒和政治動員最終導致了聯合國通過原住居民權利宣言草案；在幾個西方民主國家中，從加拿大(魁北克)到英國(蘇格蘭)，從比利時(佛蘭德)到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分離主義的威脅持續存在並逐漸發展壯大。所有這些現象都在 90 年代達到高潮，這清楚地表明西方民主制度並沒有解決或克服由族裔文化差異引起的緊張局勢。」(鄧紅風譯，2004：72-73)

金里卡(Will Kymlicka)引述約瑟夫·拉茨(Joseph Raz)關於少數群體權利的論

述指出：「個人自主—他們對幸福生活的選擇能力—最終與下列事情密切相關：是否能接觸他們的文化，這一文化的繁榮，他人對這一文化的尊重。而少數群體權利有助於保證這種文化的繁榮和彼此尊重。我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論證了存在著與文化和認同相關的更大利益，這些利益不但與自由平等的自由主義原則完全一致，並且還證明，給予少數群體特殊權利是正當的，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文化主義者』。」（鄧紅風譯，2004：77）

金里卡(Will Kymlicka)另引述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有關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給予多數群體文化成員特權之論述：「假如現代社會有一官方語言，所有經濟職能和國家職能都能透過這一語言和文化起作用，因此，使用這種語言並屬於這一文化的人們很明顯擁有極大的優勢。講其他語言的人則明顯處於劣勢。」金里卡並指出面對如此困境時，少數群體有三個選擇：1.他們可以選擇融入多數群體的文化。2.他們可以尋求維持自己的社會性文化所需的自治權利和權力—及建立他們自己的語言運作的經濟、政治和教育機構。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的有競爭力的民族國家構建形式。3.他們可以接受永久的邊緣地位。（鄧紅風譯，2004：83-84）

另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觀察，學者指出，社會學稱那些跟社會裡主流文化相異的文化為次文化(subculture)；有些社會對次文化較寬容，有些則極力壓抑次文化的存在。但是所有社會都不允許反抗文化(counterculture)；反抗或推翻現有文化規範或價值體系為目標的次文化，宗教上的異端、叛亂或革命組織的行為也常屬「反抗文化」（蔡文輝，2001：86-87）。蔡文輝引述社會學家梅耶爾(Barton Meyers)觀點認為，一個少數團體通常有五個要素：

- 一、少數團體在文化或生理上有別於強勢團體。強勢團體故意強調少數團體某些特有特徵，用以區別其成員。
- 二、少數團體成員的參與並非自願的。其成員的身分往往是與生俱來的，並非經由選擇而擁有的。
- 三、少數團體的成員通常不跟強勢團體成員通婚。
- 四、少數團體通常知曉其自身的劣勢地位，也經歷過強勢團體的欺壓，因

此少數團體成員之間的向心力強，且較團結。

五、少數團體成員常經歷、遭受社會的偏見、歧視或隔離排拒。

強勢團體由於控制了政治權力、社會資源、經濟財富，藉此欺凌少數團體之成員。而提及族群關係的主要模式時，可分類如下：滅種或撲殺、驅逐、排拒、隔離、壓抑、同化、多元性、混併。(蔡文輝，2001：314-319)。

在處理分離運動的問上，方天賜等學者認為，相關國家對於處理分離運動有三種常見的模式：第一種是依民主的方式，讓主張獨立的分離地區舉行公民投票(plebiscite)，加拿大魁北克屬之；第二種方式是採用權力分享(power-sharing)原則，讓少數民族擁有較大的自治權力。英國北愛爾蘭及蘇格蘭屬之；第三種則是以暴力手段鎮壓尋求獨立的少數民族，印尼東帝汶及俄羅斯車臣均屬之。(方天賜、孫國祥，2007：203-204)

威爾・金里卡(Will Kymlicka)指出，政府在面對少數族群所採取的不公正政策，通常有(鄧紅風譯，2004：151-157)：

- 一、國內移居/定居政策：鼓勵某一地區的人口遷居到少數民族的歷史領地，使得少數民族在自己的傳統領地成為少數，並因此失去政治權力。
- 二、國內行政區界的權力與範圍：將其分割成眾多小單位，使其不能採取統一的政治行動，或將其併入一個更大的行政單位，從整體確保人數處於劣勢。或是名義上控制某一行政區域，事實上並無實權。
- 三、官方語言政策：將某些語言決定為官方語言，實際上就是決定那些語言將繼續存在，那些語言將死亡。

綜合整理上述之文獻內容，我們可以概約歸納幾個國家內部少數族群之所以產生分離意識的主要原因：

- 一、為了保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宗教、語言與生活習慣，維持文化尊嚴與競爭力。
- 二、為了維持政治及經濟上的自主以避免被多數族群的強權壓制或剝削。
- 三、對政府不公正政策的反抗。

第三節 文明與恐怖主義

關於恐怖主義定義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你的恐怖分子可能是別人的自由鬥士。」(One man's terrorist may be another man's freedom fighter.) 由此可知，要定義恐怖主義並非易事，而恐怖主義之定義因涉及政治、人權、意識形態等多重因素，至今仍未能有權威性之統一定義與見解。

學者奧斯汀(Austin Ranney)指出，恐怖主義是指有系統的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以達成政治目的。這名詞源自 1793 到 1794 年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在這段期間，由羅伯斯比(Maximilien Robespierre)主持的公安委員會企圖以死刑震懾所有反對他們的人。結果有 30 萬人遭到逮捕，1 萬 7 千多人被送上斷頭台。(Austin Ranney, 1991 : 441)。

根據美國聯邦條例法典(U.S.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之定義¹³，恐怖主義為：「基於政治或社會目的，非法對人或財產使用武力或暴力，藉以恐嚇或要脅政府或社會大眾或其他任何組織。」其定義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網站定義¹⁴並無太大差別。另外，美國國防部針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與美國聯邦調查局也有些許差異，美國國防部定義恐怖主義為¹⁵：「以追求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之目標，以非法的暴力以輸出恐懼，意圖恐嚇或顛覆政府或社會。」(Kathleen Malley-Morrison, 2013 : xiii, 轉引自 Burgess, 2003)

911 事件發生後，歐盟認為須與美國共同進行國際合作，對抗恐怖主義，因

¹³ 美國聯邦條例法典之原文為“the unlawful use of force and violence against persons or property to intimidate or coerce a governmen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r any segment thereof, in furtherance of political or social objectives.” 28 C.F.R. §0.85(2010). 請參見美國政府印務局網站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0-title28-vol1/pdf/CFR-2010-title28-vol1-sec0-85.pdf>

¹⁴ 美國聯邦調查局網站原文為“the unlawful use of force or violence against persons or property to intimidate or coerce a governmen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or any segment thereof in furtherance of political or social objectives.” 請參見 FBI 網站 <http://www.fbi.gov/albuquerque/about-us/what-we-investigate>

¹⁵ Kathleen Malley-Morrison 之原文為” Eve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ficial definitions vary, with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FBI,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each having their own definition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ines terrorism as “the calculated use of unlawful violence to inculcate fear, intended to coerce or to intimidate governments or societies in the pursuit of goals that are generally political, 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此，歐盟在 2002 年定義恐怖主義為，以實行目標為¹⁶「認真嚴肅地恐嚇人群，或過度地強制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避免任何行動，或顛覆或破壞國家或國際組織之基礎政治、憲政、經濟或社會結構。」之行動。(Quaker Council for European Affairs 2007:7)」

恐怖主義學者霍夫曼嘗試定義恐怖分子為¹⁷：「意圖以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製造或利用恐懼以達成政治變革之目的。所有恐怖行動均涉及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恐怖主義是專門設計用來產生遠大於直接受害者或攻擊目標。它的目的是由內部灌輸恐懼，從而恐嚇更廣泛的『目標群眾』，包括敵對的種族或宗教群體、整個國家、一個國家的政府、政黨或輿論。恐怖主義的目的是創造原來沒有的權力或鞏固之。透過暴力宣傳以獲取恐怖分子欠缺的槓桿作用、影響力和權力，以造成當地或國際規模的政治變革。」(Bruce Hoffman, 2006 : 40)

我國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汪毓瑋綜合整理國內外學界對恐怖主義定義如下：「恐怖主義是一種以重複暴力行動引起焦慮的方法，由秘密或半秘密的個人、團體或是國家行為者，為了與眾不同的、犯罪的或是政治的理由，對比於暗殺行為，其暴力的直接目標不是主要目標。且立即的暴力犧牲者，一般均是隨機選取(機會目標)或是從目標人群中挑選特別的(代表或象徵目標)，並作為訊息的生產者。另在恐怖分子(組織)、(被危及的)犧牲者與目標間，基於威脅與暴力所展生的溝通過程，是被用來操作主要目標(觀眾)；且依據恐怖分子所尋求的是恐嚇、脅迫或宣傳之不同，而再決定將其轉為恐怖之目標，需求之目標，或注意之目標。」(汪毓瑋，2006 : 6-7)

¹⁶ 歐盟對恐怖分子定義之原文為 ”…seriously intimidating a population, or unduly compelling a Government or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to perform or abstain from performing any act, or seriously destabilising or destroying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 economic or social structures of a country or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¹⁷ 霍夫曼對恐怖分子定義之原文為”We may therefore now attempt to define terrorism as the deliberate cre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fear through violence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in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change. All terrorist acts involve violence or the threat of violence. Terrorism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have far-reaching psychological effects beyond the immediate victim(s) or object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It is meant to instill fear within, and thereby intimidate, a wider "target audience" that might include a rival ethnic or religious group, an entire country, a national government or political party, or public opinion in general. Terrorism is designed to create power where there is none or to consolidate power where there is very little. Through the publicity generated by their violence, terrorists seek to obtain the leverage, influence, and power they otherwise lack to effect political change on either a local or an international scale.”

恐怖分子選擇「暴力」行為表達訴求，可能是在嘗試多種政治途徑解決管道失敗後的「理性」決定。學者瑪莎・克倫肖(Martha Crenshaw)在針對推翻政府為訴求的革命型恐怖主義時指出，恐怖主義是一種「可理解」的「理性選擇」的過程：「革命型恐怖主義是為了獲取政治權力，訴諸恐怖主義是一種政治選擇，而非瘋子的行為，恐怖主義是一種特別的策略，一種獨特的暴力模式，可藉由具邏輯性的計畫及可觀察的結果分析並理解。」(Martha Crenshaw, 1978 : 130) 其所述革命型恐怖主義之要素如下：

- 一、將恐怖主義視為從執政者手中獲取政治權力的一種系統及目的性的方法。
- 二、其恐怖主義表現在一系列超乎尋常且無法容忍的個別暴力行動中。
- 三、其恐怖主義可能具有一定象徵的行為模式或選擇具代表性的受害者或標的物。
- 四、可能故意想要對特定人或團體製造心理效應以改變政治行為或態度，間接達成其革命目標。

美國研究恐怖主義學者潔西卡・史騰認為，恐怖主義的兩大特徵為¹⁸：「首先，恐怖主義攻擊對象是非戰士，因此得以與戰爭區別；其次，向目標群眾灌輸恐懼比身體傷害更為重要，這是恐怖主義與一般簡單的謀殺或傷害的主要區別。」(Jessica Stern, 2003 : xx)；恐怖主義學者大衛・納波波特認為恐怖攻擊的特性是，「恐怖分子常常蓄意攻擊無辜者，以說服旁觀者若不加入恐怖組織，就可能也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藉由將不確定性最大化後，超乎尋常的憂慮感開始蔓延。令人覺得恐怖的並不是因為知道危險然後有所準備，更加令人害怕的往往是如此不確定的感覺，以至於所想像的情形往往比實際上可能發生的更加恐怖。」(David C. Rapoport, 1971 : 44) 另外，國內犯罪學學者黃富源等認為，恐怖主義與一般犯罪最大不同之處就是鳳凰情節 (phoenix complex) 的產生，鳳凰情節係指具政治性、理想性的恐怖分子在從事恐怖活動時所懷抱的一種「必要時可以準備身亡

¹⁸ 潔西卡・史騰之原文為”First, terrorism is aimed at noncombatants. This characteristic of terrorism distinguishes it from some war-fighting. Second, terrorists use violence for dramatic purpose: instilling fear in the target audience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hysical result. This deliberate creation of dread is what distinguishes terrorism from simple murder or assault.”

的心理狀態」，他們相信如果能夠犧牲個人生命，以換取所追求的理想與希望，如同火鳳凰一樣，雖死猶生。(黃富源、范國勇、張平吾，2002：310)

在時間因素所造成不同恐怖主義浪潮分類下，國外學者大衛・納波波特 (David Rapoport, 2004: 47)指出歷史上四波國際恐怖主義浪潮：

- 一、第一波係指「無政府」，始自 1880 年代蘇俄至 1920 年代。
- 二、第二波「反殖民」始自 1920 年代至 1960 年代。
- 三、第三波「新左翼」始自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
- 四、第四波「宗教型」從 1979 年開始持續至今。

在談到恐怖主義的成因上，克倫肖(Crenshaw)指出¹⁹：「我們不認為對恐怖主義的根源提出一個一般性的解釋是一件簡單的任務，但透過建立適合各種不同型態與層次的理論基礎是個有益的開始。我們將恐怖主義視為由理性的行為者—恐怖組織—故意採取的一種政治行為。然而在通盤性的解釋恐怖主義時，也應考慮到發生恐怖主義的環境與廣泛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況是否使得恐怖主義相對更容易發生。」(Martha Crenshaw, 1981: 380) 史騰在談到恐怖主義的成因時認為一國恐怖主義活動之發生，可能會受到鄰近國家的波及與影響²⁰：「壞的鄰居以及失敗的國家會輸出犯罪、難民以及不滿」(Jessica Stern, 2003: 284)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馬傳鎮教授將恐怖主義活動的滋生與發展原因，綜合歸納如下(馬傳鎮，2008: 237)：

- 一、社會貧窮、失業與貧富嚴重不均的激化結果。
- 二、地區經濟發展失衡，並產生嚴重落差。

¹⁹克倫肖之原文為”We would not wish to claim that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s a simple task, but it is possible to make a useful beginning by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order for different types and levels of causes. We approach terrorism as a form of political behavior resulting from the deliberate choice of a basically rational actor,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however,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errorism occurs and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broad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make terrorism more likely in some contexts than in others.”

²⁰ 史騰之原文為”At the interstate level or intergroup level, bad neighborhoods and failed states export crime, refugees, and grievances.”

三、不合理的民族政策激化民族間的矛盾衝突。

四、宗教矛盾的政治化或政治矛盾的宗教化結果。

五、政府的專制與腐敗、權威的喪失與參政權的不均等。

六、種族歧視、移民與難民問題。

七、恐怖主義理論思潮的影響。

八、文化矛盾衝突的危機或精神危機。

九、領土、民族的資源擁有權的矛盾與衝突。

十、傳播媒體的報導與推波助瀾。

有關恐怖主義活動在民主政府與專制政府間之差異，學者認為，專制政府較能有效遏阻恐怖主義，但專制體制較容易導致恐怖主義的發生：學者福克斯(Fox)及魯茲(Lutz, et al)等認為²¹，恐怖主義是常常被用來對抗民主制度的一種武器，因為民主國家社會較為自由，較少使用極端壓迫的手段來防堵恐怖主義，而專制壓迫較能有效遏阻恐怖主義(Jonathan Fox, 2013: 134，轉引自 Pape, 2003:349-350; Rapoport and Alexander, 1989:16-17; James M.Lutz and Brenda J. Lutz, 2008: 39)。然而相對地，福克斯認為²²，在「非民主」的國家，和平的抗議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因為和平追求社會與政治的改變受到限制，所以訴諸「暴力」常常是非民主國家少數團體爭取權益的唯一選擇 (Jonathan Fox, 2013: 125)。

在杭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假設中，渠認為政治意識形態導致的恐怖主義活動在冷戰後已經漸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分離、宗教極端主義等恐怖活動。因此，有必要對宗教型或民族分離型的恐怖活動進行了解。

²¹ 福克斯之原文為”Terror tends to be a tactic used against democracies. This is because it is easier to organize in a freer society. Also, the most effective tool in stopping terror is repression, which democracies are more reluctant to use, and when they do use it, use less extreme versions than autocratic states(Pape, 2003:349-350; Rapoport and Alexander, 1989:16-17)” 魯茲之原文為”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democratic countrie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errorist attacks than other kinds of political systems.”

²² 福克斯之原文為”In non-democratic countries, peaceful means of protest are often unavailable. In these cases the options for peacefully pursu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are often limited. Accordingly, violence is usually the only viable option in non-democracies, other than inaction.”

霍夫曼認為，宗教型恐怖主義分子並非將其自視為系統內的一分子而是「旁觀者」，追求對現存系統的根本性改變。學者沃爾特指出，恐怖主義組織傳統上包含強烈的準宗教的狂熱成分，因為只有非常肯定的信仰(或徹底的道德相對主義)，才提供剝奪他人生命的正當理由(沃爾特・拉奎爾，1996：158)。台北大學犯罪學教授許春金針對宗教型恐怖主義的成因提出看法：「蓋達組織所發動的『聖戰』具有仇恨犯罪的特質—犯罪行為人針對人身、財產或社會不特定多數人，基於對種族、宗教、身心障礙者、性傾向或國籍/少數民族等的偏見所產生的犯罪動機…進而對上述族群所為的暴力犯罪行為。」(許春金，2007：528)

關於宗教恐怖主義發生的原因，學者福克斯認為，宗教團體在以下兩個條件之下，較為可能發展出恐怖主義活動(Jonathan Fox, 2013：133)：

- 一、成員受到宗教理念啟發其認為至高無上的政治動機，且即便沒有其他和平方法達成，仍必須追求並達成目標。
- 二、成員未能在政治上具有足夠力量透過和平方法產生政治或社會性的改變。

馬傳鎮認為，民族型恐怖主義為恐怖主義中最持久、最強而有力且最致命的根源之一，目前世界上的恐怖組織有三分之一屬於此一類型，其目的在追求其民族的獨立或完全自治而引起的恐怖主義。(馬傳鎮，2008：237)。有學者支持民族型恐怖主義更為難纏的看法：「...種族的或民族的恐怖主義更難以受創並根除，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著較為廣泛的人民基礎。賓拉登式的恐怖主義就屬於革命型的，也是民族型的」(蒂埃里・德蒙布里亞爾，2001：53)；

「宗教」或許是誘發讓恐怖分子參加恐怖組織的動機或因素之一，但即便是因為宗教的緣故，每個「個人」參加恐怖組織仍有許多其他複雜的因素，在訪談許多參與攻擊行動的恐怖分子後，學者史騰認為²³：「為何有些因宗教不滿的人

²³ 史騰之原文為”Why do some people respond to these religious grievances by joining terrorist groups, and once they join, what make they stay? We learn, through the terrorists' stories, that the benefits they receive are partly spiritual, partly emotional, and partly material.” ”We will find in the pages that follow that grievance can end up as greed—for money, political power, or attention.” ”Some admit that they find guns and violence appealing.” ”Bin Laden, for example, appears to believe that spectacular attacks make him more appealing to his followers. In his word, people follow the strong horse, and

會選擇參加恐怖組織？而是甚麼原因讓他們繼續留在恐怖組織裡？透過恐怖分子的故事我們了解到，他們可獲得的利益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一部分是情感上的，一部分是物質上的。…我們可以發現不滿(grievance)最後變成了貪婪(greed)—為了錢、政治權力及獲得關注…有些承認，他們發現槍枝及暴力頗具吸引力…如賓拉登(Bin Laden)就相信，特定的攻擊可讓他對追隨者更具吸引力，他說，人們追隨強壯的馬，而拋棄弱的那匹。」(Jessica Stern, 2003 : 3-7)

依據美國國務院於 2003 年公布(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03:125)與車臣、新疆及菲南有關之恐怖主義組織團體分別為：

一、車臣：

- (一) 伊斯蘭國際維和旅(Islamic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Brigade , IPB)。
- (二) 伊斯蘭特別軍團(Special Purpose Islamic Regiment, SPIR)。
- (三) 裏亞杜斯-薩利欣車臣烈士偵察破壞營 (Riyadus-Salikhin Reconnaissance and Sabotage Battalion of Chechen Martyrs, RSRSBCM)。

二、新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 ETIM)。

三、菲南：

- (一) 阿布薩耶夫 (Abu Sayyaf, ASG)。
- (二) 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第四節 小結

前述有關文明衝突的理論與文獻中，大量引用各種資料庫做出量化分析的結論，其中包含由低程度到高程度的各種形式衝突，如抗議、低度武裝衝突、戰爭、恐怖主義活動等等，其研究範疇也包含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國家內部的種族衝突等等，惟其內容為全球性、大範圍的資料庫分析，而如學者羅賽特的研究，如果將以色列的衝突排除後，伊斯蘭與西方的衝突並不特別明顯。因此，有關文明衝突的全球性研究仍可能被某些特別的區域性衝突資料所影響而產生不同之結果。

筆者本篇論文直接個別將車臣、新疆與菲南單獨進行研究，可排除資料庫研究採用整體資料，卻因個別特殊之資料影響結果判讀的問題，且可深入探討個案國家內部是否產生文明衝突及衝突發生成因。

現今討論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之文獻中，少有關於文明衝突、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同時發生之個案探討，本論文透過檢視個案的歷史背景、衝突發生的內部與外部因素比較等研究方式，亦有別於其他探討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活動之文獻。

第三章 分離意識與恐怖活動之歷史背景

分離意識與其歷史發展息息相關，學者詹姆士·密爾瓦亦指出，大多數面臨種族分離運動問題的國家無疑地會很願意宣稱曾佔領問題地區長達 250 年或更久以證明其統治之正當性(James Millward, 2009:71)，因此，欲了解一地的分離運動發生原因，必先徹底了解其分離運動歷史背景。

研究恐怖主義的著名學者克倫肖指出²⁴：「恐怖主義現象的發生與我們對恐怖主義的理解，都是取決於—政治性、社會性與經濟性的一歷史脈絡，以及參與其中或回應我們稱之為「恐怖主義」活動的個人與團體之行為，及其行為與世界產生之關聯。」(Martha Crenshaw, 1995:3)；克倫肖又表示²⁵：「若分析師及專家們只專注在冷戰後『新』恐怖主義，那麼他們可以很安全地忽略掉 19 世紀到 1990 年所發生的恐怖主義紀錄，窄化的研究範圍因此也簡化了研究的工作，此外，如果分析師可以安全地假設宗教是恐怖主義的成因，他們沒有必要尋求連結宗教、政治、社會與經濟等更複雜的解釋。在沒有檢視特定社會的背景條件與個體傾向的情形下，激進化的過程是不能被理解的。」(Martha Crenshaw, 2008:134) 亦即，渠認為，研究恐怖主義必先從歷史背景著手，再尋找這些涉入其間的宗教、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以及主體(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對世界產生之影響。

因此本章內容介紹車臣、新疆及菲南的分離運動與恐怖活動之歷史背景，以提供後續章節一個清楚的歷史發展脈絡，由歷史背景角度出發，可較為全面地觀察到各方面因素對個案所造成之影響。

²⁴ 克倫肖之原文為”Both the phenomenon of terrorism and our conception of it depend on historical context –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 and on how the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ho participate in or respond to the actions we call terrorism relate to the world in which they act”

²⁵ 克倫肖之原文為”If analysts and pundits can focus only on the “new” terrorism of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then they can safely disregard the record of terrorism that occurred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1990s. The narrowed scope of their research streamlines the task of analysis. Furthermore, if analysts can safely assume that religion as the cause of terrorism, they need not look for other more complex explanations that necessitate linking religion to other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gration. 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out examining background conditions and individual propensities in particular societies.”

第一節 俄羅斯加盟共和國—車臣

車臣共和國屬於俄羅斯聯邦 21 個共和國中的 1 個，面積為 1 萬 5,800 平方公里，位於俄羅斯的西南部邊界北高加索區，介於黑海與裏海間，國界鄰接喬治亞，扼俄羅斯出入中東地區咽喉，係經濟與戰略重要位置(如圖 3-1、圖 3-2)。根據俄羅斯 2010 年人口普查的統計，依種族區分，俄羅斯境內共有 143 萬 1,360 名車臣人²⁶，約占俄羅斯總人口 1.04%；而依俄羅斯聯邦行政區分，車臣共和國共有 126 萬 8,989 人²⁷；再觀察車臣共和國人口組成，計有車臣人 120 萬 6,551 人，占車臣共和國 95.07%²⁸，由此可知，大部分俄羅斯境內的車臣人均居住於車臣共和國境內，而車臣共和國幾乎成為全由車臣人組成的一個俄羅斯聯邦單位。



圖 3-1，俄羅斯疆域圖。

圖片說明：車臣共和國約位於圖左下紅圈處。資料來源：www.worldatlas.com (檢索日期：2013/12/11)

²⁶The Russian Census of 2010,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erepis2010/croc/Documents/Vol4/pub-04-10.pdf。

²⁷The Russian Census of 2010,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erepis2010/croc/Documents/Vol4/pub-04-16.pdf。

²⁸The Russian Census of 2010,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perepis2010/croc/Documents/Vol4/pub-04-16.pdf。



圖 3-2，車臣共和國邊界與相對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flashpoints.info/CB-Chechnya.html>

車臣所在的高加索地區因位於中東與俄羅斯地區間的接壤地帶，因此自古以來就是強權間爭相競逐的戰場。自 7 世紀開始，就有阿拉伯人前往傳教，9 至 12 世紀曾為波斯帝國統治，13 至 15 世紀為蒙古欽察汗國(Turkicized khanate)，15 世紀至 18 世紀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18 世紀開始才由俄羅斯帝國逐漸掌控。19 世紀開始，俄羅斯帝國對車臣地區的管控漸趨嚴格，政府對穆斯林的種種歧視舉措與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政策引爆車臣民眾的不滿，1818 年至 1864 年爆發高加索戰爭(The Caucasian War)，由高加索地區各山地部落起而反抗俄羅斯的統治，該抗爭最後以失敗告終，高加索地區遭受更嚴苛的種族清洗(Dunlop, 1998 : 1-30)。

20 世紀初期的蘇聯政府針對高加索地區的民族問題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1922 年將車臣自「蘇維埃山地自治共和國(Soviet Mountainous Autonomous Republic)」獨立出來成為車臣自治州，1934 年將車臣自治州和印古什自治州合併；1936 年將其升格為「車臣—印古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Chechen-Ingush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Dunlop, 1998 : 43-44)，但是表面上尊重自治，實際上仍持續將該地區俄羅斯化的政策引發車臣人的不滿，

特別是 30 年代初期的農業集體化政策，高加索地區因此發生暴動。對蘇聯政府失望之餘，部分車臣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德軍合作，甚至參加德軍，希望藉此脫離共黨統治、獲得車臣獨立地位的承認(侯艾君，2006：119；James Hughes, 2007：10)。

其後，蘇聯為報復車臣的背叛、弱化高加索地區民族主義威脅，於 1944 年開始大規模流放車臣人、印古什人等民族，據統計，被流放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總數為 46 萬人。在車臣人、印古什人被遷出之後，共和國幾乎變空，蘇聯政府不得不從鄰近各州和共和國遷入人口。而車臣人在流放地等同介於犯人和公民間的「特種犯人」，受到嚴格的監視、管制和勞動。與此同時，車臣人還受到流放地哈薩克人民的歧視，造成種族間的衝突，其中以車臣人與其他種族衝突頻率最高(侯艾君，2006：121-122)。這些遭到驅逐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的歷史成為許多戲劇、文學和詩詞的題材，且被認為是史達林時期的恐怖種族滅絕罪行。而對於居住在北高加索的俄羅斯人而言，車臣人是叛國者，他們多數認為車臣人遭到驅逐是一種合法的行為。(林長杰，2005：48)

1953 年史達林逝世後，這些被流放者才於 1956 年被准許返回故居，蘇聯並在 1957 年同意恢復「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之建制。然而車臣人返鄉後才發現之前屬於他們的土地已經被新移民佔據，造成車臣人與新移民間的矛盾和衝突。(林長杰，2005：60-61)

1926 年至 1937 年間，車臣人口成長率達 36% (Robert Conquest, 1970:170)，1939 年至 1959 年遭遇種族清洗與流放的 20 年間，蘇聯境內車臣人口總數僅由 40 萬 8,000 人增加為 41 萬 8,800 人，人口成長率僅有 2.6%；而車臣人自 1957 年結束流放返回故居後，人口數才緩步逐漸提升，根據統計資料，1959-1979 年的 20 年間，蘇聯境內的車臣人由 41 萬 8,800 人增加為 75 萬 5,800 人，成長率為 80.4% (Gerhard Simon, 1991：372-373)；蘇聯解體後，根據俄羅斯全國 2002 人口普查資料，俄羅斯境內車臣人總數為 136 萬 200 人，若與 1979 年的車臣人口數

相比，其成長率為 79.9%²⁹。

由上開歷史背景可知，車臣人早在 19 世紀沙俄政府統治時期就有反抗俄羅斯統治之意識(高加索戰爭)；而在蘇聯統治時期，為了爭取獨立，藉由支持德軍換取德軍勝利後的承認獨立地位，此舉招來蘇聯政府戰後清算、流放；在 1939 年至 1959 年的 20 年流放期間車臣人的人口成長率僅有 2.6%，遠低於同期印古什人人口成長率 15.1% 及蘇聯總人口成長率 9.5% (Gerhard Simon, 1991:372-373)；在 19 世紀反抗俄國侵略的戰爭期間，近 10 萬車臣人死去，1936 年到 1938 年的大清洗期間，車臣地區有 8 萬人被處決，這是當時車臣人口的四分之一，而 1944 年的流放導致約 14.5 萬車臣人因寒冷、飢餓及傳染病喪生 (Svante E. Cornell, 2003: 169)，曾遭流放的歷史在車臣人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心理創傷，而此種歷史記憶極容易被有心人士利用，作為民族主義的宣傳工具，其鼓動民族感情、動員社會的能量是難以估量的(侯艾君，2006：125)；驅逐政策、壓迫及歧視使得車臣人內心深信，在蘇聯的統治下將無法安然居住，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車臣面對俄羅斯政府的抵制態度。

如果說沙俄及蘇聯政府長期對車臣人的歧視與壓迫，以及流放車臣人造成悲慘的集體歷史記憶埋下了現代車臣分離意識的遠因，那麼蘇聯政府 20 世紀末的崩解則是車臣分離意識再度高漲的催化劑。

90 年代初期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與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為了政治考量、吸引支持，均向地方勢力妥協，蘇聯政府內各加盟共和國要求獨立的聲浪造成一股民族分離運動風潮，許多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俄羅斯聯邦內兩個共和國，車臣(Chechnya)與韃靼(Tatarstan)亦於此時宣布獨立。

車臣早期的分離與獨立運動不具民族與國家意識，多是反抗外來侵略或政府暴政的行動或起義，直至 90 年代，才正式出現以民族國家意識為主體，為消除歧視及團結全體車臣人而組成的「車臣人民全民族大會」(Common National

²⁹ 俄羅斯全國 2002 人口普查資料，表 4.2「National composition for reg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perepis2002.ru/index.html?id=87>

Congress of the Chechen)。「車臣人民全民族大會」邀請空軍少將杜達耶夫(Dzhokhar Dudaev)擔任領導人，杜達耶夫於 1991 年 10 月被推選為車臣共和國(Chechen Republic of Ichkeria, CRI)的總統，並宣布車臣獨立於俄羅斯聯邦。葉爾欽嘗試阻止車臣共和國的獨立行動失敗後，陷於政爭中無力處理車臣問題，直到 1993 年 10 月徹底消滅國會的反對勢力後，他的權力才獲得實質鞏固。另外，杜達耶夫的反俄言論與車臣的實質獨立影響了俄羅斯藉由出口裏海(Caspian Sea)石油資源以強化控制南加索地區的可行性。因為俄羅斯通往高加索地區的唯一輸油管係經過車臣首府格羅茲尼(Grozny)，石油公司對石油運送過程經過此一不穩定地區的擔憂也加深俄羅斯出兵車臣的念頭。而在杜達耶夫與葉爾欽兩人的敵意下，任何談判措施也無法奏效，各項因素影響下，第一次車臣戰爭就此爆發(Svante E. Cornell, 2003 : 170)。

俄軍於 1994 年 12 月抵達車臣首府格羅茲尼，在將近兩個月的轟炸中，格羅茲尼成為一片廢墟，造成約 2 萬平民死亡。據估計，俄羅斯軍隊在進攻車臣前 4 個月內所累積的死亡人數就超過蘇聯軍隊在阿富汗戰爭中傷亡最多的一年—1984 年—全年的死亡人數 2,500 人(Svante E. Cornell, 2003 : 170)。1996 年 8 月車臣軍隊成功奪回包括格羅茲尼在內的三個城市，葉爾欽迫於國內外壓力，派出代表與車臣談判，戰爭於雙方簽訂沙夫尤特和平協議 (Khasavyurt Peace Agreement) 後結束。1997 年 5 月雙邊正式簽署和平條約，俄羅斯承認車臣的獨立地位。

戰後的車臣內部依舊波濤洶湧，經濟蕭條與社會治安的混亂削弱了車臣總統馬斯哈多夫(Maskhado)的政權；而戰後退伍的年輕戰士效忠戰時的指揮官更甚於車臣中央政府，馬斯哈多夫在無法得到俄羅斯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下，無力也無意消滅軍閥巴薩耶夫(Shamil Basayev)及哈達布(Amir Khattab)在車臣境內發展的伊斯蘭瓦哈比主義(Wahhabism)勢力。巴薩耶夫與哈達布於 1999 年 8 月，號召高加索地區伊斯蘭聖戰士，為聯合車臣與達吉斯坦(Dagestan)，共同建立全伊斯蘭化的國家，在達吉斯坦發動武裝叛變，此舉引來俄羅斯當局強烈反彈，於 1999 年 10 月爆發第二次車臣戰爭(Svante E. Cornell, 2003 : 171)。

俄軍於 2000 年 2 月攻佔格羅茲尼，俄羅斯政府於 2000 年 5 月宣布對車臣進

行接管，任命卡德羅夫(Akhmed-hadji Kadyrov)為親莫斯科政府的過渡性首長，2003年3月公投制定車臣新憲法。卡德羅夫上任後，將俄羅斯對車臣的戰爭定調為對恐怖主義的戰爭(Julie Wilhelmsen, 2010: 51)。2004年5月9日，卡德羅夫被炸彈炸死。2006年3月4日，卡德羅夫之子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Akhmadovich Kadyrov)被任命為車臣共和國總理。2007年4月5日，拉姆贊·卡德羅夫宣誓就任車臣總統。2009年4月16日，俄國當局宣布車臣戰爭正式結束。車臣於1991年至1999年的實質獨立地位自第二次車臣戰爭後不復存在。

第二節 中國大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西北地區(如圖 3-3)，由東向西依序和蒙古共和國(Mongolia)、俄羅斯(Russia)、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Kyrgyzstan)、塔吉克(Tajikistan)、阿富汗(Afghan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及印度(India)等國接壤，該自治區邊界長度約占全中國邊界的1/4；面積達166萬4,900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約1/6；依據「2012年新疆統計年鑑」數據，該地人口約為2,208萬7,100人，各民族人數由多至少依序為維吾爾族(Uyghur)1,037萬400人占46.95%、漢族(Han)844萬4,200人占38.23%、哈薩克族(Kazakh)154萬2,600人占6.98%、回族(Hui)100萬3,400人占4.54%，其餘尚有吉爾吉斯族(或稱柯爾克孜族，Kyrgyz)、蒙古族(Mongol)等³⁰。

該地區自古為接通歐洲、中亞與亞洲的重要陸路商貿運輸路線，並以「絲路(silk road)」聞名世界。早在西元前1世紀，中國西漢即在新疆地區以「屯田」方式抵抗匈奴入侵並設「西域都護府」治理。約在西元7至8世紀間，中國唐朝(Tang Dynasty)、西突厥(Western Türk)及吐蕃(Tibetan Empire)爭相控制現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Tarim Basin)、吐魯番窪地(Turfan Basin)、帕米爾(Pamir Mountain)及崑崙山(Kunlun Mountain)等地區；至8世紀中葉，唐朝軍隊外被阿拉伯軍隊打

³⁰ 2012年新疆統計年鑑，http://www.xjtj.gov.cn/stats_data/tjnj/2012nj/c1/c1.htm

敗，內逢安史之亂，唐勢力自此退出新疆(Michael E. Clarke, 2001: 31)；8世紀至12世紀間，維吾爾人在當地建立了回鶻汗國(Uyghur)，先後並歷經喀喇汗國(Qarakhanids)與西遼(Qara Khitay)的統治，喀喇汗國並於西元960年起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蒙古帝國約於13世紀初期控制新疆地區，其後又有察合台汗國(Chaghatayid)、葉爾羌汗國(Yarkent Khanate)與準噶爾汗國(Zunghar Khanate)的統治，新疆即於此時期全面伊斯蘭化；18世紀中，中國清朝平定了準噶爾與回部，重新控制天山南路地區。1864年，新疆回民因不滿清朝治理方式發生回變(Tungan (Hui) and Uyghur Rebellion)，清朝派遣左宗棠及劉錦棠弭平回變後，於



圖 3-3，中國疆域及行政區畫圖。

資料來源：CIA World Fact Book/Library/Publications/CIA Maps/Map Downloads。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cia-maps-publications/map-downloads/China_Admin.pdf

1884 年設「新疆」省治理(James Millward, 2007: 78, 373-383)。清朝的設省治理使新疆的地位由原本的「藩部」提升為清朝的 19 個行省之一，改變了原本以軍代政的治理方式，清朝將該地地名由漢代的「西域」(Western regions, 西部地帶)變更為「新疆」(new frontier 新闢的疆土)，有將該地實質納入國土治理範圍的意義(James Millward, 2009: 58)。

學者密爾瓦認為，將 1864 年的回變歸因於該地維吾爾族人爭取獨立的說法其實過於簡單化了，渠認為回變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 1850 年以來的經濟貧困與地方治理者一連串的管理政策失當所造成(James Millward, 2007: 118)。

新疆在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期，許多當地維吾爾人為躲避中國清朝的統治，越過中國邊境往俄羅斯、哈薩克與吉爾吉斯移動；而 1918 年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後，大批維吾爾族人為逃避蘇維埃的恐怖統治，開始向中國邊境移動；復於 1920 年至 1930 年間，為逃避史達林仇視富農階層，以及因集體農業造成的飢荒，大批維吾爾族人及哈薩克族人往中國邊境遷徙，此遷徙潮於 1930 及 1931 年達到高峰(Ablet Kamalov, 2009: 115-117; James Millward, 2004: 3)。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 20 年代初期，曾遊歷歐洲、哈薩克及土耳其的富有維吾爾工業家與商人在新疆地區引進了現代化的維吾爾教育，透過期刊及報紙傳達讀者與學生有關突厥(Turic)乃至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思想，就此埋下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的種子(James Millward, 2004: 4)。

1912 至 1928 年間，中國政府因軍閥割據、蘇俄則因革命後局勢動盪，均無暇插手新疆事務，新疆軍閥楊增新大致維持了新疆的完整與獨立性。楊於 1928 年被刺身亡後，其他軍閥開始出現權力爭奪，因此在 1931 至 1933 年，新疆發生多起變亂，軍閥盛世才於 1933 年掌權，為穩固其勢力，接受蘇聯經濟與軍隊援助以清剿新疆地區其餘軍閥勢力(孟鴻，2010: 20-22)，使新疆此後 8 年間幾乎成為被蘇聯統治之半殖民地(semi-colony)或衛星國(satellite)狀態(Ablet Kamalov, 2009: 117; Michael E. Clarke, 2011: 33)。

1933 年 11 月 12 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East Turkestan Republic)在英國的支

持下於喀什噶爾(Kashgar)宣布成立，後於 1934 年 2 月被盛世才與蘇聯軍隊所追剿的馬仲英回族叛軍勢力消滅(Michael E. Clarke, 2011: 32, 轉引自 Forbes 1986: 122-3；孟鴻，2010: 24)。短暫存在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固然是維吾爾民族主義的重要里程碑，但其成立也某種程度表現出「突厥」與「維吾爾」間身分認同的矛盾，例如在官方最終決定同時對外使用「東突厥斯坦共和國(ETR)」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ETIR)」國名前，曾就是否稱呼「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之議題爭辯(James Millward, 2004: 5)。

1941 年德國入侵蘇俄後，蘇俄因自顧不暇無法再提供盛世才經濟及軍事援助，另方面美國於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變(Pearl Harbour)後決定參戰援助中國，使得盛世才在 1942 年 5 月決定倒向中國政府，並承諾將逐漸把蘇俄經濟與軍事影響力移出新疆地區。盛拉攏國民政府的結果，造成新疆與蘇俄邊境的進出口貿易中斷，另因高估中國政府的貨幣匯率導致新疆的通貨膨脹，嚴重傷害新疆的經濟。政治與經濟上的混亂使得蘇聯撤退後就開始逐漸升高的少數民族問題更加嚴重。而蘇聯也一改以前和盛世才一起鎮壓少數民族叛亂的策略，轉而支持鼓動新疆地區少數民族與穆斯林起而反抗中國的統治(Erkin Ekrem, 2008: 110)。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壓力下，國民政府決定撤換盛世才，擔心失勢的盛世才亦於在 1943 年德國於史達林格勒敗給蘇聯後逮捕了許多國民黨員，想重返親蘇路線，但為蘇俄所拒，盛世才於 1944 年 9 月失勢遭調離新疆(Michael E. Clarke, 2011: 35-36)。

1944 年 10 月至 11 月間，在蘇俄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Ili)、塔城(Tacheng)與阿勒泰(Altay)地區發生大規模的維吾爾族反抗事件，稱為伊寧事變或三區革命³¹(Three District Revolution)，第二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Eastern Turkistan Republic)並同時於此宣布獨立於中國。

國民政府在美英蘇雅爾達協定(Yalta Agreement)的戰後利益分配協商下，

³¹ 陳斯英分析新疆發生伊寧事變的原因：「概括言之，就是由於民族仇恨加上苛虐腐敗政治與內外野心家的陰謀三種因素所促成。所以，伊寧事變的發生，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且可說是新疆過去一連串變亂的延續。因為那些造成歷次變亂的因素從未被徹底消除，禍亂的根苗是永遠存在著。」陳斯英。1985。〈伊寧事變前後的新疆政局〉。《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冊)。蘭州：甘肅省圖書館：415。

1945 年 8 月 14 日與蘇俄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以「蘇俄取得旅順與大連港口的租賃權」與「中國對外蒙古獨立的承認」為條件，換取「蘇俄保證二戰後中國東北(滿州，Manchuria)領土主權的完整」與「不支持新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獨立」(Michael E. Clarke, 2011: 37)，1945 年 9 月，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透過蘇俄向國民政府表達停火協商之意願，自此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與國民政府保持分立狀態，直到 1949 年共軍入疆(Michael E. Clarke, 2011: 37，轉引自 Wang, 1999: 60-65; Wang, 1996: 413)。

中國共產黨軍隊於 1949 年進入新疆後，僅遭遇少數抵抗，其後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ETR)軍隊「民族軍(Yili National Army, YNA)」(Wang, 1996: 413)與中國國民黨新疆投降部隊(KMT)收編為「新疆生產與建設兵團(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XPCC)」，負責新疆地區的治理、開墾與經濟建設。(Michael E. Clarke, 2011: 45-46)。

1949 至 1955 年間，中國在新疆採取相對寬鬆的政策，推行共黨思想，並審慎對待蘇聯、中國與新疆三邊的關係，因此儘管仍有零星反抗事件，但新疆地區情勢尚稱穩固。中國於 1955 年設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即便根據當時統計，維吾爾族占新疆主要人口的 70%-75% 的多數，但中國共產黨在劃設自治區時，相關代表與自治區劃仍依新疆 13 個少數民族來區分，以圖削弱維吾爾族在新疆的政治力量(Michael Clarke, 2007: 10)。

1956 至 1976 年間，中國在新疆推行種族同化政策並且希望能翦除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力。1960 年代中蘇間的緊張及中國共產黨各項失當的政策為新疆地區各民族間帶來動盪與衝擊，如「大躍進」造成的饑荒與傷亡、「文化大革命」貶抑少數民族、摧毀清真寺及民眾傷亡等 (Michael E. Clarke, 2011: 43)。此時期蘇聯仍然沒有放棄拉攏新疆作為其與中國間緩衝區的戰略構想，據統計，1950 年至 1962 年間，在蘇聯的鼓動下，約有 6 萬至 10 萬維吾爾族人及哈薩克族人移民至蘇聯掌控之中亞地區以逃避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移民潮在 1962 年的 5 月達到高峰，此也造成了同年 5 月 29 日的伊塔事件³²(Yi-Ta Incident) (Ablet Kamalov,

³² 伊塔事件，中方稱「5・29 反革命暴亂事件」，發生在 1962 年的初夏。當時中國新疆約有 6.7

2009：117）。移民潮於 1963 年中蘇邊境關閉後始逐漸平息。

根據 1955 年的統計，維族人口約占新疆總人口的 70-75%，漢族只佔了 5%，。經歷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西進運動與許多為謀求經濟利益的漢族人口移入，1980 年新疆地區的漢族人口已上升至 40.45%，1990 年維持 40% 左右（Michael Clarke, 2007：8）；至 2012 漢族人口略降為 38.23%³³。

隨著 1979 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後，新疆地區與其他中國地區一樣，較毛澤東時期來得更為穩定。在胡耀邦民族政策改革下，較多的少數民族幹部擔任黨職及政府職位、推行更為溫和的文化政策。然而，政治氣氛的放鬆也提供了意見表達的空間，間接造成 80 年代的新疆學生示威浪潮，如 1985 年 12 月，2,000 名新疆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學校的非漢族學生抗議在新疆的核子試驗、漢人移民以及生育政策；1988 年及 1989 年的反漢、反污辱伊斯蘭教的遊行（James Millward, 2004：8）。

雖然兩次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不成，但逃往海外發展的維吾爾族領袖們仍然在中亞地區成為維族獨立運動的領導者（Yitzhak Shichor, 2007）。1991 年蘇聯解體，各加盟國紛紛以民族國家之姿獨立，這啟發了維吾爾族人開始追求自身獨立運動，尤以在 1950 年至 1960 年代移民至中亞各國的維吾爾族人為最，因此在中亞各國的維吾爾族開始串聯，形成許多經濟性、文化性的組織；同時也成立許多追求在維吾爾族的故鄉—新疆—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ETR）」或「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的政治組織，這些組織中亦分別有主張以武力建國的激進派與主張非暴力的溫和派，現今多數維吾爾族境外組織集中在哈薩克與吉爾吉斯（Ablet Kamalov, 2009：128-130）。

萬中國公民，通過以伊犁的霍爾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圖口岸為主的幾個重要邊境口岸，集體非法越境前往鄰國蘇聯。因此包括伊犁草原、阿爾泰草原在內的新疆邊境地區人口銳減，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自此時起開始進駐邊境農莊和牧場從事生產活動，並隨後在中蘇邊境建立了一帶國營農場，將其作為國防屏障。事件發生後，中蘇關係更加惡化，新疆境內的俄羅斯族受到排斥。發生的原因較為複雜，有中國經濟困難，蘇聯方面鼓動的現實原因，也有積累的歷史原因。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5%A1%94%E4%BA%8B%E4%BB%B6>

³³ 2012 年新疆統計年鑑，http://www.xjtj.gov.cn/stats_data/tjnj/2012nj/c1/c1.htm。

同時，中國大陸於 1990 年代對維吾爾族的管控壓迫逐漸加重，也讓支持獨立建國的維吾爾人大幅增加(Bhavana Singh, 2010 : 5)。1996 年 1 月，專門討論新疆問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於維護新疆穩定問題的會議紀要〉(簡稱「七號文件」)，以「當前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威脅為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為新疆問題作結語，使中國政府處理新疆問題進入新的階段(哈日巴拉，2008 : 28)。中國同時理解到新疆維吾爾分離運動的嚴重性及國際合作的需求，因此在 1996 年 4 月與中亞四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共同成立「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 Organization，於 2001 年轉為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許多以獨立建國為目標，存在於中亞各國的維吾爾族組織被迫轉變為非政治，以經濟與文化為主的組織，其中部分組織並轉與中國官方合作，以協助改善新疆地區維吾爾族人生活狀態(James Millward, 2009 : 71; Ablet Kamalov, 2009 : 128-129)。現今新疆內部的壓迫與中亞各國禁止維吾爾族的政治組織，造成許多維吾爾人遷往歐洲及北美，並已有小型社區與以維吾爾人為主體的組織成形(Ablet Kamalov, 2009 : 115；趙竹城，2011 : 40-47)。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國際反恐合作需求殷切，東突問題引起國際的關注，美國國務院在 2003 年 4 月發布的「2002 年全球恐怖主義模式報告(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03 : 125, 132)中，指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為恐怖組織。

2004 年 4 月 16 日，兩個設立在德國慕尼黑的維吾爾族分離運動的主要組織，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Eastern Turkistan National Congress)及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Youth Congress)決定合併成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 WUC)，該合併除可統一離散海外的維吾爾族人力量外，主要係回應 911 後國際反恐合作及中國指控維吾爾獨立運動組織為恐怖組織的影響，該代表大會主張以非暴力、民主和平手段推展東突厥斯坦運動，並以「自決(self-determination)」與「民主(democracy)」為訴求，避免使用「獨立(independence)」字眼。2004 年 10 月，一個更為激進的「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

(Eastern Turkistan Government in Exile, ETGE)」在美國華盛頓宣布成立，但不被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所承認(Yitzhak Shichor, 2007)。

2009 年 7 月 5 日，新疆發生七五事件，新疆維吾爾人族與漢族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肇因於廣東韶關玩具廠的漢、維工人鬥毆，升高到烏魯木齊維吾爾族大規模群眾示威暴動，攻擊警察，殺戮無辜漢人，最後轉變成漢族也集體向維吾爾族群眾進行反擊械鬥(侍建宇等，2010：177)，七五事件也讓中國政府重新展開對新疆新一波高壓與懷柔政策，學者侍建宇於 2009 年 10 月 13 日訪談尼赫魯大學（印度新德里）哈薩克學者卡肯諾夫(Adil Kaukenov, Institute of Economic Strategy, Kazakhstan)。卡肯諾夫於 2009 年 10 月上旬旅經新疆期間，發現在新疆邊界口岸貿易，例如霍爾果斯，由於嚴格人員流動管制，貿易活動降到只剩一成左右。他訪談新疆當地各個民族的朋友，發現烏魯木齊四處武警持槍站崗，維吾爾族處於極端恐怖狀態；漢族因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十分焦慮；哈薩克族則因為管制，放牧十分不便，且市場不熱絡，經濟收益大受影響。總之經濟活動大受打擊，當時社會幾乎處於完全戒嚴的狀態(侍建宇等，2010：176)。

新疆對中國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在現今科技發展下，該地區蘊藏大量石油、天然氣及稀有金屬礦產，中國大陸將其視為疏散沿海地區過於稠密的移民區域以及對經濟發展有益的天然資源以及通往中亞的門戶。另外，中國大陸積極阻止新疆獨立的企圖，在政治上也有防止骨牌效應—西藏及臺灣宣布獨立—的政治考量。清廷大臣左宗棠曾說過：「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而此地緣政治的戰略觀點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第三節 菲律賓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Autonomous Region in Muslim Mindanao, ARMM)位於菲律賓南部邊陲地帶(如圖 3-4)，其範圍包含了 5 個省分，分別為南拉瑙省(Lanao del Sur)、不含歌打托巴市的瑪京達瑙省(Maguindanao, excluding Cotabato City)、不含伊莎貝拉市的巴西蘭省(Basilan, excluding City of Isabela)、蘇祿省(Sulu)、塔威塔威省(Tawi-Tawi)(如圖 3-5)。面積為 1 萬 5,596.6 平方公里，自治區總人口為 325 萬 6,140 人³⁴，其中約有 90% 為穆斯林³⁵，自治區人口占菲律賓總人口比例 3.52%。



圖 3-4，菲律賓疆域圖。

圖片說明：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約位於圖下方紅圈處。

資料來源：www.worldatlas.com (檢索日期：2013/12/11)

³⁴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2012) Population and Annual Growth Rates for the Philippines.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資料來源：<http://www.census.gov.ph/statistics/census/population-and-housing>

³⁵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2003) Autonomous Region in Muslim Mindanao : Nine in Every Ten Persons were Muslims.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資料來源：<http://www.census.gov.ph/content/autonomous-region-muslim-mindanao-nine-every-ten-persons-were-muslims>

如圖 3-4 所示，菲律賓南邊相當靠近馬來西亞，而伊斯蘭教約於 14 世紀時藉由阿拉伯商人與傳教士傳入菲律賓南部地區。15 世紀時於現今蘇祿島(Sulu)建立伊斯蘭教蘇丹政權(Sultanate)，藉由蘇祿地區海域的國際商務貿易往來，穆斯林逐漸在民答那峨地區聚集，形成島嶼生活型態的網絡(Hussin Mutalib, 2008 : 64)。

16 世紀初，西班牙對菲律賓展開殖民統治，宣布該伊斯蘭島嶼區(all islands of archipelago) 歸屬西班牙政府所有，並且在菲律賓地區宣揚天主教，這對民答那峨地區的穆斯林原有的以部落領袖(datu)為首，在傳承自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的公社型態造成衝擊，剝奪了當地人對土地的所有權與租賃權，原有的家園被外來者佔領(Hussin Mutalib, 2008 : 6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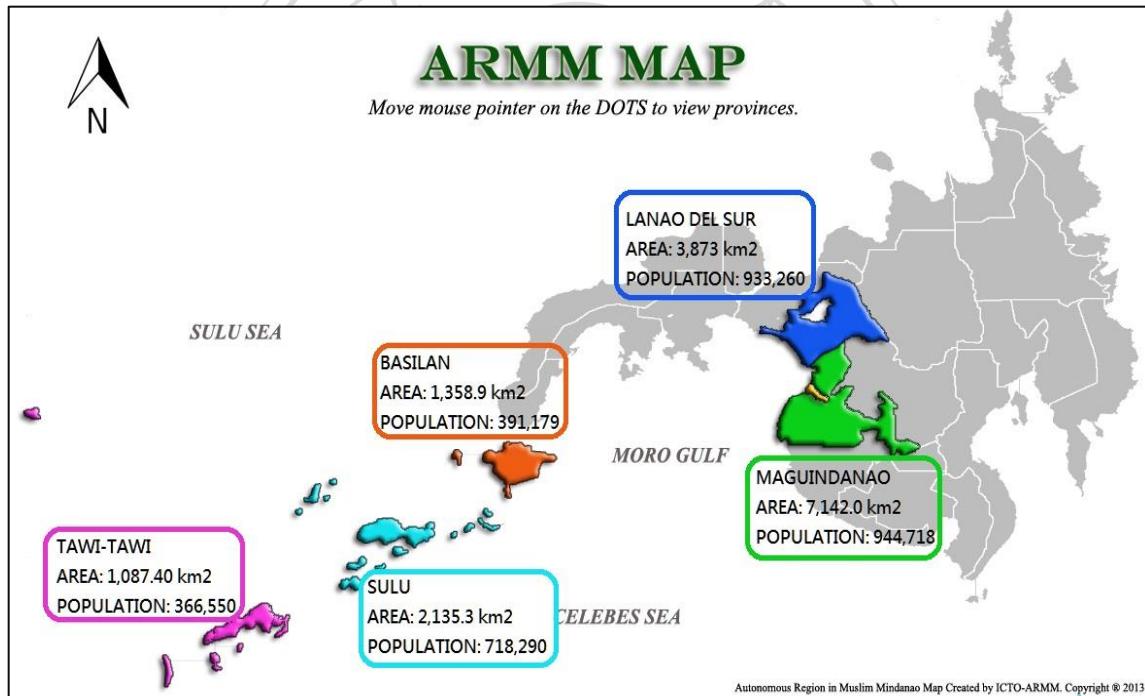


圖 3-5，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資料來源：<http://armm.gov.ph/armm-map/> (檢索日期：2013/12/29)

美國在 20 世紀初的殖民使得菲南穆斯林的困境更加惡化，在 20 世紀初期推出的一系列土地法令中規定，只要非經合法註冊登記的土地均自動歸屬美國政府所有，並可向宣稱擁有該土地的人索賠。然而，直到法院要求出示土地所有權狀之前，世襲傳承土地自祖先的穆斯林並沒有發現土地所有權及相關文書的重要性，

這導致許多原本屬於當地人的土地遭掠奪，其中不乏含有許多豐富天然資源的地區。美國政府於 1915 年廢除伊斯蘭蘇丹政權(Sultanate)，在缺乏蘇丹領導與聯繫網路的情形下，壓抑了反殖民運動的風潮(Hussin Mutalib, 2008 : 65)。

1903 年時，穆斯林人口約占民答那峨地區總人口 76%，而根據 1990 年的統計，穆斯林下降到僅占現今該地區總人口的 19%，且僅在民答那峨地區 21 省中的 5 省占多數人口(Miriam Coronel Ferrer, 2005 : 116)。1946 年菲律賓獨立後，持續的移民及同化政策導致菲律賓南部穆斯林不滿，復以 1968 年菲律賓政府處理科瑞吉多事件(Corrigidor)³⁶之方式造成菲南穆斯林廣泛不滿，當地伊斯蘭教領袖馬塔蘭(Datu Udtog Matalam)旋於 1968 年 5 月 1 日宣布組織「伊斯蘭教獨立運動(Muslim Independence Movement)」，要求建立範圍涵蓋蘇祿、巴拉望及民答那峨地區的獨立國家。(劉青雲，2004 : 126)

約於 1970 年初，一支結合民答那峨地區及蘇祿群島穆斯林的武裝分離組織，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 在密蘇阿里(Nur Misuari)的領導下成立了，該組織要求將菲南的穆斯林地區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另更為激進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³⁷) 於 1984 年在哈希姆薩拉馬(Salamat Hashim)領導下自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中分離出來(Miriam Coronel Ferrer, 2005 : 120)，擁有 1 萬 2,000 名兵力的 MILF 是現今菲律賓最大、武裝實力最強的叛軍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3)；1991 年，詹加蘭尼 (Abdurajak Abubukar Janjalani) 另成立比 MILF 更激進的阿布薩耶夫組織(ABU Sayyaf, ASG)。

1976 年 MNLF 與馬可仕(Marcos)政府在伊斯蘭教會議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OIC)的調停下簽訂「的黎波里協定」(Tripoli Agreement)，MNLF 放棄獨立建國訴求，而政府同意在南部 13 個省份建立自治區。但因後續公投結果無法使雙方滿意，1981 年 MNLF 宣布重新爭取獨立。

³⁶ 科瑞吉多事件：1968 年 3 月 17 日，菲律賓原本想訓練菲南地區的穆斯林軍隊，藉以滲透馬來西亞沙巴，但遭到穆斯林集體反抗，為數 28 至 64 名穆斯林新兵被上級軍官下令殺害，引起菲律賓全國穆斯林震驚與抗議(翁俊桔，2004 : 110)。

³⁷ Global 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milf.htm>

在 1976 年「的黎波里協定」後，許多 MNLF 及 MILF 的領導人陸續成為地區性的市長、省長甚至國會議員，因此形成與天主教及其他地區的政客不同的反對勢力；而菲律賓高度重視地方分權的民主制度也一定程度地分散了伊斯蘭的團結勢力。(John T. Sidel, 2007 : 44-46，轉引自 McKenna, 1998)

1996 年 9 月 2 日，菲律賓政府終於同意在菲南成立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Autonomous Region in Muslim Mindanao, ARMM)， MNLF 提出以停火換取菲律賓政府支持該組織領導人密蘇阿里(Nur Misuari) 擔任新成立之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ARMM)之總督，並與菲律賓拉莫斯(Ramos)政府簽訂和平協議；但不被 MILF 及 ASG 所接受，上開二團體仍持續與政府軍交火對峙。這些所謂的「叛軍勢力」其實在當地經營政治勢力、收取保護費，而且和馬尼拉的天主教政客及商人有多種不同形式的合作與利益交換，如政客與商人要求叛軍給予伐木、採礦和椰子種植等商業利益，而叛軍則在該地區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及特權(John T. Sidel, 2007:44-46, 轉引自 McKenna, 1998)。菲律賓政府在 1996 年後轉而跟 MILF 進行談判，雙方於 1997 年達成停火協議。

1998 年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以壓倒性勝利當選菲律賓總統，停火協議在 2000 年初期破裂，艾斯特拉達向 MILF 宣戰，扭轉了菲南穆斯林叛軍長期與馬尼拉政客間長期合作的局面。直至 2001 年艾若育(Gloria Macapagal-Arroyo)接任後，宣布和平解決菲南穆斯林問題，雙邊簽署停火協議。在 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前，菲律賓政府對「民答那峨問題」傾向和平解決，特別是在菲律賓的經濟成長大幅落後全球和平與穩定的經濟成長時，全球各界亦盼望菲律賓與菲南之衝突能和平發展以維持區域穩定，此趨勢在拉莫斯(Ramos)及艾若育(Arroyo)擔任總統時特別明顯。而在 911 事件後，在美國提供強有力的經濟及軍事援助下，菲律賓政府轉向強硬進而傾向開戰；另因為阿布薩耶夫組織的暴行，進而在菲國內部有許多支持軍事行動的聲音出現。近來，美國政府已經改變作法，開始提供民答那峨地區經濟援助方案，包括援助繳械的叛軍成員，但這筆基金仍有賴於政府與 MILF 間簽訂全面的停火和平協議。(Miriam Coronel Ferrer, 2005 : 138)

即便如此，衝突仍不因政治與經濟上的進展而停歇，因為爭取獨立的叛軍可以從衝突中獲得更多金錢與權力，他們也能在武裝衝突的保護傘下，透過從事非

法武器交易和其他犯罪活動中致富。就叛軍而言，911 事件後，複雜的局勢讓他們不想為「和平」作準備，而持續準備「戰爭」。雖然在菲律賓的美國軍隊聲明他們的掃蕩行動僅係針對阿布薩耶夫(Abu Sayyaf)組織，仍然有人擔心可能會有「溢出(spillover)」效應，影響到其他爭取獨立自治的武裝團體，使原本已經複雜的局勢更加複雜化。而一旦開戰，叛軍可能轉而從事更多犯罪行動或是完全無視政府法律以維繫戰爭開銷。(Miriam Coronel Ferrer, 2005 : 139)

2012 年 10 月 7 日，菲律賓政府與 MILF 簽署摩洛國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the Bangsamoro, FAB)，此協定以 MILF 放棄武裝作為條件，換取於 2016 年成立「摩洛國(Bangsamoro)」的政治實體取代現在的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Noel Morada, 2012)。2013 年 7 月 MILF 與菲政府簽訂財源分享協議(wealth-sharing deal)，根據該協議，摩洛國可分得民答那峨當地礦產(含金、銅)75% 的收入，而菲律賓政府只拿剩下的 25%；另石油及天然氣部分則各分 50%³⁸，藉此讓預計於 2016 年成立的摩洛國有足夠的財源與預算，向雙邊的和平又邁進一大步。

自 1996 年後，MNLF 在菲南的影響力大減。2013 年 8 月間，MNLF 主席密蘇阿里可能不滿將被邊緣化，以菲律賓政府不尊重 1996 年與 MNLF 簽訂的和平協定為由，宣布成立「莫洛共和國」(Bangsamoro Republik)。另於 2013 年 9 月向菲律賓第三大城三寶顏市(Zamboanga City)發動攻擊並挾持約 180 名人質，企圖於市政府升旗宣示獨立³⁹，該人質挾持行動最終由政府軍解救人質後告終。

³⁸ CNN 網路新聞，2013 年 7 月 15 日；菲律賓總統辦公室下設「總統和平進程顧問辦公室」網站 (Office of the Presidential Adviser on the Peace Process, OPAPP)，2013 年 7 月 14 日。資料來源：<http://edition.cnn.com/2013/07/15/world/asia/philippines-rebels-deal/index.html> 及 <http://opapp.gov.ph/milf/news/gov%20%99t-milf-sign-wealth-sharing-annex-bangsamoro>

³⁹ CNN 網路新聞，2013 年 9 月 11 日；中央社即時新聞，2013 年 9 月 10 日。<http://edition.cnn.com/2013/09/11/world/asia/philippines-muslim-standoff/> 及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309100173-1.aspx>

第四節 小結

根據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所建立的國際衝突研究(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earch)內的種族權力關係資料庫(Ethnic Power Relations (EPR)dataset ver2.0)的資料，篩選國家名稱(State)為俄羅斯(Russia)，團體(Group)為車臣人(Chechens)、篩選國家名稱(State)為中國(China)，團體(Group)為維吾爾人(Uyghur)及篩選國家名稱(State)為菲律賓(Philippines)，團體(Group)為摩洛人(Moro)之資料整理如表 3-1；該資料庫顯示了自1946年起至2009年止，個案的政治菁英或其民族代表的權力狀態變化，其狀態可分為區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分離自治(Separatist Autonomy)、無權力(Powerless)及受歧視(Discriminated)4種類型。

綜上，整理車臣、新疆與菲南衝突之歷史背景因素如表 3-2。透過研究個案分離運動的歷史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其分離運動均有其獨特的因素存在，亦包含了相當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分離團體領導者與團體的利益分配、國際情勢的影響(帝國主義殖民、共產黨革命、日本太平洋戰爭、二戰、國共內戰、冷戰、中蘇衝突、蘇聯解體造成民族獨立運動浪潮、911 事件等)與其他國際勢力的利益分配結果等。

在此如此多的因素影響下，如果僅僅以所謂「文明衝突」、「伊斯蘭的血腥邊界」或「冷戰後文明衝突取代意識型態衝突」等因素來理解個案分離運動與恐怖主義可能略嫌不足，也可能產生所謂高爾頓問題(Galton's problem)。亦即，在國際層次的角度觀察國家間或國家內部看似有所關聯的特徵，其實有倒果為因的邏輯問題，其實這些看似相關的特徵間並不存在著任何關聯性。

為了更進一步釐清衝突與個案分離意識、恐怖主義的關係，實有必要蒐集個案量化衝突數據，並據以研判個案是否屬於「文明衝突」。

表 3-1，1946 至 2009 年個案種族權力關係。

團體	國家	期間	權力狀態
車臣	蘇聯	1946-1956	受歧視
	蘇聯	1957-1990	區域自治
	俄羅斯	1991-2002	分離自治
	俄羅斯	2003-2005	區域自治
	俄羅斯	2006-2009	區域自治
維吾爾	中國	1946-1948	—
	中國	1949-1950	無權力
	中國	1951-1958	無權力
	中國	1959-1965	無權力
	中國	1966-1976	—
	中國	1977-1983	無權力
	中國	1984-2007	區域自治
	中國	2008	區域自治
	中國	2009	受歧視
摩洛	菲律賓	1946-1970	無權力
	菲律賓	1971-1985	分離自治
	菲律賓	1986-1988	分離自治
	菲律賓	1989-2009	區域自治

資料來源：ETH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earch⁴⁰ <http://www.icr.ethz.ch/data>，筆者自行製表

⁴⁰ 權力狀態分類說明如下：

區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團體內的菁英成員並沒有中央行政權，但是在次國家級，中央政府轄下的省、區等組織擁有影響力，其階層分類因國家而有所不同(Elite members of the group have no central power but some influence at the substate level, that is, one level bel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may be the substate, the provincial, or the district (though not the local) level, depending on the ver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分離自治(Separatist Autonomy)：地區政府被種族團體的代表所控制，並宣稱其統治下領土獨立於中央政府，此分類與區域自治不同於其政府的代表常常將其自身排除於中央政府的權力之外。(A related case is when local governments controll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an ethnic category have declared their territory to be independen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category differs fundamentally from “regional autonomy” in that group representatives have often excluded themselves from central state power.)

無權力(Powerless)：團體的菁英代表在國家或省、區沒有任何政治權力，但也沒有明顯被歧視。(Elite representatives hold no political power at either the national or the regional level without being explicit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受歧視(Discrimination)：團體成員受到積極的、有意的或是針對性的歧視，意圖將其排除於國家與區域權力之外。此種歧視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各種形式。(Group members are subjected to active, intentional, and targeted discrimination, with the intent of excluding them from bo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power. Such active discrimination can be either formal or informal).

表 3-2，車臣、新疆與菲南衝突之歷史背景因素比較表。

政治位階	曾經支持分離或介入的外國勢力	與境外勢力合作以謀求獨立	是否曾獲得外交承認	分離團體或獨立政府是否擁軍隊	歷史上實質獨立時間	區域內主要民族與其他民族人口比	因追求分離或獨立所發動之恐怖攻擊	分離運動現況	從原分離組織分裂出為更激進的組織	分離組織為閻把持	建立教合—伊斯蘭國家的呼籲	首次呼籲建立獨立國家的時間	與政府簽訂和平協定	主要恐怖組織	伊斯蘭化時間	戰略重要性	文明斷層線	
車臣共和國	共和國	OIC、中東阿拉伯國家	OIC、二戰德國	○	○(1991-1998)	1991-1998	9.5 : 0.5 (車臣人:其他民族)	○	零星恐怖攻擊以追求獨立	○(巴薩耶夫及其他恐怖組織)	○(巴薩耶夫)	○	1990	○	車臣游擊隊	18-19世紀	油管經戰略要衝	伊斯蘭、東正教
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自治區	OIC、美國、馬來西亞	OIC	X	○(1970年迄今)	15-16世紀	9 : 1 (摩洛穆斯林:其他民族)	○	未來成立比自治區更高等級的「摩洛國」	○(MILF與ASG)	○(現仍為閻把持)	○	1968	○	A S G	14-16世紀	天然資源豐富	伊斯蘭、天主教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自治區	俄羅斯、中國、英國、美國	1930年代俄羅斯、1990後美國	○	○(1944-1949)	1933-1934及1944-1949(限於西北部地區)	5:4:1(維族:漢族:其他少數民族)	○	根據地在海外、零星恐怖攻擊	○(ETIM與ETGE)	○(1930-1940年代)	○	1930	X	E T I M	13-17世紀	天然資源富戰略要衝、示範作用	伊斯蘭、儒教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第四章 衝突量化數據整理與初判

杭廷頓認為衝突的形式可以由強到弱，而有各種層次上的變化：「斷層線戰爭時斷時續，可能爆發成大規模的暴力，再逐漸降溫為低強度的戰爭或粗暴的敵意。」（黃裕美譯，1997：346）因此就衝突的類型區分，可分為國家間戰爭、國家間低度衝突(MID)、內戰、跨境恐怖攻擊、國內恐怖攻擊、政治紛爭(Disputes)等。

因此，本章蒐集「風險少數(MAR)資料庫」、「國家失敗問題集資料庫(PITF)」、「戰爭關聯計畫(COW)資料庫」、「蘭德公司恐怖主義年表資料庫(RAND)」及「研究和應對恐怖主義國家聯盟(START)資料庫」所載個案之各種形式衝突，從最低度的「抗議規模」，到低度衝突的「反叛規模」，再到「戰爭」以及「恐怖主義」；上開資料庫有提供衝突發生次數、參加衝突的人數、或因衝突傷亡之人數等資料，均可提供本文用來衡量衝突程度的高低，並可以此量化資料可以概略了解衝突的發展過程與衝突特別激烈的某些特定時間點。

第一節 風險少數(MAR)資料庫所載個案衝突

本節係根據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所提供之風險少數資料庫「Minority At Risk⁴¹」內資料，結合其 1945-2003 及 2004-2006 兩筆資料庫內容，篩選「年度(year)」範圍為 1970 年至 2006 年；欄位「國家(Country)」為「俄羅斯(Russia)」、「蘇聯(USSR)」、「中國(China)」及「菲律賓(Philippines)」，再篩選欄位「團體(group)」為「車臣(Chechens)」、「摩洛(Moros)」及「土庫曼(Turkmen)⁴²」；

⁴¹ Minority At Risk Project 資料庫：<http://www.cidcm.umd.edu/mar/>；在此包含其 1945 至 2003 年及 2004 至 2006 年之兩筆資料庫。

⁴²此並非指中亞國家「土庫曼(Turkmenistan)」或「土庫曼族(Turkmens)」其資料庫將中國內部的 Turkmen 定義為「combines Kazakhs with Uighurs」，亦即含有哈薩克人及維吾爾族人之泛突厥少數民族，詳見「mar-codebook_040903」(<http://www.cidcm.umd.edu/mar/>)，頁 111。

另抓取欄位「prot」、「proti」⁴³；「prot」及「proti」資料代表個案中少數團體捍衛自身利益或反抗當局施政有關之抗議規模，以年度依序排列彙整如表 4-1；另選取 MAR 資料庫之「rebel」、「reb」⁴⁴之「反叛規模」資料，將個案「反叛規模」以 0-7 方式呈現，包括了恐怖活動、大中小規模的游擊隊活動及內戰等形式的反叛等，茲彙整如表 4-2。

⁴³其表內數字 0 至 5 分別代表不同抗議規模，數字越大代表抗議及示威遊行人數越多、規模越大。詳見「mar-codebook_040903」(<http://www.cidcm.umd.edu/mar/>)，頁 87。其說明如下：

抗議規模指數 Protest Index(prot, proti)：

0 未發現 None reported

1 提出抗議或不滿—Verbal opposition : Requests by a minority-controlled regional group for independence (public letters, petitions, posters, publications, agitation, court action, etc.).

2 象徵性的抵抗—Symbolic resistance : Sabotage, symbolic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OR political organizing activity on a substantial scale (e.g. sit-ins, blockage of traffic).

3 小型規模示威—Small demonstrations : A few demonstrations, rallies, strikes, and/or riots, the largest of which has total participation of less than 10,000

4 中型規模示威—Medium demonstrations : Demonstrations, rallies, strikes, and/or riots, the largest of which has total participation between 10,000 and 100,000

5 大型規模示威—Large demonstrations : Demonstrations, rallies, strikes, and/or riots, the largest of which has total participation over 100,000

⁴⁴ 其表內數字 0 至 7 分別代表不同反叛規模，數字越大代表參加恐怖活動、大中小規模的游擊隊活動及內戰人數越多、規模越大。其說明如下：

反叛規模指數 Rebellion(rebel, reb)

0 未發現 None reported

1 零星的政治叛亂、恐怖主義活動(少於 6 件)Political banditry, sporadic terrorism (fewer than 6 events)

2 恐怖主義活動(大於 6 件)Campaigns of terrorism (more than 6 events)

3 區域性的叛亂—Local rebellions : Armed attempts to seize power in a locale except cases that are the beginning of a protracted guerrilla or civil war during the reported year.

4 小型規模游擊隊活動—Small-scale guerrilla activity : Includes all three of the following traits

- fewer than 1000 armed fighters
- sporadic armed attacks (less than 6 reported per year)
- attacks in a small part of the area occupied by the group (or in one or two other locales)

5 中型規模游擊隊活動—Intermediate guerrilla activity : Includes one or two of the defining traits of large-scale activity and one or two of the defining traits of small-scale activity

6 大型規模游擊隊活動—Large-scale guerrilla activity : Includes all three of the following traits

- more than 1000 armed fighters
- frequent armed attacks (more than 6 reported per year)
- attacks affecting large part of the area occupied by group

7 內戰—Civil war : Protracted civil war fought by rebel military. Has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scale guerrilla activity, plus rebels control large scale base areas that are secure over time

表 4-1，個案 1970 至 2006 年抗議規模分析表。

抗議規模		分離團體		
資料欄位	年度	CHECHENS	MOROS	Turkmen
proti	1970	0	2	無資料
	1975	0	2	0
	1980	0	2	4
	1985	3	2	2
prot	1986	無資料	2	2
	1987	無資料	2	2
	1988	無資料	2	2
	1989	無資料	2	2
	1990	無資料	2	3
	1991	無資料	2	3
	1992	3	2	3
	1993	3	2	3
	1994	3	2	3
	1995	4	2	4
	1996	3	3	4
	1997	2	4	4
	1998	0	3	4
	1999	4	0	2
	2000	4	0	0
	2001	3	1	1
	2002	3	4	1
	2003	3	4	1
	2004	3	3	3
	2005	4	3	0
	2006	無資料	1	0

資料來源：Minority At Risk Project <http://www.cidcm.umd.edu/mar/>，筆者自行繪製。

表 4-2，個案 1970 至 2006 年反叛規模分析表。

反叛規模		分離團體		
資料欄位	年度	CHECHENS	MOROS	Turkmen (combines Kazakhs with Uighurs)
rebel	1970	0	6	0
	1975	0	4	0
	1980	0	3	0
	1985	0	6	0
reb	1986	無資料	5	0
	1987	無資料	5	0
	1988	無資料	5	0
	1989	無資料	5	0
	1990	無資料	5	2
	1991	無資料	5	2
	1992	3	5	2
	1993	3	5	2
	1994	7	4	2
	1995	6	5	2
	1996	6	4	2
	1997	3	6	2
	1998	0	6	2
	1999	7	6	2
	2000	7	6	2
	2001	7	6	0
	2002	7	6	0
	2003	5	6	0
	2004	5	6	0
	2005	5	6	0
	2006	5	6	0

資料來源：同表 4-1，筆者自行繪製。

經查表 4-1 及表 4-2 資料發現，俄羅斯車臣在 1985 至 1990 年間開始有小型規模要求獨立之抗議示威活動，在 1995 年升高為中型規模示威活動，其後逐漸降溫，至 1998 年無示威活動；復於 1999 年起，要求獨立之示威活動再度升高。另反叛規模在 1994 年及 1999 至 2002 年間升高為「7」的「內戰」，為反叛規模的最高峰。

中國新疆於 1980 至 1985 年間開始有中型抗議示威活動，其後降為小型及零星抗議示威活動，至 1990 年開始升高，直至 1995 年到達高峰，至 1999 年後才逐漸平息，2000 年無抗議示威活動，2004 年升高為小型抗議示威活動，2005 及 2006 年均無示威抗議活動。另反叛規模僅在 1990 至 2000 年間為規模「2」的小規模恐怖活動。

菲律賓摩洛方面則自 1970 年起有小型規模抗議示威活動，於 1997 年達到高峰後逐漸降溫，1999 及 2000 年均無抗議示威活動，復於 2001 年開始有升溫跡象，抗議示威活動於 2002 年至 2003 年間達到高峰後下降。另反叛規模大多均保持在規模「5」至「6」的「中大型游擊隊」活動，自 1997 年至 2006 年均維持相當高度的衝突。

根據上述數據，結合前章所蒐集的個案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之歷史背景，我們可以假設個案抗議規模可能均與其國內政治因素有關，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於 1985 年上臺推動民主化改革，其結果使車臣在 1985 年開始有示威抗議活動；而菲律賓的抗議示威活動則自 1997 年政府與 MILF 達成停戰協議後逐漸降溫，於 2000 年協議破裂後，衝突再度升溫；另中國同樣於 1978 年改革開放後，政治氣氛放鬆，新疆於 1980 年開始有示威遊行活動。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政治管制措施再度嚴厲，但 1991 年蘇聯崩解各加盟國獨立風潮，造成 1991 年後新疆地區追求獨立聲音再起，因此抗議規模升高。另 1994 及 1999 兩次車臣戰爭、1997 菲律賓政府與叛軍簽訂和平協議等亦為個案「反叛規模」大幅升高的原因。

茲整理表 4-1 及表 4-2 資料如圖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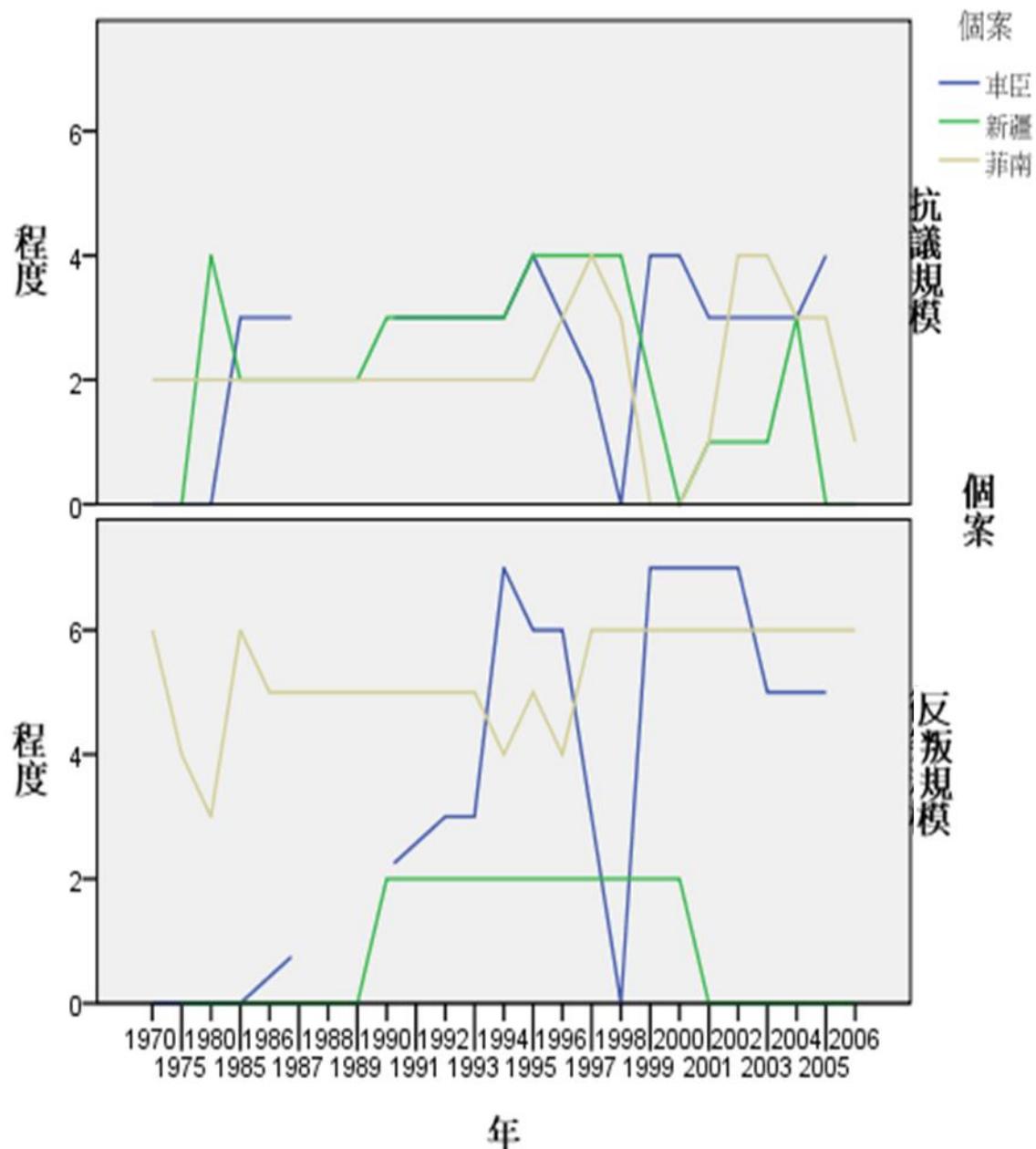


圖 4-1，1970 至 2006 年個案抗議及反叛規模圖。

資料來源：同表 4-1，筆者自行製圖。

第二節 國家失敗問題集資料庫(PITF)所載個案衝突

本節係根據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國家失敗問題集資料庫」(PITF State Failure Problem Set 1955-2012 Ethnic Wars⁴⁵)統計個案政府與分離運動團體間曾發生之戰爭與武裝衝突資料，試圖透過戰爭發生頻率及雙方傷亡人數來檢視個案衝突。

根據 PITF 資料庫篩選與俄羅斯(RUS)車臣(Chechnya)、中國大陸(CHN)新疆維吾爾族(Xinjiang Uyghers)及菲律賓(PHI)摩洛(Moros)有關，1955 年至 2012 年的種族武裝衝突資料，資料庫內載有參加武裝衝突的動員人數及死亡人數，可取得 1955 年至 2012 年間個案種族衝突的變化資料。

PITF 資料庫內所載有關俄羅斯車臣的種族武裝衝突在 1955 至 2012 年間計有 3 筆資料，即有 1994 年 8 月至 1996 年 8 月間的第一次車臣戰爭、1999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第二次車臣戰爭及 2008 年 5 月開始至今的伊斯蘭武裝分子反抗運動，分述如下：

一、1994 年 8 月至 1996 年 8 月第一次車臣戰爭：蘇聯解體後，車臣民族主義高漲，在 1994 年 8 月，車臣臨時議會意圖發動政變以翦除支持車臣民族主義的車臣總統杜達耶夫的職位，俄羅斯軍隊以恢復該地區秩序為名進軍車臣，雙方激戰後戰情陷於膠著，雙方於 1996 年 8 月達成停戰協定⁴⁶。

二、1999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第二次車臣戰爭：車臣武裝分子於 1999 年

⁴⁵ 統計期間 1955-2012, PITF State Failure Problem Set, 1955-2012 Ethnic Wars 2012,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⁴⁶ PITF 資料庫原文為”Nationalist sentiments sweep Chechnya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In August 1994,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of Chechnya attempts a coup to remove Chechen nationalist President Dudayev. Civil war ensues and Russian troops are called in to restore order in the region. Intense fighting results in a stalemate; a truce agreement is reached in August 1996.”資料來源：同前註。

8 月意圖擴大控制範圍至鄰近的達吉斯坦共和國，引發意欲實行中央集權的俄羅斯政府與車臣間的第二次車臣戰爭⁴⁷。

三、2008 年 05 月至今(2012 年)：自 2008 年 5 月起，在俄羅斯東部外高加索地區的車臣伊斯蘭武裝分子已經在接壤的喬治亞（車臣，達吉斯坦和印古什）重新集結，並在該區域進行系統化和持續的攻擊⁴⁸。

有關菲律賓摩洛人的種族武裝衝突，PITF 資料庫(1955-2012)內所載其時間橫跨自 1972 年至今(2012 年)，其內容記載，以 MNLF 為首的穆斯林摩洛游擊隊爭取獨立反抗運動，自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下降為零星的反抗運動⁴⁹。

有關中國大陸新疆的種族武裝衝突，PITF 資料庫(1955-2012)內記載自 1988 年 7 月開始，持續至 1998 年 12 月止，其內容記載，新疆維吾爾族持續對中國漢族的控制有偶發的暴力抗議行動，1996 年後因上開暴力抗議行動升級為恐怖活動因而逐漸下降⁵⁰。

另選取 PITF 資料庫「MAGFATAL⁵¹」及「MAGFIGHT⁵²」資料，其分別以

⁴⁷ PITF 資料庫原文為”Attempts by Chechen fighters to extend control to neighboring Dagestan in August 1999 triggers new war in Chechnya as Russian forces impose central authority.” 資料來源：同前註。

⁴⁸ PITF 資料庫原文為”Islamist militants in the eastern Trans-Caucasus region of Russia bordering on Georgia (Chechnya, Dagestan, and Ingushetia) have regrouped and have been conducting systematic and sustained attacks in the region since May 2008.” 資料來源：同前註。

⁴⁹ PITF 資料庫原文為”Muslim Moros led by the MNLF mount a guerrilla war for independence that declines after the mid-1970s into sporadic insurgency.” 資料來源：同前註。

⁵⁰ PITF 資料庫原文為”Episodic violent protests by Uighers in Xinjiang province against Han Chinese control escalate into terror campaign by 1996.” 資料來源：同前註。

⁵¹ 個案武裝衝突期間所導致死亡人數說明：MAGFATAL：Scaled annual number of fatalities related to fighting (range 0-4; 9=missing) 0 = less than 100 fatalities, 1 = 100 to 1000 fatalities, 2 = 1000 to 5000 fatalities, 3 = 5,000 to 10,000 fatalities, 4 = more than 10,000 fatalities, 9 = no basis for judging. 資料來源：同前註。

⁵² 參加武裝衝突的戰鬥人員或活動人員數說明：MAGFIGHT：0 = less than 100 combatants or activists, 1 = 100 to 1000 combatants or activists, 2 = 1000 to 5,000 combatants or activists, 3 = 5,000 to 15,000 combatants or activists, 4 = more than 15,000 combatants or activists, 9 = no basis for judging. 資料來源：同前註。

量化數字 0 至 4 代表上開個案武裝衝突期間所導致死亡人數(MAGFATAL)與參加武裝衝突的戰鬥人員或活動人員數(MAGFIGHT)變化，以上開資料繪製「1972 至 2012 年個案武裝衝突死亡人數變化圖」(如圖 4-2)及「1972 至 2012 年個案參加武裝衝突戰鬥人員或活動人員數目變化圖」(如圖 4-3)，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除菲律賓外，俄羅斯車臣及中國新疆的衝突，不論在死亡人數與參加戰鬥人員或活動人數上，在 1991 年後，均有升高的趨勢。

根據上述數據，結合前章所蒐集的個案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之歷史背景可知，俄羅斯車臣參與衝突死亡人數、戰鬥人員及活動人員均分別在 1994 年及 1999 年升高，明顯與兩次車臣戰爭有關；另中國新疆參與衝突死亡人數、戰鬥人員及活動人員數據則開始於 1988 年，推測與其國內政治改革開放有關，而 1991 年後武裝衝突加劇之原因，推測與蘇聯崩解各加盟國獨立有關。

1972 至 2012 年個案武裝衝突死亡人數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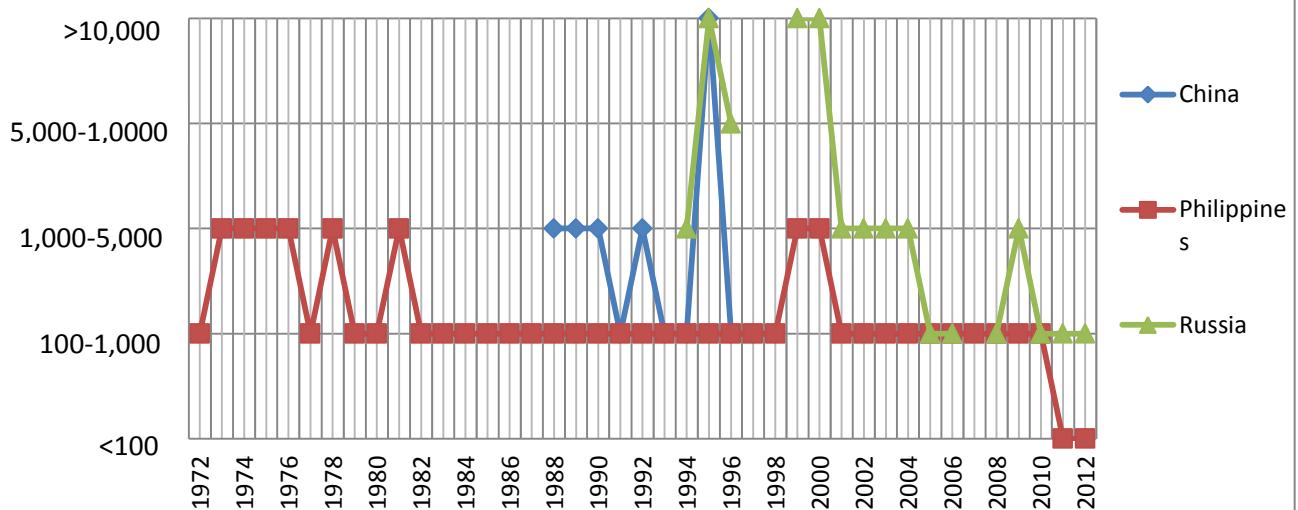


圖 4-2，1972 年至 2012 年個案武裝衝突死亡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PITF State Failure Problem Set 1955-2012 Ethnic Wars 2012，<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inscr.htm>，筆者自行製圖。

1972至2012年個案參加武裝衝突戰鬥人員或活動人員數目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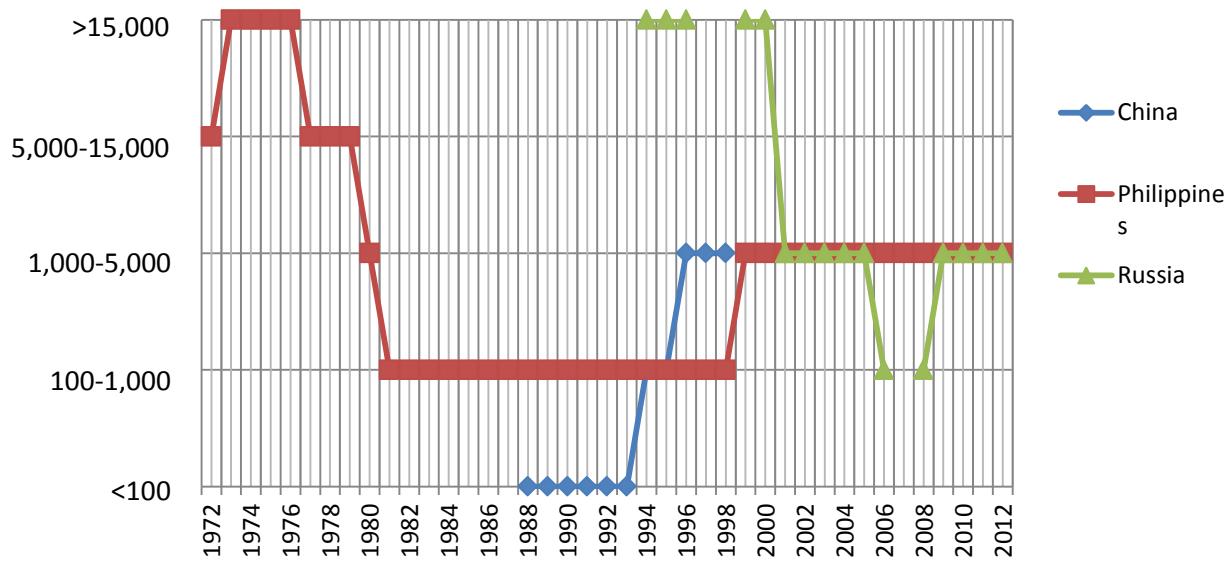


圖 4-3，1972 年至 2012 年個案參加武裝衝突戰鬥人員或活動人員數目變化表。

資料來源：同圖 4-2。筆者自行製圖。

第三節 戰爭關聯計畫(COW)資料庫所載個案衝突

本節係根據原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辛格(J. David Singer)所創建，現移轉至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之「戰爭關聯計畫資料庫」⁵³ (Correlates of War)統計 1816 至 2007 年，世界各國家內部戰爭(Intra-State War)資料，篩選交戰方 Side A 為俄羅斯(Russia)且交戰方 Side B 包含車臣(Chechnya)之資料，顯示俄羅斯與車臣間交戰計有 3 次(如圖 4-4)，分別為 1818 年至 1822 年沙俄時期征服喬治亞、達吉斯坦與車臣的第一次高加索戰爭、1994 年至 1996 年的第一次車臣戰爭及 1999 年至 2003 年的第二次車臣戰爭，而交戰雙方死亡人數比較如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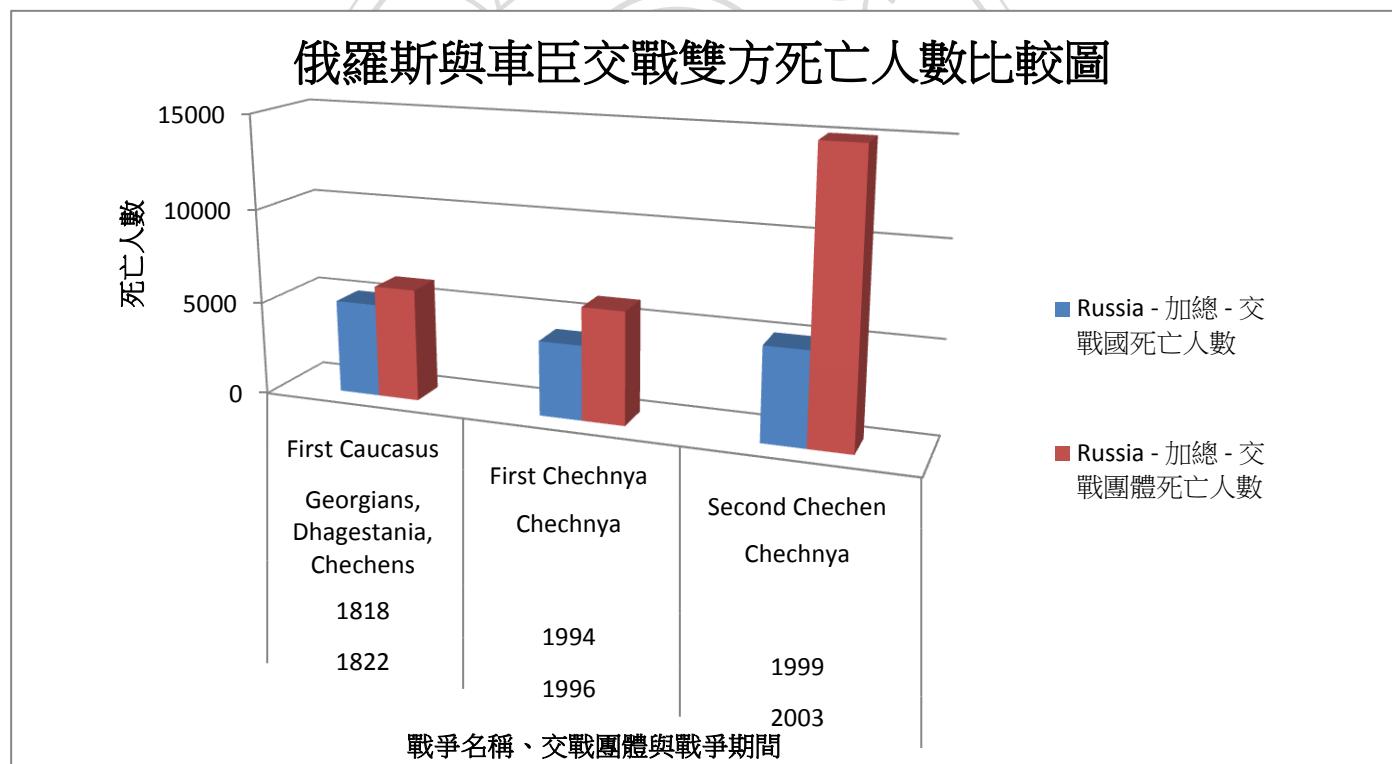


圖 4-4，俄羅斯與車臣交戰雙方死亡人數比較圖。

資料來源：Correlates of War Intra-State War Data (v4.0)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筆者自行製圖。

篩選 COW 戰爭資料庫交戰方 Side A 為中國(China)且交戰方 Side B 或戰爭

⁵³ 統計期間 1816-2007, Correlates of War, Intra-State War,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名稱(War Name)包含新疆(Xinjiang 或 Sinkiang)及穆斯林(Muslims)之資料，顯示的戰爭資料僅存有 4 筆 19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期資料(如圖 4-5)分別為 1862 年至 1873 年的同治新疆回變、1864 至 1871 年新疆回變、1876 至 1877 年清廷弭平回變及 1931 至 1934 年的新疆回變，但僅有 1931 至 1934 年的新疆回變有記載雙方死亡人數，如圖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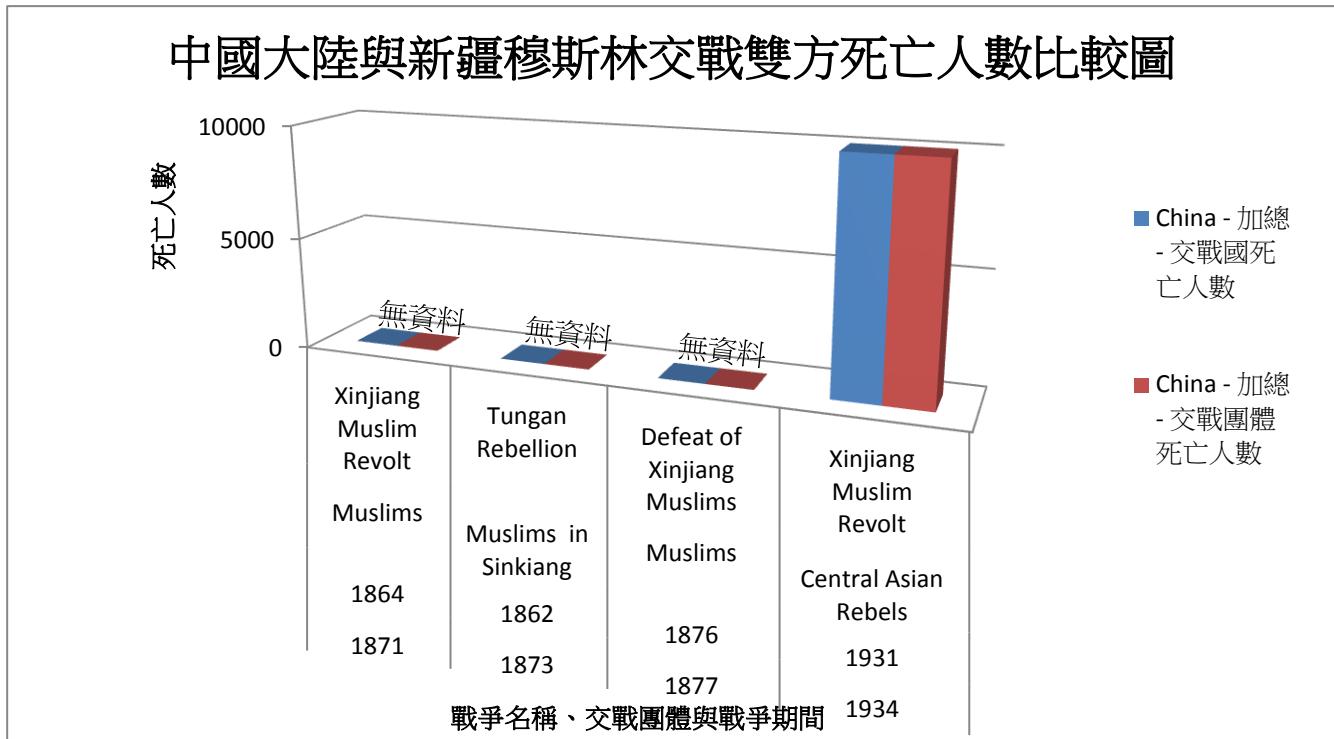


圖 4-5，中國大陸與新疆穆斯林交戰雙方死亡人數比較圖。

資料來源：同圖 4-4，筆者自行製圖。

篩選 COW 戰爭資料庫交戰方 Side A 為菲律賓(Philippines 或 Philippines)且交戰方 Side B 為 MNLF Moros 或 MILF 或 ASG、戰爭名稱(War Name)包含摩洛(Moros)之資料，顯示的戰爭資料有 4 筆，分別為 1972 至 1981 年的第一次菲律賓摩洛戰爭、2000 至 2001 年的第二次菲律賓摩洛戰爭、2003 年間的第三次菲律賓摩洛戰爭及 2005 至 2006 年”Philippine Joint Offensive”，雙方交戰死亡人數如圖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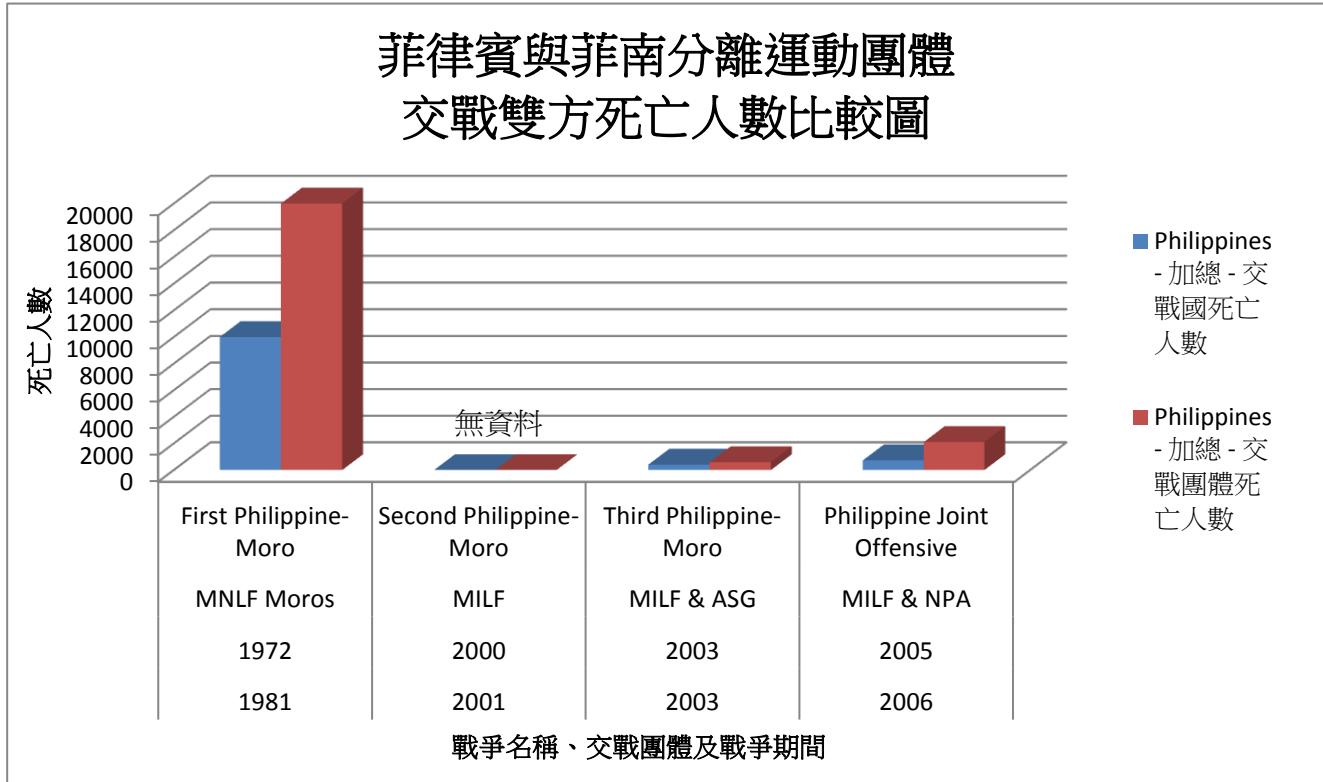


圖 4-6，菲律賓與菲南分離運動團體交戰雙方死亡人數比較圖。

資料來源：同圖 4-4，筆者自行製圖。

綜合整理 COW 戰爭資料庫的資料我們可以發現，俄羅斯與車臣、中國與新疆的戰爭早在 18 世紀就已經開始，種族與文化衝突的歷史淵源相當深遠；另菲律賓與摩洛人的武裝衝突則開始於 1972 年並持續至今。由此可以發現，個案衝突歷史由來已久，新疆及車臣武裝衝突歷史更早於菲南地區，而新疆自 1934 年獨立戰爭後至今(2012)年就再也沒有戰爭衝突資料；車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90 年間(冷戰期間)無武裝衝突與戰爭相關資料，直至 1994 年及 1999 年分別發生獨立戰爭。

第四節 蘭德公司恐怖主義年表資料庫(RAND)及研究和應對恐怖主義國家聯盟(START)資料庫所載個案衝突

本節係根據美國蘭德公司「蘭德公司恐怖主義年表資料庫」(RAND-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⁵⁴)與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研究和應對恐怖主義國家聯盟」(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⁵⁵選取與個案相關之恐怖攻擊資料。

筆者根據「RAND-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資料庫篩選欄位「國家(Country)」為俄羅斯(Russia)、車臣(Chechnya)、菲律賓(Philippines)及中華人民共和國(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再將「犯罪者(Perprtrator)」欄位篩選含有與個案相關之恐怖組織，如 Black Widows, Doku Umarov, Islamic Brigade of Ramzan Ahmadov, Jamaat Shariat, Kata'ib al-Khoul, Movsar Barayev Gang, Rappani Khalilov, Rasul Makasharipov, Riyad us-Saliheyn Martyrs' Brigade, Sword of Islam, Uygur Holy War Organization, Abu Sayyaf, Abu Sayyaf Group (ASG), MILF,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等並分類歸納，為避免遺漏其他相關之恐怖組織所策動之恐怖攻擊相關資料，另檢視犯罪者(Perprtrator)欄位為「未知(Unknown)」及「其他(Other)」之「描述(Description)」內容，將當局「疑為」或調查方向指向為車臣「Chechen」或維吾爾(Uyghur)或摩洛(Moro)等分離主義分子「Seperatist」之資料，所得恐怖攻擊次數、受傷及死亡人數如表 4-3；並繪製「1975 至 2009 年與個案相關之恐怖攻擊次數變化圖」如圖 4-7；「1975 至 2009 年個案因恐怖攻擊受傷及死亡人數變化圖」如圖 4-8。

⁵⁴ 統計期間 1975-2009，RAND-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http://www.rand.org/pubs/rgs_dissertations/RGSD30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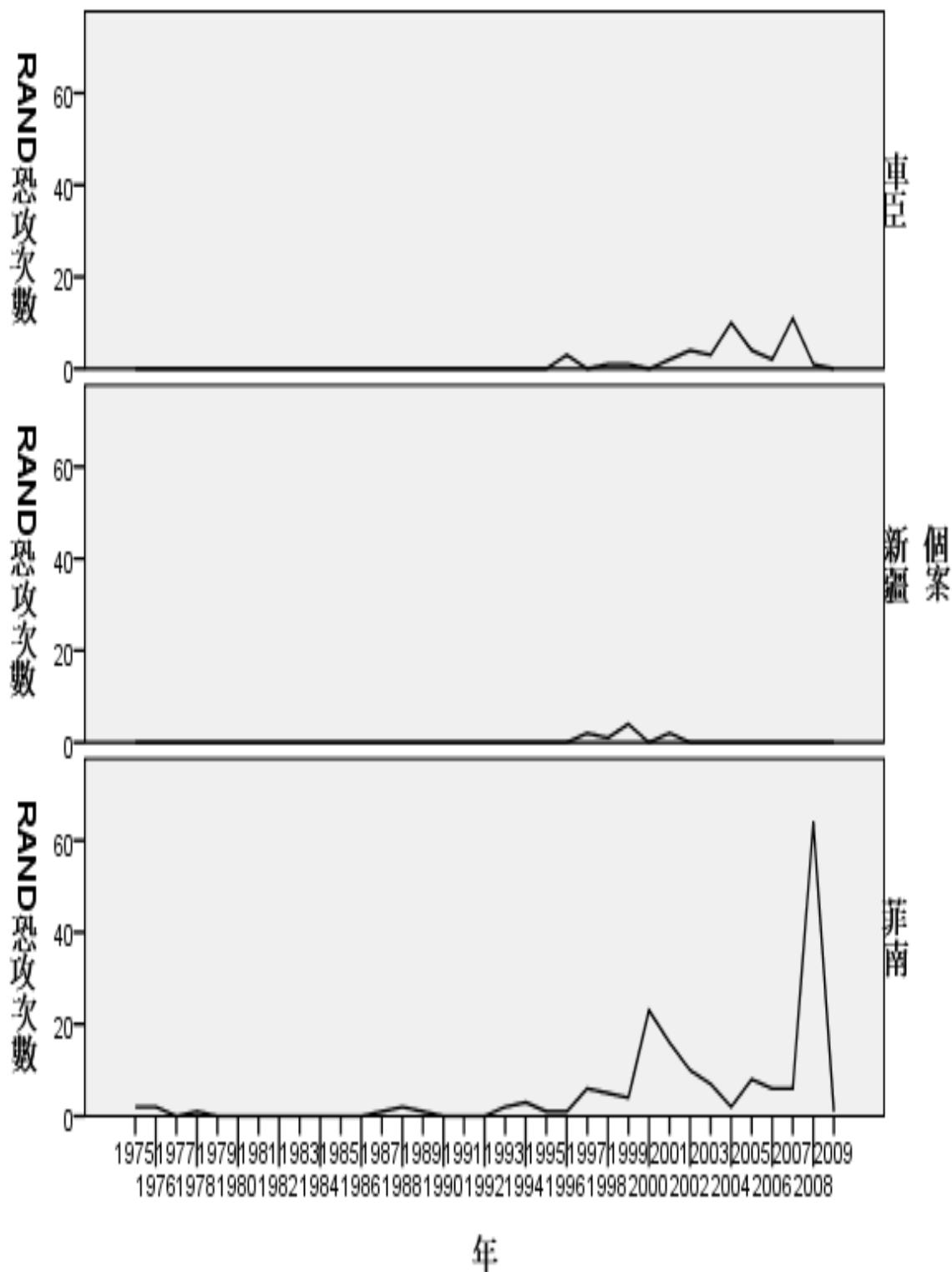
⁵⁵ 統計期間 1975-2012，START databas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http://www.start.umd.edu/gtd/>

表 4-3，RAND 資料庫所列與個案相關之恐怖組織分析表。

RAND 資料庫所列與個案相關之恐怖組織 (1975-2009)	恐怖攻擊次數	受傷人數	死亡人數
俄羅斯(含車臣) Russia(Chechnya included)	42	2154	764
Black Widows	1	165	46
Doku Umarov	1	0	0
Islamic Brigade of Ramzan Ahmadov	2	2	8
Jamaat Shariat	2	0	2
Kata'ib al-Khoul	2	1	2
Movsar Barayev Gang	2	657	162
Other	4	16	8
Rappani Khalilov	1	0	0
Rasul Makasharipov	1	0	0
Riyad us-Saliheyn Martyrs' Brigade	12	1166	514
Sword of Islam	2	0	0
Unknown	12	147	22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9	134	69
Other	2	82	12
Unknown	5	51	55
Uygur Holy War Organization	2	1	2
Philippines	174	1021	387
Abu Sayyaf	6	42	4
Abu Sayyaf Group (ASG)	65	518	207
MILF	54	83	47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31	322	108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	16	27	15
Unknown	2	29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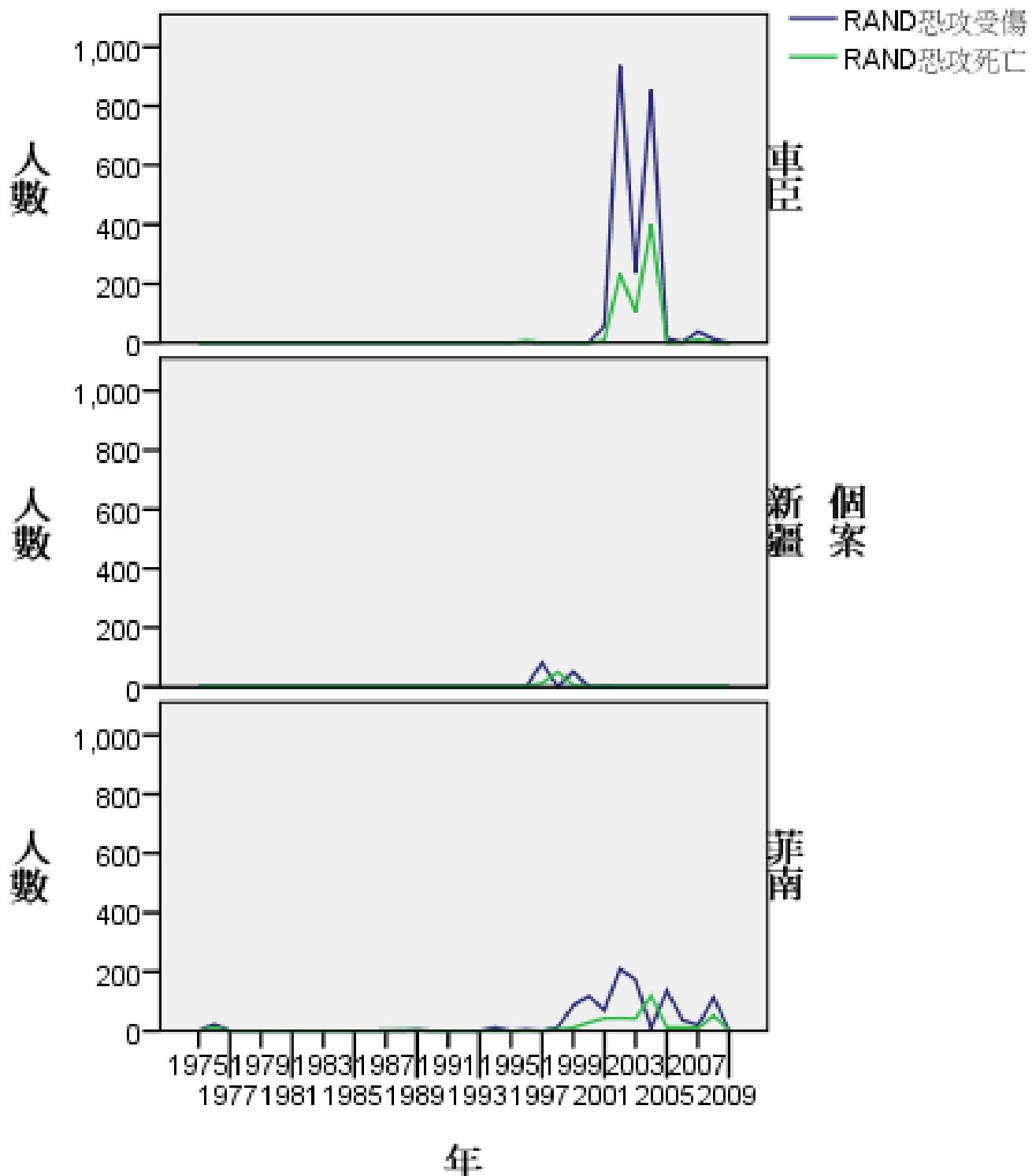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RAND-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http://www.rand.org/pubs/rgs_dissertations/RGSD301.html，筆者自行製表。

圖 4-7，RAND 資料庫 1975 至 2009 年個案受恐怖攻擊次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同表 4-3，筆者自行製圖。

圖 4-8, RAND 資料庫 1975 至 2009 年個案因恐怖攻擊受傷及死亡人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同表 4-3，筆者自行製圖。

筆者根據 START(GTD)資料庫⁵⁶篩選欄位「國家(country_tex)」為俄羅斯 (Russia)、中國(China)及菲律賓(Philippines)，再將欄位「恐怖組織名稱(gname)」篩選含有 Armed Forces of the Chechen Republic of Ichkeria, Caucasus Emirate, Chechen Lone Wolf Group, Chechen Rebels, Dagestani Shari'ah Jamaat, Grozny Jamaat, Kata'ib al-Khoul, Riyadus-Salikhin Reconnaissance and Sabotage Battalion of Chechen Martyrs, Special Purpose Islamic Regiment (SPIR), Sword of Islam, 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Muslim Separatists,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Uighur Separatists, Abu Sayyaf Group (ASG), 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Movement (BIFM), Bangsa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Splinter group, Muslim Separatists 等與個案相關之恐怖組織，所得分析資料如表 4-4；1975 至 2012 年與個案相關之恐怖攻擊次數變化如

圖 4-9；1975 至 2012 年與個案相關之恐怖攻擊受傷及死亡人數變化如圖 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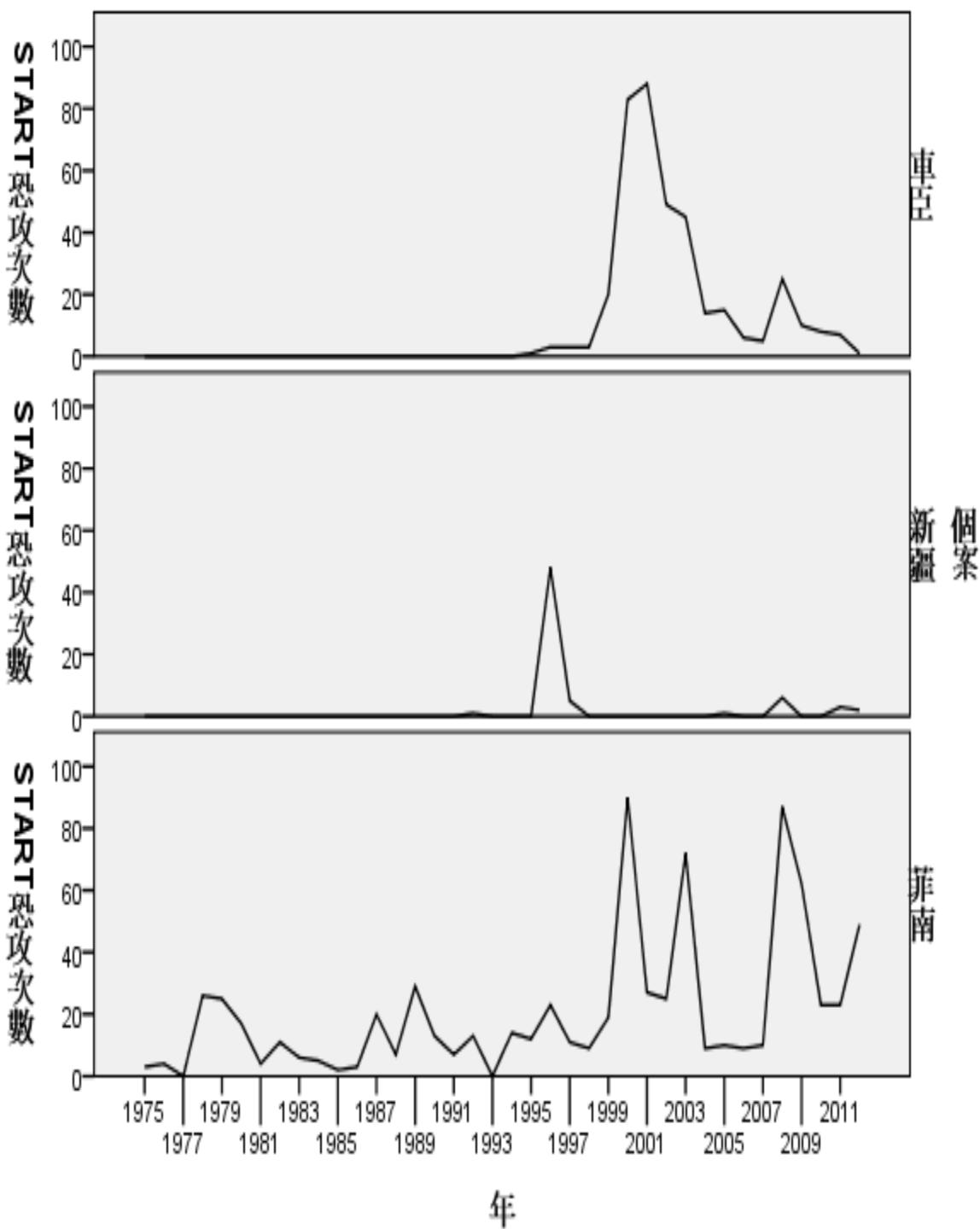
⁵⁶ START databas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http://www.start.umd.edu/gtd/>

表 4-4，START(GTD)資料庫所列與個案相關恐怖組織分析表。

START(GTD)資料庫所列與個案相關恐怖組織	恐怖攻擊次數	受傷人數	死亡人數
Russia	386	4441	2467
Armed Forces of the Chechen Republic of Ichkeria	12	153	99
Caucasus Emirate	31	441	140
Chechen Lone Wolf Group	2	0	23
Chechen Rebels	319	2759	1617
Dagestani Shari'ah Jamaat	5	30	13
Grozny Jamaat	1	5	17
Kata'ib al-Khoul	2	1	2
Riyadus-Salikhin Reconnaissance and Sabotage Battalion of Chechen Martyrs	10	1052	412
Special Purpose Islamic Regiment (SPIR)	3	0	143
Sword of Islam	1	0	1
China	66	331	120
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4	15	9
Muslim Separatists	2	22	6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2	14	3
Uighur Separatists	58	280	102
Philippines	779	3597	1925
Abu Sayyaf Group (ASG)	220	1170	546
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Movement (BIFM)	28	19	15
Bangsa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1	0	0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336	1477	721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	183	858	621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Splinter group	1	0	1
Muslim Separatists	10	73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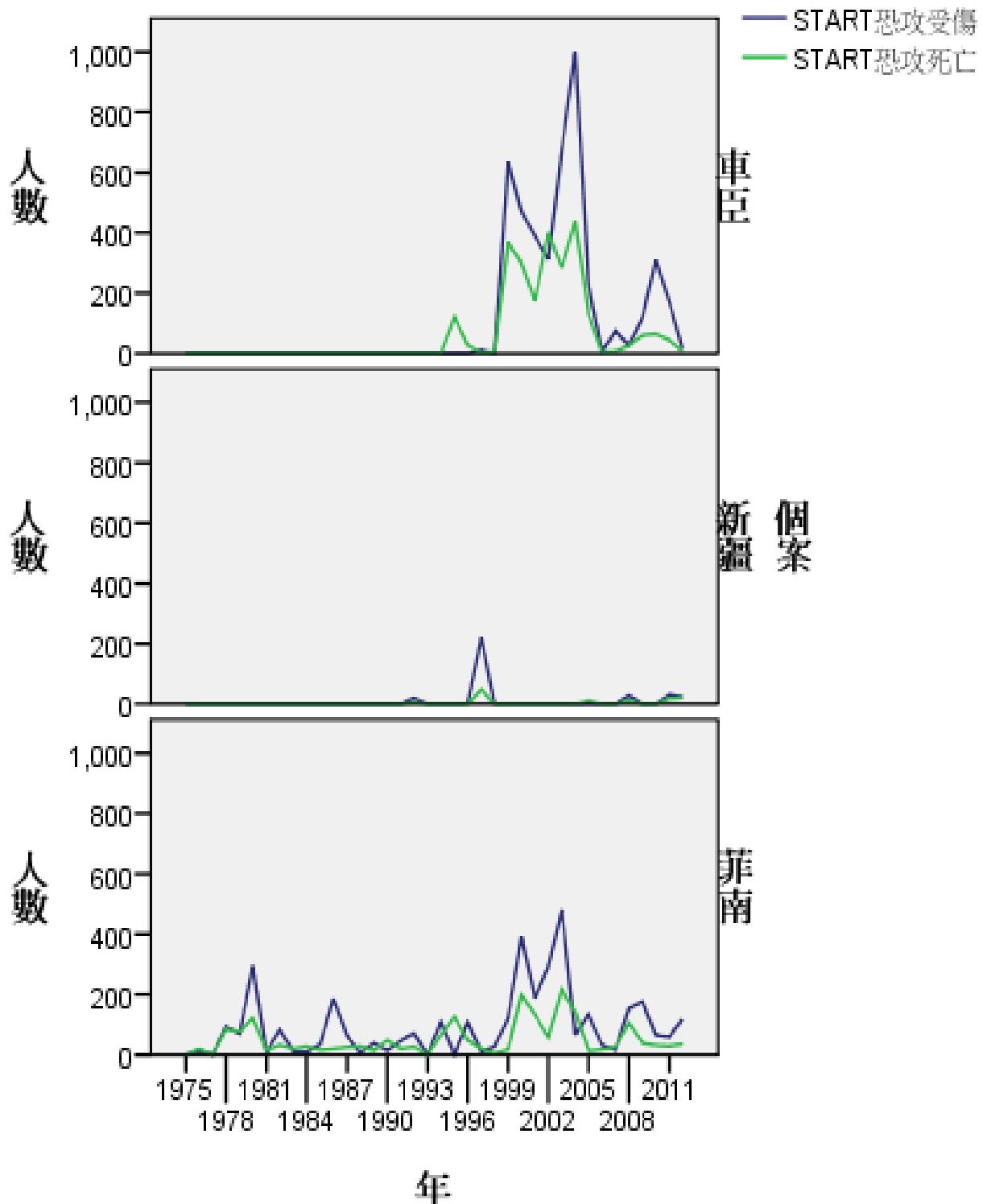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START databas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http://www.start.umd.edu/gtd/>，筆者自行製表。

圖 4-9，START(GTD)資料庫 1975 至 2012 年與個案相關之恐怖攻擊次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同表 4-4，筆者自行製圖。

圖 4-10, START(GTD)資料庫 1975 至 2012 年與個案相關恐怖攻擊受傷及死亡人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同表 4-4，筆者自行製圖。

根據 RAND 及 START(GTD)恐怖攻擊的資料庫，我們可以發現，與菲律賓摩洛分離運動相關的恐怖活動約開始於 1970 年代，其恐怖活動在 1970 年代中期達到高峰後逐漸減緩下降，復於 1998 年後才開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特別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間為菲律賓摩洛分離運動相關的恐怖活動的高峰，不論在發生次數、受傷人數及死亡人數均創下新高，而後發生頻率與傷亡人數大幅降低，直至 2008 年突增多起恐怖攻擊事件。

而與俄羅斯車臣及中國新疆分離運動相關之恐怖活動，在 1991 年以前均無資料記載。與俄羅斯車臣分離運動相關之恐怖活動約自 1999 年開始至 2004 年間達到最高峰；與新疆分離運動相關之恐怖活動則零星發生於 1992 年後，約在 1996 至 1999 年為最高峰，但其發生次數及傷亡人數仍遠低於其他兩個個案。

依據上開數據，結合前章所蒐集的個案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之歷史背景，可推測個案恐怖攻擊之發生仍與國內政治因素有關，如菲南的恐怖活動在 1970 年武裝叛變後開始，隨即於 1980 年代下降，而 2000 至 2004 年恐怖攻擊增加的可能原因為 2000 年後菲律賓政府與叛軍和談破裂，菲律賓總統艾斯特拉達 MILF 宣戰所導致；另俄羅斯車臣相關的恐怖活動於 1999 年後增加，則可能係 1999 年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後，車臣游擊隊為複製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使用恐怖攻擊成功經驗，以及車臣居民極力反抗俄羅斯政府統治所導致；而中國新疆之恐怖活動因其資料過於零散且有多起恐怖攻擊事件均由官方「宣稱」係新疆分離分子所為，但卻大多沒有任何恐怖組織正面承認，此亦違反藉由恐怖活動宣揚政治理念之恐怖主義活動之目的，因此尚無法從中國新疆恐怖活動數據中推測原因及結果。

第五節 小結

菲律賓與摩洛人的衝突始於 1970 年代，且隨著政府的和解政策，各項衝突在 1980 年代有逐漸降溫之趨勢，而其抗議示威遊行與武裝衝突在 2000 年及 2001 年的突然升溫則可能與總統艾斯特拉達宣布終止停戰協議，與 MILF 宣戰有關。菲律賓摩洛衝突就冷戰前後時間觀察並沒有發生冷戰後衝突加劇的情形。

觀察俄羅斯一車臣的衝突資料，會發現冷戰前衝突規模較小，而冷戰後，衝突案例及傷亡人數就有顯著的提升，但其主要原因仍與蘇聯崩解造成各加盟共和國獨立運動風潮有關，實際上與「文明衝突」的關聯性並不大，且車臣多數的衝突均發生在兩次車臣戰爭期間，此與俄羅斯政府對待車臣的態度有相當大的關聯，主要仍是政治因素影響衝突。

中國—新疆問題則在 1980 年代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期間，出現抗議示威浪潮，此種衝突形式亦早在冷戰結束前就已經發生，而且維吾爾與漢人衝突亦有其歷史因素；在 1980 年代政治改革開放氣氛出現後，抗議衝突規模升高(James Millward, 2004 : 8)，1989 年後中國政府國內實施戒嚴，政治管控趨嚴，對少數民族的政治歧視又成為升高衝突的導火線，因為在專制高壓的體制下，民眾並沒有其他管道可以抒發意見，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暴力(Ted Robert Gurr, 2000:70)。此一問題在中國尋求中亞各國協助，在 1996 年成立「上海五國」後，其國內恐怖主義衝突有降溫之趨勢⁵⁷。

綜合前三節抗議及示威遊行、武裝衝突與戰爭、恐怖攻擊事件相關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個案的衝突均與政府對少數民族團體的態度有關。政府若決定向少數民族團體採取嚴格管控壓迫的措施，則發生武裝衝突的可能性越高(兩次車

⁵⁷ PITF 資料庫原文為”Episodic violent protests by Uighers in Xinjiang province against Han Chinese control escalate into terror campaign by 1996.” 資料來源：PITF State Failure Problem Set, 1955-2012 Ethnic Wars 2012，<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臣戰爭、2000 年艾斯特拉達向 MILF 宣戰、中國 1989 年後實施戒嚴)；若政府對於少數民族團體採取越寬鬆的態度，則武裝衝突的可能性會減少，但抗議及遊行示威事件也可能因政府採取較為寬鬆的政治氣氛與態度而大幅增加(如 1980 年代蘇聯及中國的政治轉型)。然而，衝突的發生還有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下章將對個案內外部影響衝突的因素進行分析了解。



第五章 衝突內外因素比較分析

恐怖主義的成因與影響只能以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衝突來解釋，他們可能會有相同的地方，但每個案例都是獨特的。⁵⁸—瑪莎·克倫肖，1995：24。

如果我們將宗教當成(恐怖主義的)答案，我們可能同時誤解了宗教與恐怖主義⁵⁹—瑪莎·克倫肖，2008:136。

衝突或騷亂的發生可能跟很多因素有關，包括少數特定團體內部的理性抉擇過程，族群的集體經歷、規範或承諾、權力爭奪等(Ted Robert Gurr, 2002：66)，在國家內外可能有宗教、經濟發展、國家建置、衝突擴散或國際援助等都可能影響衝突的發生或持續(Jonathan Fox,2013：52)，主張任何單一因素，如文明或文化等是主要影響衝突的發生原因，或是做為未來預測衝突的架構，均可能過於簡單化其過程與其複雜的因素；如學者巴格與梅蒂娜認為經濟發展可能影響衝突的發生⁶⁰：「雖然經濟發展與恐怖主義間之關聯在學界仍有爭議，但研究發現，經濟發展的不公平與歧視是激發分離運動與少數民族區域或省分恐怖主義的重要因素；對已有領土控制下的恐怖分子而言，恐怖主義可被用來確保安全、自治與

⁵⁸ 克倫肖之原文為”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errorism are comprehensible only in terms of political conflicts in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 periods. There are commonalities among instances of terrorism, but each case is unique.”

⁵⁹ 克倫肖之原文為”If we settle on religion as the answer, we are likely to misunderstand both religion and terrorism.”

⁶⁰ 巴格與梅蒂娜之原文為”Though some conventional studies have found terrorism to be unrelated to economic conditions, studies that have spatially disaggregated economic activity to the level of separatist regions, provinces, and minority group territories do fi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to b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grievances based on 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discrimination that may lead to reactions in the form of terrorism. ... While territorially based terrorists may draw their grievances from poor local conditions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rural areas where they originated, the type of grievances that cause terrorism when actors do not control territory may be unique to the world's urban areas. ... economic and greed-related motives may play a slightly larger role in cases of territorial terrorism....In such settings, characterized by groups operating in conflict settings, terrorism appears sometimes to be used strategically to ensure security, autonomy, and compliance within the territories, resources, and activities they control in order to ensure financial resources, power, and the survival of their organization and purpose....in Afghanistan illicit drug production has been found to finance and motivate the resort to terrorist attacks on civilian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s an attempt to silence any political opposition. “

治理的戰略之一，以確保財務資源、權力以及組織生存及目標。」(Karim Bahgat and Richard M. Medina, 2013 : 51)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依時間順序整理了個案衝突發生的類型、次數、死傷人數等資料，並且可以歸納出各類型衝突發生特別集中或衝突升高的幾個時間點，並也簡單推測造成衝突升高的原因，本章將針對前章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文化及外部因素(文明、宗教與國際勢力的介入)探討與分析，期望了解衝突發生的有關因素或導致衝突發生的原因。

第一節 衝突量化數據與內部因素相關性之分析

導致國內分離意識與衝突的發生有許多可能的原因，如本文第二章文獻分析將少數民族產生分離意識的原因歸納為：

- 一、為了保有特有的文化、宗教、語言與生活習慣，維持文化尊嚴與競爭力。
- 二、為了政治及經濟上的自主以避免被多數族群的強權壓制或剝削。
- 三、對政府不公正政策的反抗。

因此，分離運動與衝突的發生可能源自於國家不公正的政治、經濟或文化歧視政策，壓抑或剝奪其政治經濟文化權力；為了解國家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歧視與個案衝突發生之相關性，我們在 MAR⁶¹資料庫裡篩選「年度(year)」範圍為 1970 年至 2006 年；欄位「國家(Country)」為「俄羅斯(Russia)」、「蘇聯(USSR)」、「中國(China)」及「菲律賓(Philippines)」，再篩選欄位「團體(group)」為「車臣(Chechens)」、「摩洛(Moros)」及「土庫曼(Turkmen)⁶²」，另抓取資料欄位為「poldis」

⁶¹ Minority At Risk Project 資料庫：<http://www.cidcm.umd.edu/mar/>；在此包含其 1945 至 2003 年及 2004 至 2006 年之兩筆資料庫。

⁶² 同註 42。

⁶³、「ecdis」⁶⁴，其分別代表國家對個案的政治歧視程度及經濟歧視程度。

為了解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自「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ARDA)⁶⁵」資料庫取得 RAS-Minorities dataset 資料庫，篩選國家(country)為俄羅斯(Russia)、中國(China)及菲律賓(Philippines)，選取少數宗教團體對象為「穆斯林」(Muslims)，取得其「Minority Specific Discrimination : Composite」(mzx1990-mzx2002)資料，其內容可表示 1990 年至 2002 年間，國家對穆斯林的歧視程度。

為了解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自「THE RELIGION AND STATE

⁶³ 政治歧視指數—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Index :

0 無歧視—No discrimination

1 歷史忽視/補救政策—Neglect/Remedial policies : Substantial under representation in political office and/or participation due to historical neglect or restrictions. Explicit public policies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or improve the group's political status.

2 歷史忽視/無補救政策—Neglect/No remedial policies : Substantial under representation due to historical neglect or restrictions. No social practice of deliberate exclusion. No formal exclusion. No evidence of protective or remedial public policies.

3 社會排斥/中性政策—Social exclusion/Neutral policy : Substantial under representation due to prevailing social practice by dominant groups. Formal public policies toward the group are neutral or, if positive, inadequate to offset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4 排斥/壓迫政策—Exclusion/Repressive policy : Public policies substantially restrict the group'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y comparison with other groups.

⁶⁴ 經濟歧視指數—Economic Discrimination Index :

0 無歧視—No discrimination

1 歷史忽視/補救政策—Historical neglect/Remedial policies : Significant poverty and under representation in desirable occupations due to historical marginality, neglect, or restrictions. Public policies are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group's material well being.

2 歷史忽視/無補救政策—Historical neglect/No remedial policies : Significant poverty and under representation due to historical marginality, neglect, or restrictions. No social practice of deliberate exclusion. Few or no public policies aim at improving the group's material well-being.

3 社會排斥/中性政策—Social exclusion/Neutral policies : Significant poverty and under representation due to prevailing social practice by dominant groups. Formal public policies toward the group are neutral or, if positive, inadequate to offset active and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4 限制性政策—Restrictive policies : Public policies (formal exclusion And/or recurring repression) substantially restrict the group'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by contrast with other groups.

⁶⁵ 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ARDA), THE RELIGION AND STATE PROJECT , <http://www.thearda.com/ras/downloads/>

PROJECT⁶⁶」取得「The Religion and State Project, Round 2」資料庫，篩選國家(country)為俄羅斯(Russia)、中國(China)及菲律賓(Philippines)，取得其「Composite measure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inority religions」(mx1990-mx2008)資料，其內容可表示 1990 至 2008 年間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的歧視程度。另外，少數民族分離意識高漲導致衝突的發生，亦可能與國家國力衰退，控制力下降有關，為了解國家整體安定狀況與個案衝突發生之相關性，從 INSCR 資料庫查得國家脆弱性指數「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 1995-2012」⁶⁷資料，選取國家為俄羅斯(Russia)、菲律賓(Philippines)及中國大陸(China)自 1995 年至 2012 年的國家脆弱性指數資料以供參考比較。

整理前章所列衝突資料，並配合以上資料所作個案衝突相關性因素分析如表 5-1，俄羅斯車臣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表 5-2，中國新疆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表 5-3，菲律賓南部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⁶⁶ 同前註。

⁶⁷ 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 1995-2012,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俄羅斯車臣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政治歧視程度	經濟歧視程度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國家脆弱性指數	抗議規模	反叛規模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武裝衝突死亡人數	RAND恐攻次數	START恐攻次數	
Spearman's rho 係數	政治歧視程度	1.000	.934**	-.062	.197	-.073	.740**	.824	.826**	.826**	.515*	.559*
	經濟歧視程度	.934**	1.000	.185	.354	-.073	.649**	.815**	.826**	.826**	.566*	.657**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062	.185	1.000	.850**	.451	.074	.224	.176	.342	.309	.783**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197	.354	.850**	1.000	.058	-.078	.184	.110	.219	.627**	.848**
	國家脆弱性指數	-.073	-.073	.451	.058	1.000	.000	.427	.257	.503*	-.078	.379
	抗議規模	.740**	.649**	.074	-.078	.000	1.000	.721**	.724**	.742**	.191	.426
	反叛規模	.824**	.815**	.224	.184	.427	.721**	1.000	.884**	.889**	.338	.649**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826**	.826**	.176	.110	.257	.724**	.884**	1.000	.984**	.516**	.746**
	武裝衝突死亡人數	.826**	.826**	.342	.219	.503*	.742**	.889**	.984**	1.000	.516**	.796**
	RAND恐攻次數	.515*	.566*	.309	.627**	-.078	.191	.338	.516**	.516**	1.000	.770**
	START恐攻次數	.559*	.657**	.783**	.848**	.379	.426	.649**	.746**	.796**	.770**	1.000

**. 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1 (雙尾)。

*. 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5 (雙尾)。

表 5-1，俄羅斯車臣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

根據表 5-1我們可以發現，俄羅斯車臣的「政治歧視程度」與「經濟歧視程度」間呈現「高度正相關」，兩者並分別與「抗議規模」、「反叛規模」、「參與武裝衝突人數」及「武裝衝突死亡人數」等衝突指數均表現出有「高度正相關」；「政治歧視程度」與「經濟歧視程度」並另分別與「RAND恐攻次數」及「START恐攻次數」表現出「中度正相關」。據此我們可以了解到，俄羅斯政府對於車臣的政治與經濟管制政策方向具一致性，而俄羅斯政府對車臣的「政治及經濟管制政策」與個案所發生之「衝突」間具有「高度正相關」。

俄羅斯的「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與「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間呈現「高度正相關」，並均與START恐攻次數呈現「高度正相關」。此表示俄羅斯政府針對境內「穆斯林」宗教團體之管制政策與俄羅斯政府對所有少數宗教團體實施的管制措施具有一致性，另宗教管制與歧視政策除與恐怖攻擊活動相關外，均與其他衝突形式無關聯，此顯示某種程度個案恐怖活動與俄羅斯宗教政策之關聯性。

中國新疆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政治歧視程度	經濟歧視程度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國家脆弱性指數	抗議規模	反叛規模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武裝衝突死亡人數	RAND恐攻次數	START恐攻次數
Spearman's rho 係數	政治歧視程度	1.000	-.487*	.835**	.861**	-.372	-.437	-.320	-.257	-.561*	.416	.192
	經濟歧視程度	-.487*	1.000	-.801**	-.492*	.104	.581*	.269	.580*	.587*	-.312	.329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835**	-.801**	1.000	.907**	-.723*	-.494	-.512	-.454	-.796**	.639*	-.272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861**	-.492*	.907**	1.000	-.793**	-.641**	-.796**	-.725**	-.855**	.012	.028
	國家脆弱性指數	-.372	.104	-.723*	-.793**	1.000	.525	.874	.639**	.649**	.252	-.086
	抗議規模	-.437	.581*	-.494	-.641**	.525	1.000	.569**	.737**	.593**	.149	.248
	反叛規模	-.320	.269	-.512	-.796**	.874**	.569**	1.000	.699**	.566**	.261	.279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257	.580*	-.454	-.725	.639**	.737**	.699	1.000	.963**	.207	.205
	武裝衝突死亡人數	-.561*	.587*	-.796**	-.855**	.649**	.593**	.566**	.963**	1.000	.073	.128
	RAND恐攻次數	.416	-.312	.639*	.012	.252	.149	.261	.207	.073	1.000	.109
	START恐攻次數	.192	.329	-.272	.028	-.086	.248	.279	.205	.128	.109	1.000

*. 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5 (雙尾)。

**. 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1 (雙尾)。

表 5-2，中國新疆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

根據表 5-2，中國「政治歧視程度」與「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及「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呈現高度正相關，顯示中國政府在政治與文化管制政策的一致性。另「政治歧視程度」與「經濟歧視程度」呈現「中度負相關」、「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與「經濟歧視程度」呈現「高度負相關」，此顯示中國政治與經濟政策缺乏一致性，即政治文化上有嚴格的措施，但在經濟上採取開放的政策。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與「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對「國家脆弱性指數」呈現「高度負相關」，顯示即使中國雖然國力越趨強盛(國家脆弱性指數越低)，但在文化管制政策上，並沒有隨著經濟改革而減少壓迫。

「國家脆弱性指數」與「反叛規模」呈現「高度正相關」，而「國家脆弱性指數」另分別與「參與武裝衝突人數」及「武裝衝突死亡人數」呈現「中度正相關」，顯示中國國力愈趨強盛(國家脆弱性指數越低)，新疆武裝衝突亦有逐漸減緩之傾向。

菲律賓南部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政治歧視程度	經濟歧視程度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國家脆弱性指數	抗議規模	反叛規模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武裝衝突死亡人數	RAND恐攻次數	START恐攻次數
Spearman's rho 係數	政治歧視程度	1.000	.507*	.	.169	-.601*	-.423	-.229	.487*	.094	-.163	.138
	經濟歧視程度	.507*	1.000	.	-.270	.471	-.236	-.830**	-.487*	-.278	-.769**	-.256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169	-.270	.	1.000	-.339	.404	.297	.325	-.118	.016	.031
	國家脆弱性指數	-.601*	.471	.	-.339	1.000	-.091	-.696*	-.747**	.464	-.506	-.272
	抗議規模	-.423	-.236	.	.404	-.091	1.000	.088	-.109	-.468*	.083	-.025
	反叛規模	-.229	-.830**	.	.297	-.696*	.088	1.000	.336	.069	.636**	.110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487*	-.487*	.	.325	-.747**	-.109	.336	1.000	.383*	.355*	.257
	武裝衝突死亡人數	.094	-.278	.	-.118	.464	-.468*	.069	.383*	1.000	.115	-.145
	RAND恐攻次數	-.163	-.769**	.	.016	-.506	.083	.636**	.355*	.115	1.000	.399*
	START恐攻次數	.138	-.256	.	.031	-.272	-.025	.110	.257	-.145	.399*	1.000

*. 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5 (雙尾)。

**. 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1 (雙尾)。

表 5-3，菲律賓南部衝突因素斯皮爾曼(Spearman's rho)相關係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

根據表 5-3，菲律賓政府對南部摩洛人的「政治歧視程度」與「經濟歧視程度」呈現「中度正相關」，顯示菲律賓政府政治與經濟管制政策的一致性(均漸漸趨向開放)。另菲律賓政府對於穆斯林的文化歧視政策在資料庫內指數均為「0」，即無針對穆斯林的文化歧視政策，因此無與衝突之相關性資料。

特別的是，菲南的「經濟歧視程度」與「反叛規模」呈現「高度負相關」、「經濟歧視程度」與「RAND恐怖攻擊次數」呈現「中度負相關」、「經濟歧視程度」與「參與武裝衝突人數」呈現「中度負相關」，此顯示菲律賓政府對菲南之經濟管制越開放、減低管制，該地區的衝突卻有升高之趨勢。此特殊現象可能與菲南分離運動團體爭奪該地區經濟利益有關。可能為菲律賓政府越放任該地區經濟自由，軍閥間的爭奪可能更加激烈，另也可解讀為，若菲律賓政府以經濟利益拉攏分離團體的MILF或MNLF任一方，均會導致另一方不滿而發動攻擊。

「國家脆弱性指數」與「反叛規模」呈現「中度負相關」、「國家脆弱性指數」與「參與武裝衝突人數」呈現「中度負相關」，表示菲律賓雖然綜合國力隨時間經過每年越趨穩定強盛(國家脆弱性指數降低)，但衝突並未因此降低。此現象肇因於菲律賓政府軍隊仍未強大到可有效控制並剿滅叛軍勢力，對地區衝突無法有效控制及掌握，因此衝突仍持續發生。

為更進一步了解衝突相關的因素，將本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歧視與個案衝突發生之相關性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5-4。

表 5-4，個案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歧視與個案衝突發生之相關性分析表。

個案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歧視與個案衝突發生之相關性分析表														
要素一	政治歧視程度			經濟歧視程度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國家脆弱性指數(越高越脆弱)		
要素一	經濟歧視程度	反叛規模	恐怖攻擊	國家對穆斯林歧視程度	反叛規模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恐怖攻擊	經濟歧視程度	國家對少數宗教團體歧視程度	國家脆弱性指數	恐怖攻擊	恐怖攻擊	反叛規模	參與武裝衝突人數
俄羅斯車臣	◎	◎	◎		◎		◎		◎		◎	◎		
中國新疆	X			◎	◎			X X		X X		X X		◎
菲南	○				X X	X	X						X	X
說明	◎=高度正相關，○=中度正相關，XX高度負相關，X=中度負相關， 空白表示無相關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知，車臣、新疆與菲南的衝突發生的原因，分別分散與許多不同的因素有著正負相關，如車臣及菲南的政治歧視程度均與經濟歧視程度成正相關，而新疆成負相關；車臣的反叛規模、恐怖攻擊次數均與經濟歧視程度成正相關，新疆成負相關；新疆反叛規模、參與武裝衝突人數均與國家脆弱性指數成正相關，菲南成負相關。

可見個案間雖然同屬伊斯蘭文明的分離主義，且均出現衝突、武裝衝突或恐怖主義，但將三個個案作系統性的相關性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個案衝突之發生與主要因素之關聯性，仍然因為內部不同政治因素而有很大的差異：如專制與民主；但即便像中國與俄羅斯兩個同屬專制政府，但在經濟改革上仍有相當差異。

可見要將個案衝突簡單歸因於分離主義帶來衝突及恐怖主義，或將伊斯蘭教一概劃分為同一文明，對抗另一文明的說法，均可能過於簡單化而忽略個案內部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

第二節 外部因素對衝突之影響

國際因素對國家或國家內部團體及個人的決策與想法都會產生影響，本節根據學者論述，整理出與個案有關之外部影響因素，盼提供檢視個案衝突之國際因素影響的思考：

一、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⁶⁸、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復興及建立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的夢想：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為伊斯蘭世界帶來兩大浪潮：一是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復興，二是實現建立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的夢想。以上兩大浪潮對個案分離意識與宗教分離意識均有間接及直接的影響或啟發。

何謂宗教的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學者福克斯認為，宗教的基本教義派均與「反現代」(against modernity)有關，其反對世俗主義(secular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現代化(modernity)。這並不是說基本教義派人士拒絕使用網路、電視等現代化科技，而是反對這些現代化科技對傳統宗教價值帶來的威脅與挑戰 (Jonathan Fox, 2013 : 110)。如進化論(evolution)對於基督教的「創世紀」(Genesis)帶來很大的衝擊；而西方電視節目的性解放與網路世界的情色與賭博均被宗教基本教義派人士視為道德的墮落及魔鬼的象徵。當掙扎在複製西方文化，看著自身文化消逝的人們感到憂慮，他們就可以從宗教的基本教義派中尋得安全感。基本

⁶⁸ 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 1979 年革命）是 1970 年代後期在伊朗發生的歷史事件，沙阿（伊朗君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伊朗君主政體在過程中被推翻，阿亞圖拉（革命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成立了伊斯蘭共和國，詳見維基百科。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E4%BC%8A%E6%96%AF%E8%98%AD%E9%9D%A9%E5%91%BD>

教義派可能會有兩種政治發展傾向，一種是完全斷絕與外界的聯繫以保持其獨立與純潔性；另一種則是希望透過政治力量來改變世界，將世界轉變為其理想的標準世界，其方法可能有和平的也可能有暴力的，如以色列的 Sha 黨以及蓋達組織，前者透過政治組織在體制內影響國家政策；後者則主張以暴力、恐怖主義來讓世界產生改變(Jonathan Fox, 2013 : 117)。

福克斯進一步論述宗教基本教義派人士可能會有如下特徵(Jonathan Fox, 2013 : 109-116)：

- (一) 構築邊界：可能離群索居或在穿著、語言及行為上可以明顯與非內部成員區隔。
- (二) 非黑即白的世界觀：簡單的世界觀，沒有灰色地帶的空間。
- (三) 被神所選擇的成員：相信自己是被神選擇的子民。
- (四) 強調聖典的無可挑戰性。
- (五) 宗教理論的創新：為回應現代化的挑戰，對宗教理論的創新。
- (六) 選擇性強調某些經文：為保護傳統宗教價值以及回應現代化的威脅，特別強調經文內的特殊觀點。
- (七) 緬懷過去宗教黃金年代的盛世。
- (八) 領導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政治、經濟及個人議題均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 (九) 公眾與私人空間的界線模糊：沒有私人的空間，信眾需全面性的接受宗教指導，包括性或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行為。

伊朗伊斯蘭革命提供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無限想像空間，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不再是夢想，因此鼓舞了許多其他國家的穆斯林，投身恢復伊斯蘭的光榮，希望建立一個政教合一，橫跨歐亞的伊斯蘭帝國。這些想法對國家內部佔

少數人口的穆斯林尤具吸引力，因為他們本來就已經有分離意識，在宗教的推波助瀾下，會將理想付諸行動據以實現。杭廷頓在《誰是美國人》書中提及，即使在美國內部的穆斯林，仍希望建立一個百分之百純淨的伊斯蘭帝國：「在某些情況下，穆斯林想要維持自己信仰的純淨與宗教實踐可能會導致他們與非穆斯林之間的衝突。在美國密西根州，某些穆斯林宣稱公立學校是『將年輕人帶離伊斯蘭的地方』。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百分之百的純伊斯蘭，重建一個沒有暴力的哈里發統治，一個伊斯蘭強權！』」(高德源譯，2008：195)

二、1980-1989 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⁶⁹、「聖戰」思想、「聖戰士」、「資金」、「人員訓練」及「武器物資」的擴散與傳播：

1980 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結束後，學者史騰認為戰後的影響為⁷⁰：「在阿富汗戰勝蘇聯後，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被留下面對戰後的難民、犯罪集團及尋找新工作的聖戰士們。」(Jessica Stern, 2003：290)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激起中東伊斯蘭團體起而對抗任何與伊斯蘭為敵的陰謀，發動對伊斯蘭教的全球性支持，在此全球性為伊斯蘭而奮鬥的框架下，激進的「聖戰(Jihad)」思想被視為一種宗教的責任(Julie Wilhelmsen, 2005：41)；研究恐怖主義學者瑪莎·克倫肖認為⁷¹：「許多 1990 年代恐怖主義的發生原因，均可追溯至波斯灣戰爭(Persian Gulf war)與 1979 年 12 月蘇聯入侵阿富汗有關。...美國在 1980 年代支援阿富汗對抗

⁶⁹ 1979 年阿富汗戰爭原稱「阿富汗戰爭」，是指 1979 年 12 月末，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的長達 10 年的戰爭。這次入侵被認為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大失敗。1973 年阿富汗共和國成立後，蘇聯即支持激進的政黨如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加緊使阿富汗在經濟上依賴蘇聯，反對同中國有密切關係的巴基斯坦，詳見維基百科。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1979 年阿富汗戰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F%8C%E6%B1%97%E6%88%98%E4%BA%89_\(1979%E5%B9%B4\)](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F%8C%E6%B1%97%E6%88%98%E4%BA%89_(1979%E5%B9%B4))

⁷⁰ 史騰之原文為”After the Afghan victory over the Soviets,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were left to deal with the war’s aftermath: refugees, criminal enterprises, and jihadis searching for new jobs.”

⁷¹ 克倫肖之原文為”Many sources of the terrorism of the 1990s can be traced to specific ev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ian Gulf war and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December 1979....American support for the Afghan resistance to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 followed by neglect as the country collapsed into chaos, mobilized the resistance (called mujahideen) and may have permitted the Taliban to seize power in 1996.”

蘇聯，接著在阿富汗陷入混亂國家崩潰之際視若無睹，直到 1996 年塔利班神學士(Taliban)動員（又稱聖戰士）反抗取得政權。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伊斯蘭戰士得到在阿富汗與蘇聯作戰的經驗後返回故里，進而讓激進的組織擴散。」(Martha Crenshaw, 2003 : 166)

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所傳播的「聖戰」概念、國際恐怖組織及中東伊斯蘭國家所提供的「聖戰士」、「資金」、「人員訓練」及「武器物資」的支持也成為國際恐怖主義興起的一股助力。印度學者阿里夫賈邁勒談到穆斯林對聖戰之態度時，認為：「沒有穆斯林會反對聖戰思想，反對意味著他們成了異教徒，即使溫和派穆斯林也不會反對聖戰…他們可能不贊成襲擊世貿中心…他們大多期望看到在全球範圍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自阿富汗聖戰開始以來，聖戰就不斷得到傳播。在這以前，即使伊斯蘭捲入，民族主義的鬥爭僅僅是民族主義鬥爭。(阿里夫・賈邁勒，2001:111-115)」

雖然分離主義分子藉由擁抱伊斯蘭極端主義可藉此獲得資金、士兵與國際的協助建立伊斯蘭教為主的宗教國家，而獲得上開資源的代價就是要轉而從事宣揚伊斯蘭極端主義、從事恐怖分子口中所稱「聖戰」的恐怖攻擊行動。然而恐怖行動與擁抱激進瓦哈比主義卻可能適得其反，宗教法庭、禁止音樂與傳統民俗慶典、遵守特殊的穿著方式、保守的教義、恐怖分子製造恐懼及可能從事犯罪活動等因素，可能讓原本有民意支持的分離主義分子失去廣大民意的支持。

究竟何謂「聖戰」？有關聖戰概念一直是伊斯蘭文明與其他主要文明屢次發生衝突的主因，因此有必要針對聖戰思想進行了解。「聖戰」一詞意謂「努力」、「奮鬥」，既可指暴力鬥爭，也可指靜靜地奮鬥，如對抗內心的七情六慾(梁永安譯，2013)。賈邁勒指出：「聖戰的字面意思是『神聖的鬥爭』…但一般來說，當人們說起聖戰時，意指阿拉式的聖戰。穆罕默德一生十分重視聖戰，他一生中參加過 20 多次聖戰，在他的生命中，聖戰的真正目的是打倒異教徒，並在麥加、麥地那及阿拉伯島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時至今日，聖戰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打倒

異教徒並在全世界建立伊斯蘭國家；伊斯蘭的聖經寫道：『穆斯林游擊隊員在即將犧牲時，可蘭天堂的仙女會降臨人間帶走他們的靈魂。他們在天堂可以得到 72 個美貌勝於人間所有美麗加起來的仙女』我曾研究過在喀什米爾戰鬥的巴基斯坦穆斯林游擊隊員的 600 個願望；所有的隊員都提到這些仙女是他們發動聖戰的一個重要誘因。住著仙女的天堂是他們的首要目標。」(阿里夫・賈邁勒，2001:109-110)。

學者福克斯認為，基督教、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均有聖戰的概念，常見於合法化宗教的自我防衛上，但也常常發生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征服其他宗教成員的合理化藉口。穆斯林的聖戰就被激進的成員用來解釋為對非穆斯林的戰爭(Joanthan Fox, 2013 : 128)。然而伊斯蘭教的律法及其戰爭律法禁止自殺與攻擊非戰士的平民，近代自殺型恐怖主義可說源自 20 世紀巴勒斯坦學者 Abdullah Azzam 對聖戰的定義⁷²：「Azzam 說服了阿富汗的聖戰士們，為神而戰死將可獲得上天堂的賞賜。」Azzam 強調「犧牲」而非「自殺」的說法使得自殺炸彈客變成了為神而戰的戰士，另外，權力與武器的不對等更助長了極端主義的發展，也正當化其戰略目標 (Joanthan Fox, 2013 : 130，轉引自 Moghadam, 2008-2009:60-61)。

然而並非所有穆斯林都覺得「聖戰」就是成為自殺炸彈客與發動恐怖攻擊，有些人認為，伊斯蘭教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宗教，只是不幸地受到賓拉登和其他極端分子的「脅持」。根據這種觀點，當代聖戰士誤解了《古蘭經》⁷³，也因此

⁷² 福克斯之原文為” More than any other individual, Azzam persuaded Jihadis in Adfhanistan and beyond that those who die for the sake of God (fi sabil Allah) will be rewarded in paradise.(Moghadam, 2008-2009:61). While Azzam focused on sacrifice and not suicide bombing specifically, this ideology evolved into the concept that ”suicide attacker does not kill himself for personal reasons, but sacrifices himself for God. He is therefore not committing suicide, but achieving martyrdom.”(Moghadam, 2008-2009:60) Furthermore, the great power of the enemy, whose numbers and weapons so greatly threaten Islam, justifies extreme and normally unjustifiable tactics.(Moghadam, 2008-2009:61)”

⁷³ 最常被引用的經文是第九章第五節，穆斯林一向稱之為「刀劍經文」。賓拉登在 1996 年發出的著名宣言裡引用過..常被人以口語體翻譯如下：「你們在哪裡發現外道便在哪裡殺死他們。」但這是誤譯。經文中用的其實不是外道，而是「那些把上帝與他神共奉的人」，指多神教徒，所以...刀劍經文都不足以作為上帝鼓勵穆斯林攻擊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最有力證據。...然而，從下一節經文看來，多神教徒並不是非要改教才能免死：「那些把上帝與他神共奉的人當中，如果有人求你

誤解了伊斯蘭教。雖然有些穆斯林強調穆罕默德好戰的一面，以此佐證聖戰的合理性；另一些穆斯林則堅稱伊斯蘭教是和平的宗教，力主愛好和平是先知所留下的最美好傳統(梁永安譯，2013：403-404)。

對伊斯蘭世界而言，「現代聖戰」的概念是 1980 年代為了對抗蘇聯在阿富汗推行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戰爭。這場戰爭讓許多年輕人前往阿富汗地區與蘇聯軍隊及其同盟軍對抗以捍衛伊斯蘭教。這些努力使得宗教聖戰變成了一種義務，並結合了源源不絕的金流與武器⁷⁴(Johathan Fox, 2013:128, 轉引自 Toft, 2007:11)。戰後許多聖戰士返回祖國或其他地區持續為伊斯蘭教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進行聖戰，也因此發展出基地組織、伊斯蘭祈禱團、車臣的伊斯蘭國際維和旅、新疆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菲南的阿布薩耶夫及等主張以暴力改變現狀的恐怖組織：

(一) 車臣：

1. 1994 至 1995 年車臣獨立戰爭期間，首次有外國聖戰士至車臣作戰 (Julie Wilhelmsen, 2005 : 36 ; Gideon Scher, 2009)，車臣外國聖戰士組織領導人領導人 Umar Ibn al-Khattab 曾說：「就像阿富汗，這不僅是車臣的事，而是伊斯蘭的事⁷⁵」；但車臣獨立運動領導人除馬斯哈多夫表示歡迎外，部分領導人認為：「我們不需要他們，他

們保護，就應當保護他，直到他聽到上帝的言語，然後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資料來源：梁永安譯，Roert Wright，2013，《神的演化》：406-408，新北：大家。

⁷⁴ 福克斯之原文為” Toft (2007:11) argues that...In the Islamic world, the external aspect of jihad was revived during the Soviet Union's ill-fated attempt in the 1980s to preserve an unpopular Marxist regime in Afghanistan. It give license to young men to travel great distances to Afghanistan to defend Islam by killing Soviet troops and the Soviet Union's local allies. This effort was thus characterized by a sense of religious obligation; and combined with a never-ending stream of cash and weapons.”

⁷⁵ Lorenzo Vidino 之原文為” Umar Ibn al-Khattab, a Saudi native who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foreign mujahideen in Chechnya, said, "This case is not just a Chechen matter but an Islamic matter, like Afghanistan."”

們會給我們帶來麻煩，而我們無法阻止他們。⁷⁶」(Lorenzo Vidino, 2005 : 57-58)。

2. 1997 年，賓拉登的副手札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因偽造證件在車臣鄰近的達吉斯坦被俄羅斯警察逮捕，但他們尚未意識到國際伊斯蘭極端分子跟車臣的關係，因此在札瓦希里服完六個月的徒刑後將他釋放(Lorenzo Vidino, 2005 : 58)。
3. 有些車臣指揮官因多年戰事變得更加激進，而有些接受「聖戰」的理念，僅僅為了接受富有的波斯灣支持者源源不絕流入的財富與資金與武器(Lorenzo Vidino, 2005 : 59, 63)。
4. 據俄羅斯軍隊發言人 Ilya Shabalkin 上校於 2003 年的估計，在車臣大約擁有的 1,000 戰士中，約有五分之一為外來的阿拉伯聖戰士，而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對車臣聖戰士的流動是雙向的，藉由吸收車臣人前往國外接受訓練，讓訓練有素的車臣聖戰士並返回車臣作戰(Lorenzo Vidino, 2005 : 61-62)。

(二) 新疆：

1. 許多維吾爾人被阿富汗的勝利及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小國的獨立所啟發，激發他們追求獨立以創建自己「家園」的願景(Bhavna Singh, 2010 : 5)。
2. 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 2002 年的報導，艾山・買合蘇木(Hasan Mahsum)於 1997 年離開新疆並加入了與塔利班及蓋達組織有關的

⁷⁶ Lorenzo Vidino 之原文為” Maskhadov, for example, hailed the contribution of "mujahideen from many Islamic states [who] fought by our side. They took up arms and defended our people ... These mujahideen were a great help and support to us. " Other Chechen leaders felt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Afghan Arabs would become a problem: "We do not need them, they will give us a lot of trouble—but we won't be able to stop them," one said"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TIM)組織，並開始在阿富汗地區招募能前往新疆作戰的維吾爾聖戰士(Michael Clarke, 2007 : 19)。

3. 2001 年有 22 名維吾爾人在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被美國政府逮捕並送往專門關押恐怖分子的關達那摩灣監獄(Guantanomo)，其中 5 人被證明是無辜的，10 人為受訓成員，然而直至 2007 年，仍有 7 名被押的維吾爾人士據信為蓋達組織成員因此未被釋放(Michael Clarke, 2007 : 20; Martin I. Wayne, 2008 : 52-54)，由此可知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及全球聖戰的概念確實在新疆地區發揮影響力。

(三) 菲南：

1. MILF、ASG 與蓋達組織：約於 1980 年代, MILF 領導人哈希姆・薩拉馬(Hashim Salamat)參加了阿拉伯與非阿拉伯穆斯林組成的志願軍前往阿富汗對抗蘇聯，他在那裏遇到了賓拉登，同時 MILF 持續與菲律賓政府軍隊進行游擊戰。到了 90 年代，MILF 與 ASG 均借用蓋達組織在阿富汗的訓練基地訓練前線的志願軍。據估計 MILF 有大約 8,000 至 15,000 名戰士，其中不乏曾前往阿富汗參戰者(Asaf Maliach, 2006)。ASG 領導人詹加蘭尼 (Abdurajak Abubukar Janjalani) 曾參加阿富汗戰爭，戰後回到菲律賓進行建立穆斯林國度的聖戰，蓋達組織及其他中東地區的穆斯林組織提供菲律賓的穆斯林軍隊、金錢與恐怖分子訓練(Gus Martin, 2013 : 182)。
2. MILF、ASG 與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MILF 與 JI 的關係同樣建立於 1980 年中期，JI 不但與 MILF 有密切關連，也與 ASG 成員同樣因為在阿富汗的訓練基地的關係有深切淵源，目前已知 JI 在菲南也設有訓練基地。JI 除協助訓練聖戰士外，並與 MILF 及

ASG 共同策劃執行恐怖攻擊行動。即使 MILF 領導人薩拉馬在 2003 年公開宣稱拒絕恐怖主義，但仍有證據顯示，協助恐怖分子的訓練仍在進行(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4 : 13, 23-26)。

三、其他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介入個案衝突

(一) 車臣：

1. 德國：車臣人藉幫助德軍作戰要求在二次戰後獨立。
2. 中東國家及伊斯蘭會議組織(OIC)：中東國家及 OIC 均對車臣感到同情並支援其爭取獨立，OIC 更支持車臣聖戰運動與對抗「外來入侵」的穆斯林分離戰爭⁷⁷(Bat Ye'or, 2011 : 156)。
3. 國際恐怖組織：早在「911」事件之前，車臣就已經成為國際恐怖勢力的藏身之所和訓練營地。長期以來，「基地」組織特使一直在俄羅斯的恐怖事件中扮演著組織策劃、行動協調和資金支援的多重角色。兩次車臣戰爭期間，有數千名境外伊斯蘭極端分子奔赴車臣參加「聖戰」，僅 1999 年境外極端勢力就支援車臣 5000 萬美元，賓拉登也為車臣提供過 2500 萬美元的資助(孫渤，2011 : 16)。

(二) 新疆：

1. 蘇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新疆地區的維吾爾人成為了蘇俄制衡中國的一張牌⁷⁸，蘇俄二度利用維吾爾族人「反中」的情緒來牽制中國。二戰後期，蘇聯政府逐漸改變以往不支持中共的政策，借中共籌碼強化其對華外交的影響力。也正因為有此發展，制衡國

⁷⁷ Bat Ye'or 原文為“The OIC supports all jihadist movements and Muslim separatist wars considered to be resisting “foreign occupation,” like those in occupied Indian Kashmir (Jammu and Kashmir), occupied Chechnya....”

⁷⁸ 另有關蘇聯利用東突問題周旋在中共、國民黨政府以謀取其自身利益與外蒙獨立的敘述，詳見“Erkin Ekrem (2008)〈中蘇關係中的「東突」問題(1944-45)〉，《兩岸發展史研究》第 6 期：109-213”。

民政府之「東突牌」逐漸被「中共牌」所取代，其原因較之「東突牌」，運用「中共牌」可以達到更廣泛之利益目標，可以替代「東突牌」所擁有的功能。雖然這兩張牌各有其功用，但戰略利用「中共牌」也可以達到「東突牌」所帶來的利益。其結果，真正失去利益最大者當是新疆民衆，是大國間利益競爭的最大犧牲者(Erkin Ekrem , 2008 : 203)。另於 1960 年代中蘇交惡期間，蘇聯再度利用維吾爾族人反中情緒，鼓動維吾爾族人追求自身的獨立，(Ablet Kamalov, 2009 : 124-125)。

2. 英國：為統合其南亞殖民地如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並延伸其勢力至中亞，與蘇聯、中國競相爭奪影響力於新疆地區，於 1933 年 11 月 12 日，在英國支持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於喀什噶爾成立。
3. 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因其經濟影響力及上海合作組織的創建，中國在帕米爾地區擁有超過「盛唐」時期的影響力。上合組織使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超越美國，解決領土爭端及降低維吾爾族跨境聚居地的潛在破壞力，中國現正利用中亞各國的安全機構監視維吾爾社區並引渡嫌疑犯(James Millward , 2009 : 71)。自蘇聯解體後，中國和中亞鄰國已經建立了密切關係，最初僅限於經濟聯繫，但後來逐漸拓展到政治和國家安全方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2)。
4. 國際恐怖組織：2001 年 11 月 14 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稱，「我們有確鑿證據證明，在新疆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罪犯，的確有人在阿富汗接受過恐怖訓練，這些人和賓拉登恐怖集團是有聯繫的，他們受到「聖戰」思想的薰染，而且接受了訓練」(吳榮裕，2009 : 73，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01 年 11 月 22 日中共

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強調在阿富汗被抓的「中國維吾爾族人」實際上是「東突」恐怖分子，章啟月表示「東突」恐怖勢力與國際恐怖勢力有著密切聯繫，至少有數百名「東突」恐怖分子曾在阿富汗接受恐怖暴力訓練。(吳榮裕，2009：74，轉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三) 菲南：

1. 馬來西亞、伊朗與利比亞：馬來西亞曾於 1970 年代協助菲南訓練軍事人員返菲組成游擊隊對抗菲律賓政府；在 1990 年後透過伊斯蘭國家會議介入調停，在菲律賓與菲南叛軍的和平進程中扮演一定角色(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2)；由密蘇阿里(Nur Misuari)所領導，伊朗(Iran)及利比亞(Libya)政府所支持的 MNLF，有時也會由馬來西亞東部同情菲南的穆斯林提供庇護所(Richard Clutterbuck, 1990：131)。
2. 伊斯蘭會議組織(OIC)：菲南摩洛衝突的國際化是公認的，這些摩洛叛軍不斷接受到來自不同國家或組織，如伊斯蘭國家會議(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 OIC)等的訓練與物資；在這些伊斯蘭國際援助提供了合法化的武力抵抗的同時，也某種程度引導了摩洛地區的伊斯蘭勢力避免分裂走向獨立。政府及叛軍因此能在其談判進程中，接受伊斯蘭組織(OIC)作為有效的調停者。(Miriam Coronel Ferrer, 2005：137)
3. 國際恐怖組織：恐怖組織如蓋達組織及伊斯蘭祈禱團的資金及訓練人力流入菲南，ASG 因領導人詹嘉蘭尼與蓋達組織首腦賓拉登共同於阿富汗作戰而有密切相關；而 MILF 則與伊斯蘭祈禱團有著共同支援全球聖戰的承諾(Stephen Vertigans, 2009：74)。

第三節 共同歸因：格爾之種族政治衝突模型

學者格爾(Ted Robert Gurr)是風險少數(MAR)資料庫的創建者之一，他依據該資料庫分析個案種族衝突的因素，整理出「種族政治衝突歸因模型」如圖 5-1 (Ted Robert Gurr, 2000 : 70)，根據該圖，其將種族政治衝突發生的原因歸納有：

一、種族文化上的身分認同的特點係下列因素作用：

- (一) 與其他團體文化上的不同程度。
- (二) 相較更為有利或不利。
- (三) 過去及現在與國家或對手團體衝突發生之強度。

二、種族文化行動的動機係下列因素作用：

- (一) 相較於其他團體可克服共同的不利因素。
- (二) 重新取回失去的自治權。
- (三) 抵抗國家的控制與壓迫。

三、團體集體行動的能力係下列因素作用：

- (一) 種族文化認同的特點。
- (二) 共同的動機。
- (三) 區域的集中性。
- (四) 事先存在的團體凝聚力。
- (五) 聯合不同部門及領導者。
- (六) 可信賴的領導階層。

四、誘發種族政治行動的國內機會：

- (一) 舊國家解體或成立新國家。

(二) 政權轉移，特別是由極權專制轉移到民主。

(三) 領導轉換或是形成新的領導聯盟。

五、鼓勵採取「反叛(rebellion)」手段的政治因素：

(一) 獨裁的政體或制度。

(二) 脆弱的國家及有限的資源。

(三) 歷史上菁英依賴以壓制控制挑戰。

六、鼓勵採取「抗議(protest)」手段的政治因素

(一) 民主的政體或制度。

(二) 強大的國家及豐富的資源。

(三) 傳統上菁英願意調和部分利益(階級、宗教及種族)。

七、國際支持種族政治行動的資源：

(一) 全球民族主義、原住民及少數民族權益之政策。

(二) 親近種族及相同宗教信仰者的區域及全球網絡。

(三) 相似團體間在種族政治衝突的擴散與傳播。

(四) 外部政治與物質支持。

另依據上開模型，歸納個案衝突之因素如表 5-5。綜上，依據格爾的模型分析車臣、新疆與菲南衝突發生之種族文化因素後，我們發現，個案在種族衝突的身分認同、行為動機、行動能力與國際支持(均與種族或文化有關)的部分均有高度相似性，另在採取「抗議」或「反叛」政治手段的選擇上，則因為專制及民主政體的不同出現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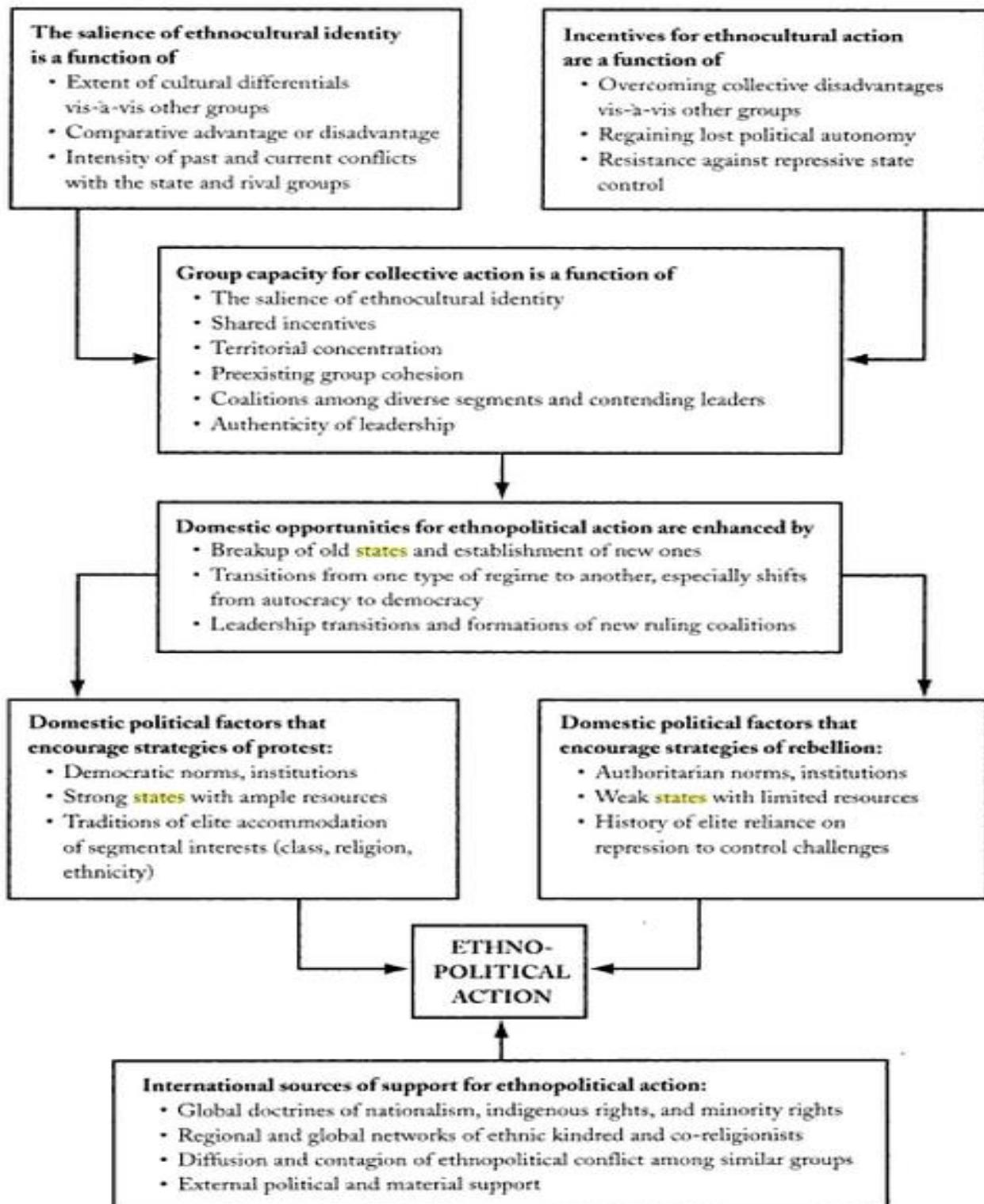


圖 5-1，分析種族政治衝突歸因圖。

資料來源：Ted Robert Gurr, 2000: 70。

表 5-5，依據 Gurr 的衝突假設分析個案衝突發生之因素表。

政治衝突發生的原因	國家	車臣	新疆	菲南
種族文化身分認同	與其他團體文化上的不同程度	○	○	○
	相較更為有利或不利	團結更為有利	團結更為有利	團結更為有利
	過去及現在與國家或對手團體衝突發生之強度	強	過去較強	強
種族文化行動的動機	相較於其他團體可克服共同的不利因素	○	○	○
	重新取回失去的自治權	○	○	○
	抵抗國家的控制與壓迫	○	○	○
團體集體行動的能力	種族文化認同的特點	○	○	○
	共同的動機	○	○	○
	區域的集中性	○	○	○
	事先存在的團體凝聚力	○	○	○
	聯合不同部門及領導者	?	?	X
誘發種族政治行動的國內機會	舊國家解體或成立新國家	○	○(1933 至 1949)	X
	政權轉移，特別是由極權專制轉移到民主	○	X	X
	領導轉換或是形成新的領導聯盟	○	○(1933 至 1949)	○
鼓勵採取「反叛(rebellion)」手段的政治因素	獨裁的政體或制度	○	○	非獨裁
	脆弱的國家及有限的資源	X	X	○
	歷史上菁英依賴以壓制控制挑戰	○	○	○
鼓勵採取「抗議(protest)」手段的政治因素	民主的政體或制度	非民主	非民主	○
	強大的國家及豐富的資源	○	○	X
	傳統上菁英願意調和部分利益(階級、宗教及種族)	X	X	○
國際支持種族政治行動的資源	全球民族主義、原住民及少數民族權益之政策	○	○	○
	親近種族及相同宗教信仰者的區域及全球網絡	○	○	○
	相似團體間在種族政治衝突的擴散與傳播	○	○	○
	外部政治與物質支持	○	○	○

資料來源：如圖 5-1。筆者自行繪製。

第四節 小結

從文明衝突的角度觀之，個案間具有許多同質性—均信仰伊斯蘭教且均發生恐怖主義—但從本章第一節的衝突因素相關性分析中，我們可能很難發現個案與發生衝突相關因素的一致性，相反地，個案所發生的衝突間，除均有其自身的歷史背景因素外，其衝突的發生可能係由其內部各自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因素造成。在第二節的外部因素影響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個案均受到了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造成基本教義派的復興及興起建立伊斯蘭國家的夢想，以及1980年代蘇聯阿富汗戰爭結束輸出聖戰士與聖戰觀念的影響，並且有其他國家及非國家行為者試圖介入或調停個案之衝突。本章第三節在格爾的種族衝突歸因模型下觀察個案發生衝突，發現個案衝突在「種族文化因素」上有許多共通點，並將格爾的模型結合第二章第二節歸納之分離主義發生根源以及第三章個案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發生之歷史背景，整合車臣、新疆及菲南產生衝突共同根源如表 5-6。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個案衝突的發生，雖然被各自的歷史因素、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因素所影響而無共同點，也欠缺明顯一致性，但在外部因素影響以及學者格爾的模型中可知，個案仍然共同受到外部的「其他國家及非國家行為者」、內部的「文化身分認同」、「維護種族集體權益」、「團體集體行動的能力」的影響。

表 5-6，車臣、新疆及菲南產生衝突共同根源彙整表。

Gurr 的種族政治衝突歸因	種族文化行動的動機				種族文化身分認同
第三章第二節歸納分離主義發生根源	對政府不公正政策的反抗				為了政治及經濟上的自主以避免被多數族群的強權壓制或剝削。
造成不滿之原因	高壓專制	世居土地曾遭重分配或掠奪	對移入或同化的人口政策不滿	經濟落後於主要地區	宗教信仰不同導致生活習慣不同
車臣共和國	○	○	○	○	○
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區	X	○	○	○	○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	○	○	○	○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第六章 結 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未發現「文明衝突」對個案衝突具一致性的解釋力：

(一) 衝突的發生與個案歷史背景、種族文化、內部及外部政治因素有關，車臣、新疆與菲南的衝突均在 1991 年冷戰結束前就已經發生，菲南在衝突在冷戰後並未明顯升高；而車臣及新疆則是因為各自內外不同的政治因素導致冷戰後衝突加劇。如果將個案衝突的發生放在國際的大視角看，可能都會因為是伊斯蘭教團體的分離運動，而被歸納為伊斯蘭教造成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但是如果把車臣、新疆及菲南分開個別檢視，我們會發現，個案產生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的背後，都有一段歷史背景，也有其內外因素，不能單純以文明衝突解釋。

(二) 宗教教義會隨著政治而有不同的詮釋，而宗教在衝突中扮演的角色其實與宗教的本質或其發展過程有關，如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教義與時俱進的演變。學者羅伯·賴特針對宗教歷史上教義不斷的轉變提出以下看法：「如果他們看不出鬥爭有好處，就會傾向採取和平共存的哲學……，然而，一旦戰爭看來可以讓人輕易獲益，宗教寬容精神便會萎縮，唯其如此，〈申命記〉才會呼籲以色列人要『滅絕』西臺人…等穆罕默德遷居麥地那，建立自己的勢力之後，他的態度會變得像〈申命記〉裡的以色列人那樣，覺得戰爭更為可取。但只要穆罕默德一天留在麥加，攻擊教外人就是不可取的，而寬容精神也會佔上風。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古蘭經》的好戰經文是針對特定的戰爭而發，而鼓勵大批屠殺外道，只是穆罕默德的短期策略。但這類寬和主張都會受制於歷史的風向。當和睦共處甚至攜手合作的可能性存在，寬和主張也許會佔上風，但世局是會改變的。每當伊斯蘭國度受到攻擊，聖戰的定義便會從『集體主命

(fard kifaya)』變成『人人主命(fard aynl)』：即每個穆斯林都有責任作戰。

例如，當基督教的十字軍進犯敘利亞的時候，一部大馬士革出版的小冊子就聲稱，「聖戰」的定義已經轉變為人人主命，一如以往，只要非零和關係轉變為零和關係，宗教的情緒亦會隨之改變，反之亦然。」(梁永安譯，2013：377-378, 408, 414)。亦即，宗教的教義是可以隨著時空環境而變化的，某種程度來說，宗教的教義是可以被政治所影響的，甚至是為政治而服務的。

(三) 文明衝突不必然會導致恐怖主義，恐怖主義的產生是政治性的，即便與宗教相關，可能只是恐怖分子為了方便符合在地特殊情境所使用的工具 (Julie Wilhelmsen, 2010：41)。

二、國家、團體的「利益」仍為影響衝突發生之重要因素：

(一) 國家利益：

1. 大國擔心其他少數民族的仿效因此不願讓步：尤其是對中國與俄羅斯政府而言，車臣與新疆獨立將造成其他少數民族的仿效，大國難以維持完整獨立地位。菲律賓則沒有此種考量，因此可同意成立摩洛共和國。
2. 其他國家謀取自身利益：如德國與中東國家曾干預車臣衝突；以新疆為例，在 1930 年代中國無力控制新疆時，蘇聯以半殖民地或衛星國方式經營新疆，但在利益考量下，於雅爾達密約中犧牲已實質獨立的新疆，換取外蒙古及旅順與大連港口的利益；另英國也為了追求在中亞的利益在 1930 年代干預新疆事務；馬來西亞曾介入菲南衝突，均為換取自身在該區域利益。
3. 反恐與國家利益：

- (1) 美國：2001 年 9 月 11 日 911 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院在 2003

年 4 月發布的「2002 年全球恐怖主義模式報告(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03 : 125)中，指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 , ETIM)及車臣分離游擊隊的主力伊斯蘭國際維和旅(Islamic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Brigade , IIPB) 與蓋達(al-Qaeda) 組織在阿拉伯半島的資金有關；同時認定以車臣人為主要組成分子的伊斯蘭特別軍團(Special Purpose Islamic Regiment, SPIR)及裏亞杜斯-薩利欣車臣烈士偵察破壞營 (Riyadus-Salikhin Reconnaissance and Sabotage Battalion of Chechen Martyrs, RSRSCM)為恐怖組織並詳細介紹其背景。然而在美國國務院於 2013 年 5 月發布的「2012 年美國國家反恐怖主義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13)中，並未單列上開組織為恐怖主義組織，僅有在區域部分的「中國」部分提到東突組織，並引述「中國官方」認定東突是新疆地區集三惡—極端主義、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為一的恐怖主義威脅；但亦將人權組織認為中國打壓新疆地區維吾爾族穆斯林的人權問題載明於報告中(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13 : 40)。2012 年美國國家反恐怖主義報告有關俄羅斯部分，也未見美國定義車臣分離分子為恐怖組織，僅在報告內部略為提及美國與俄羅斯的反恐合作(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13 : 88)，可見美國在 911 事件初期迫於國際反恐合作需求，以定義中國及俄羅斯境內恐怖組織換取中國及俄羅斯的支持，至反恐戰爭告一段落後，美國在定義全球恐怖主義組織的問題上更顯小心翼翼，主要係出於對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亦避免「反恐」成為打壓

人權的藉口。

(2) 俄羅斯：普丁在美國遭逢 911 事件後的隔天，即呼籲世界各國與俄羅斯合作共同，對抗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威脅⁷⁹：「俄羅斯人民曾經歷第一手的恐怖攻擊，因此比其他人更了解美國。」學者康乃爾認為，911 恐怖攻擊，導致美國與歐洲各國極需俄國在阿富汗的情報與區域合作，因此給了俄國一個重建關係的機會⁸⁰(Svante E. Cornell, 2003 : 168)。

(3) 中國：藉新疆反恐合作成立「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 Organization，於 2001 年轉為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穩固其中亞利益與影響力。

(二) 團體利益：

1. 領導權的爭奪導致分離運動團體分裂：個案雖均信奉伊斯蘭教，同屬伊斯蘭文明，且都支持分離運動，但團體與團體間仍會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出現矛盾，尤其分離運動在抗爭一段時間後，面臨現實折衷與執著理想的分裂問題，可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不同，一派仍執著於獨立建國的理想，另一派則傾向折衷妥協，主戰派如車臣的巴薩耶夫、菲南的 ASG、新疆的 ETIM 與 ETGE。折衷派如車臣的馬斯哈多夫總統、菲南的 MNLF 及 MILF、新疆的青年維吾爾代表大會。而政府也樂於分化分離運動團體的勢力並利用之，如主和的

⁷⁹ 其原文為”Putin, several months earlier, warning the world that it ought to cooperate with Moscow against the common threat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The Russian people understand the American people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having experienced terrorism first-hand,” President Putin declared the day after the attacks.” 資料來源：Francesca Mereu, 2001, “U.S. : Russia Says Chechen Conflict Aids ‘Understanding’ of U.S. Tragedy,” RFE/RL, September 14

⁸⁰ Svante E. Cornell 之原文為”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have presented Russia an opportunity to reshape its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the U.S. who need Russian intelligence and cooperation in Afghanistan.”

車臣共和國總統馬斯哈多夫與主戰的軍閥巴薩耶夫及其部隊因在第一次車臣戰爭後，無法協同一致導致第二次車臣戰爭並喪失獨立地位；軍閥政治與犯罪集團利益糾葛的菲南，就分裂成最終取得與政府協商權力的 MILF 與逐漸被邊緣化的 MNLF 及阿布薩耶夫組織(ASG)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3)；新疆則有以爭取民主自決自居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UC)與堅決追求獨立的東突厥斯坦流亡政府(ETGE)等。

2. 不同團體間為了各自的不同利益而進行共同的目標：如車臣境內恐怖主義活動的發展不僅僅是宗教因素，還有民族主義與犯罪活動的因素。有許多不接受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價值觀的民族主義人士因為民族因素仍給予叛軍支持；另外，不願受到俄羅斯強力中央集權管制的車臣黑幫組織也支持有一個獨立但較弱小的政府以進行賄賂與脅迫(James M. Lutz and Brenda J. Lutz, 2008 : 193)。另外，OIC 則為了尋求團結不同伊斯蘭國家，包括居住於「非 OIC 會員國」的穆斯林少數團體，尋求成為國際舞台上的「烏瑪」⁸¹(ummah)(Batyor, 2011 : 156)。
3. 金錢：車臣指揮官因多年戰事變得激進，而有些接受「聖戰」的理念，僅僅為了接受富有的波斯灣支持者源源不絕流入的財富與資金與武器；菲南的阿布薩耶夫組織某種程度上現已轉變為犯罪組織，著重在綁架犯罪獲得的收益上而非為了宣揚政治理念(James M.

⁸¹ 維基百科：烏瑪（阿拉伯語：أمة、Ummah），本意為「民族」，引申為「社群」。但烏瑪不同於「薩本」（阿拉伯語：شعب、Sha'b），後者指擁有共同祖先和地理的民族。理論上所有跨國界的穆斯林同屬擁有共同歷史的烏瑪成員，而非西方人的民族國家意義的同一民族。622 年 9 月 24 日聖遷後，穆罕默德以麥地那作為根據地，號召穆斯林建立起組織嚴密的、為伊斯蘭而奮鬥的武裝社群，烏瑪概念為伊斯蘭教的勝利發展和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現代泛伊斯蘭主義者口中的烏瑪，正是指「共信者的聯邦」ummah al-mu'minīn)。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7%91%AA>。

Lutz and Brenda J. Lutz, 2008 : 98)。國際危機團體 2013 年的文章即指出金錢與資源對這些叛亂團體及其即將組成的新政府的重要性：「菲律賓政府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於 2013 年達成了歷史性的協定，這使得數千名戰鬥人員的何去何從充滿變數。菲律賓政府、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領導人以及捐助國擔心，叛亂戰士可能會重新投入暴力行動。解除武裝、復員和重返社會。該自治區應享有更多權力、更多領土和更多資源控制權。這份框架協議設想在動亂的、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南部成立一個新政府，新政府負責自己的財政收入，擁有自主的員警和司法系統。」(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2013)

三、個案專制或民主政體內部因政治體制的不同，使得人民在選擇衝突的形式上會有所不同：

(一) 專制國家控制力減弱或政策轉向突然放鬆政治氣氛時，抗議活動會大量出現，如 1980 年代末的車臣及新疆；民主國家的菲律賓則沒有這種情形。

(二) 專制國家因政府控制力較強，分離團體在沒有其他抒發管道可以與尋求解決問題的政治途徑之情形下，容易直接導致恐怖主義產生。如車臣的衝突升高模式為「抗議」→「戰爭」→「恐怖攻擊」；新疆為「抗議」→「恐怖攻擊」；菲南為「抗議」→「武裝衝突」→「戰爭」→「恐怖主義」。菲南顯然較車臣與新疆有較多緩衝的衝突漸次升高階段。

四、雖然同屬伊斯蘭教，同時具有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但個案恐怖主義活動發展現況並不相同：

(一) 車臣恐怖主義活動在俄羅斯政府擊殺叛軍領導人與大力掃蕩後，恐怖主義活動已有下降之趨勢，但俄羅斯境內仍不時發生由車臣獨立運動分子

所發動之恐怖攻擊。

(二) 新疆的恐怖攻擊因資料取得困難，大多沒有明確的調查報告，難以查證事件真實樣貌。另有學者認為，新疆恐怖攻擊較少的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各方面軟硬政策成功壓制恐怖主義(Martin I. Wayne, 2008 : 8-10)。

(三) 菲南的恐怖主義攻擊近來已發展成以綁架、取得金錢為主，比起因追求獨立等之政治目的而發動恐怖攻擊，次數已相對減少，菲南現今恐怖主義攻擊主要是為求組織的發展與生存，已轉變成與犯罪集團無異。

五、「文明」的分類過於簡化：將韓國歸類為儒家文明，因此北韓與南韓間於1990年代後的衝突並無法以杭廷頓的理論角度檢視，導致儒家文明與其他文明發生衝突的機率大增，南北韓問題並非文明衝突理論可以解釋，此結果僅能以政治意識形態之對抗解釋之；而東南亞地區國家信仰複雜，人種亦大有不同，以一個籠統的文明來規範之實在有欠妥當。另外東正教與基督教系出同源，僅因東正教核心代表國家是俄羅斯、基督教核心代表國家是美國就將其分為兩文明亦有爭議，如然，何不將天主教與基督教徹底分開檢視？在文明的分類上就有很多問題存在。

六、個案確實存在文化上的衝突，但不至於演變成全球性的「文明衝突」，因為衝突與衝突間仍有不同的其他因素。複合性因素可能激起更高程度的衝突；如貧富差距、種族差異、經濟、政治等等因素。

七、伊斯蘭教本身並非恐怖主義的溫床，但確實有分離運動或恐怖主義組織利用伊斯蘭教來團結群眾、招募人力、獲取國際資金來源或鞏固其領導勢力之情形，各國政府在面對種族、宗教等分離運動或恐怖主義活動時，建議應把焦點放在政治上，而非轉移到壓迫宗教自由上，因為宗教本身並非衝突發生的原因，各項衝突的發生還是政治性的，必須尋求政治途徑解決，而非壓迫或管制宗教、制定歧視特定宗教的政策。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論文研究期間所統計個案冷戰後的衝突與戰爭的資料數量僅有 20 年左右，無法有效看出量化成果，因此未來仍可在量化資料較為充足情形下重新檢視個案衝突因素影響，或可以迴歸分析替代本論文的相關性分析，並可在歷史背景、文明衝突理論上更為充實相關資料，以利更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雖然在車臣、新疆與菲南問題上有初步的資料整理，但未來仍可專精於其中任一特定區域之衝突深入研究衝突的成因，或是更深入蒐集個人層次(如國家領導人與團體領導人的決策過程、分離運動分子與恐怖分子的訪談資料等)研究資料將可獲致更詳盡的成果。

杭廷頓繼 1997 年發表文明衝突理論後，又於 2004 年出版《誰是美國人》一書，論述美國未來可能因為多元文化而造成國家認同的危機，產生原本以白人為主、信仰基督教、說英語的美國社會可能會因為移民越來越難以被同化，同時存在多元文化、人民信仰不同宗教、甚至使用不同語言等對美國文化的威脅。杭廷頓認為：「穆斯林，特別是阿拉伯的穆斯林，相較於 1965 年後的其他族群，似乎在同化的步伐上是緩慢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基督教與猶太教對於伊斯蘭教的偏見升高所致，因為 1990 年代末期高度曝光的恐怖主義事件是由或被認為是由伊斯蘭極端組織所為。這樣的難處也可能根源於伊斯蘭文化的特性及與美國文化的差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證明伊斯蘭少數族群對非伊斯蘭社會來說是『難以消化』的一群。」(高德源等譯，2008:194) 該書中另引用政治哲學家盧梭的話：「如果連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甚麼國家可以期待永久存續？」(高德源等譯，2008：29) 由此可見，杭廷頓對於文明衝突更深一層的思考，來自於對美國國內文化認同的危機，其真正擔憂的也許是，美國將可能會變成以亞裔、墨裔或非裔等移民為主、信仰伊斯蘭教、說西班牙語為主的美國社會，而此多元文化社會可能對美國造成的威脅。筆者認為，這可視為杭式將文明衝突理論範圍由全球範圍

縮小至美國國內的文明衝突，這是杭式以自身美國經驗對文明衝突理論的實際案例思考，而此部分研究則有待其他專家學者進一步的論證分析。



附 錄

附錄 1 全球由分離運動獨立之國家對照表。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CIA 網站、筆者自行整理。

因分離運動獨立之國家對照表

分離國家	分離時間	隸屬文明	原國家	原國家文明	文明衝突	武裝衝突	分離主因	備註
蒙古國(MONGOLIA)	1946	佛教文明	中國(CHINA)	中國文明	○	X	種族、語言、政治變革	
新加坡共和國(SINGAPORE)	1965	中國文明	馬來西亞聯邦(MALAYSIA)	伊斯蘭文明	○	X	種族、經濟	
克羅埃西亞(CROATIA)	1991	基督教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語言、宗教	
斯洛維尼亞(SLOVENIA)	1991	基督教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語言、宗教	
亞塞拜然(AZERBAIJAN)	1991	伊斯蘭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哈薩克(KAZAKHSTAN)	1991	伊斯蘭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吉爾吉斯(KYRGYZSTAN)	1991	伊斯蘭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塔吉克(TAJIKISTAN)	1991	伊斯蘭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	1991	伊斯蘭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	1991	伊斯蘭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亞美尼亞(ARMENIA)	1991	基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立陶宛(LITHUANIA)	1991	基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	X	種族、宗教、政治變革	
厄利垂亞(ERITREA)	1993	伊斯蘭文明	衣索比亞(ETHIOPIA)	非洲文明	○	○	種族、宗教	
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	1994	伊斯蘭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語言、宗教	
東帝汶(TIMOR-LESTE)	2002	基督教文明	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伊斯蘭文明	○	○	宗教	
科索沃(KOSOVO)	2008	伊斯蘭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語言、宗教	
南蘇丹(SOUTH SUDAN)	2011	非洲文明	蘇丹(SUDAN)	伊斯蘭文明	○	○	種族、宗教、經濟	
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SERBIAN KRAJINA)	1990-1995	東正教文明	克羅埃西亞(CROATIA)	天主教文明	○	○	種族、宗教	
孟加拉(BANGLADESH)	1971	伊斯蘭文明	巴基斯坦(PAKISTAN)	伊斯蘭文明	X	○	種族、語言、地理位置	
馬其頓(MACEDONIA)	1991	東正教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語言	
白俄羅斯(BELARUS)	1991	東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政治變革	
愛沙尼亞(ESTONIA)	1991	東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政治變革	
喬治亞(GEORGIA)	1991	東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政治變革	
拉脫維亞(LATVIA)	1991	東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政治變革	
摩爾多瓦(MOLDOVA)	1991	東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政治變革	
烏克蘭(UKRAINE)	1991	東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政治變革	
塞爾維亞(SERBIA)	1992	東正教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語言	
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	1992	基督教文明	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	基督教文明	X	X	種族、經濟	
斯洛伐克(SLOVAKIA)	1992	基督教文明	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	基督教文明	X	X	種族、經濟	
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	2006	東正教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X	X	種族、語言	
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SFRY)	—	東正教文明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FRY)	東正教文明	X	X	—	
俄羅斯(RUSSIA)	—	東正教文明	蘇聯(USSR)	東正教文明	X	X	—	

附錄 2 全球追求獨立但尚未受國際認可之政治實體對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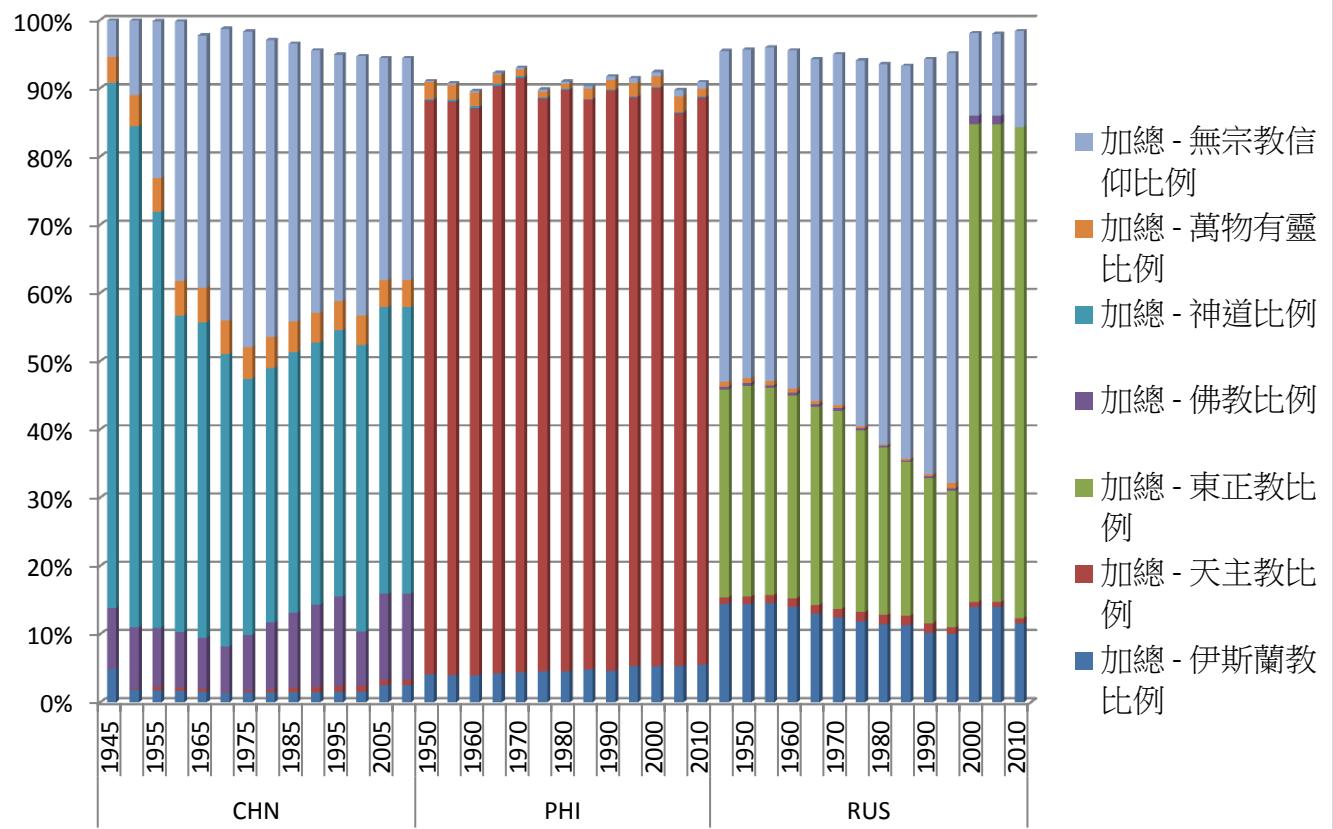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CIA 網站、筆者自行整理。

追求獨立但尚未受國際認可之實體對照表										
分離實體	時間	隸屬文明	原國家	原國家文明	文明衝突	武裝衝突	分離主因	政權狀態	恐怖主義組織	備註
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	1983	伊斯蘭文明	賽普勒斯(CYPRUS)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宗教	實質獨立		土耳其支持
巴勒斯坦國(PAESTINE)	1988	伊斯蘭文明	以色列(ISREAL)	基督教文明	○	○	種族、宗教、語言	實質獨立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HAMAS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 (NAGORNO-KARABAKH)	1991	基督教文明	亞塞拜然(AZERBAIJAN)	伊斯蘭文明	○	○	種族、宗教	實質獨立		
阿布哈茲共和國 (ABKHAZIA)	1992	東正教文明	喬治亞(GEORGIA)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	實質獨立		俄羅斯支持
科索沃(KOSOVO)	2008	伊斯蘭文明	塞爾維亞(SERBIA)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語言、宗教	實質獨立		西方國家支持
車臣共和國 (CHECHENYA)	—	伊斯蘭文明	俄羅斯(RUSSIA)	東正教文明	○	○	種族、宗教	1999遭軍事壓制	Caucasus Emirate	
北愛爾蘭(NORTH IRELAND)	—	天主教文明	英國(ENGLAND)	基督教文明	○	○	宗教	自治政府	IRA、RIRA	馬克思主義
泰米爾	—	伊斯蘭文明	斯里蘭卡	印度教文明	○	○	種族、宗教	實質獨立	LTTE	
菲律賓南部地區	—	伊斯蘭文明	菲律賓(PHILLIPINE)	西方文明	○	○	種族、宗教	自治政府	ABU SAYYAF GROUP (ASG)、MILF、MNLF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XINJIANG)	—	伊斯蘭文明	中國(CHINA)	中國文明	○	X	種族、宗教	特別行政區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魁北克(QUEBEC)	—	天主教文明	加拿大(CANADA)	基督教文明	○	X	文化、語言、宗教	省	Quebec Liberation Front	馬克思主義
巴斯克自治區(BASQUE)	1959	基督教文明	西班牙(SPAIN)	基督教文明	X	○	種族、語言	2011年放棄暴力	Basque Fatherland Liberty(ETA)	
亞齊特別行政區(ACEH)	1976	伊斯蘭文明	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伊斯蘭文明	X	○	歷史、經濟	2006實施自治	Free Aceh Movement(GAM)、Aceh Sumatr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ASNLF)	
撒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國 (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	1976	伊斯蘭文明	摩洛哥(MOROCCO)	伊斯蘭文明	X	○	政治變革	實質獨立		阿爾及利亞支持
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 (TRANSNISTRIA)	1990	東正教文明	摩爾多瓦(MOLDOVA)	東正教文明	X	○	種族	實質獨立		俄羅斯支持
索馬利蘭共和國 (SOMALILAND)	1991	伊斯蘭文明	索馬利亞(SOMALIA)	伊斯蘭文明	X	○	政治變革、極端宗教	自治政府(軍閥)		
南奧賽梯亞共和國 (SOUTH OSSETIA)	1991	東正教文明	喬治亞(GEORGIA)	東正教文明	X	○	種族	實質獨立		俄羅斯支持
邦特蘭國(BUNTLAAND)	1998	伊斯蘭文明	索馬利亞(SOMALIA)	伊斯蘭文明	X	○	政治變革、極端宗教	自治政府(軍閥)		

附錄 3 個案主要宗教信仰人口百分比變化

根據COW資料庫⁸²，繪製個案自1945年至2010年主要宗教信仰百分比例變化圖；另根據Robert J. Barro, Paul M. Warburg⁸³之資料庫，分別繪製1900年、1970年及2000年個案主要宗教信仰人口百分比圖。

1945年至2010年中國、菲律賓及俄羅斯主要宗教 信仰百分比例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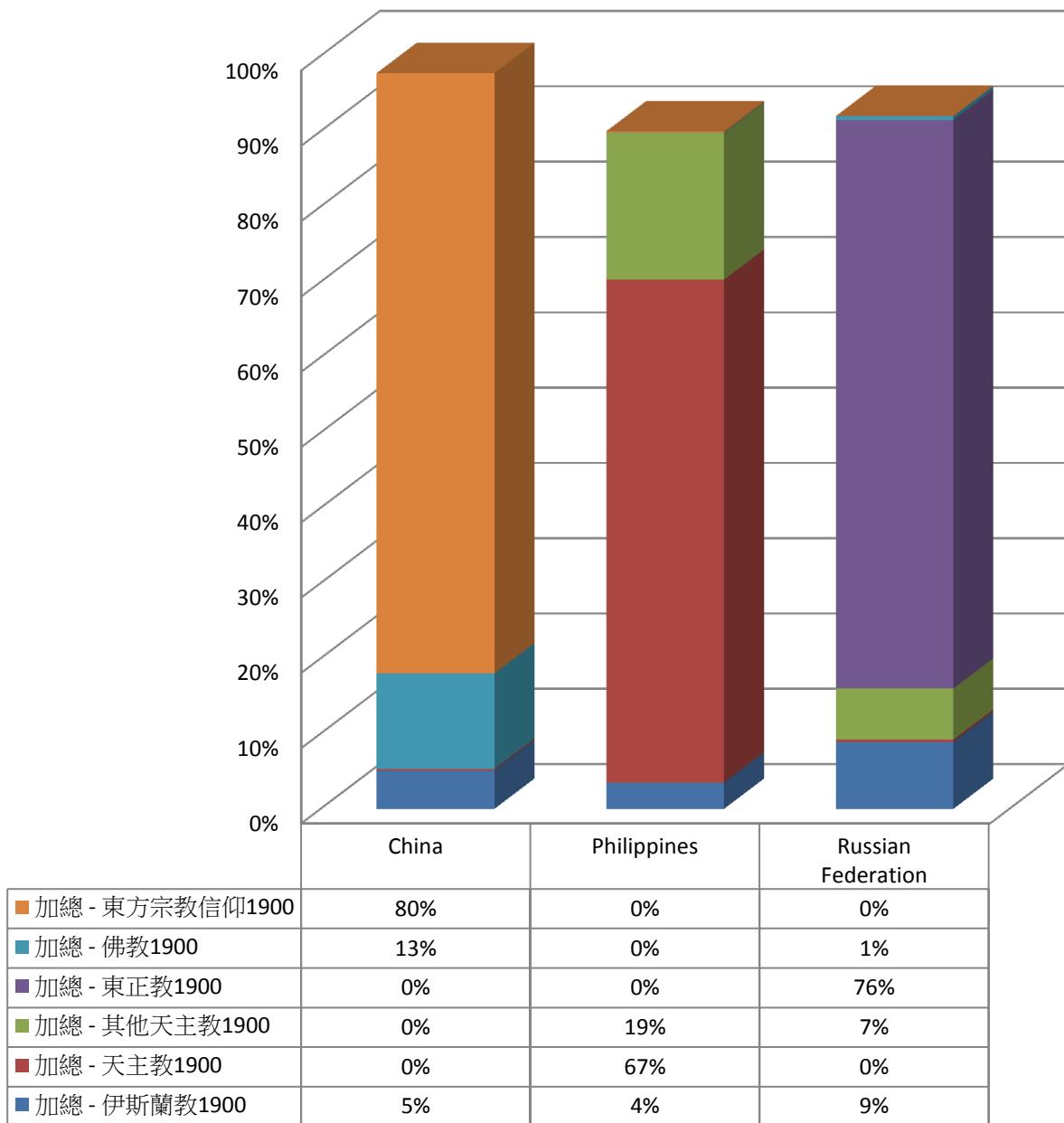
1945年至2010年中國、菲律賓及俄羅斯宗教信仰人口比例變化圖。

筆者自行製表。資料來源：COW(Correlates of War)，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⁸² COW(Correlates of War)，<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⁸³ Robert J. Barro, Paul M. Warburg, <http://scholar.harvard.edu/barro/publications/religion-adherence-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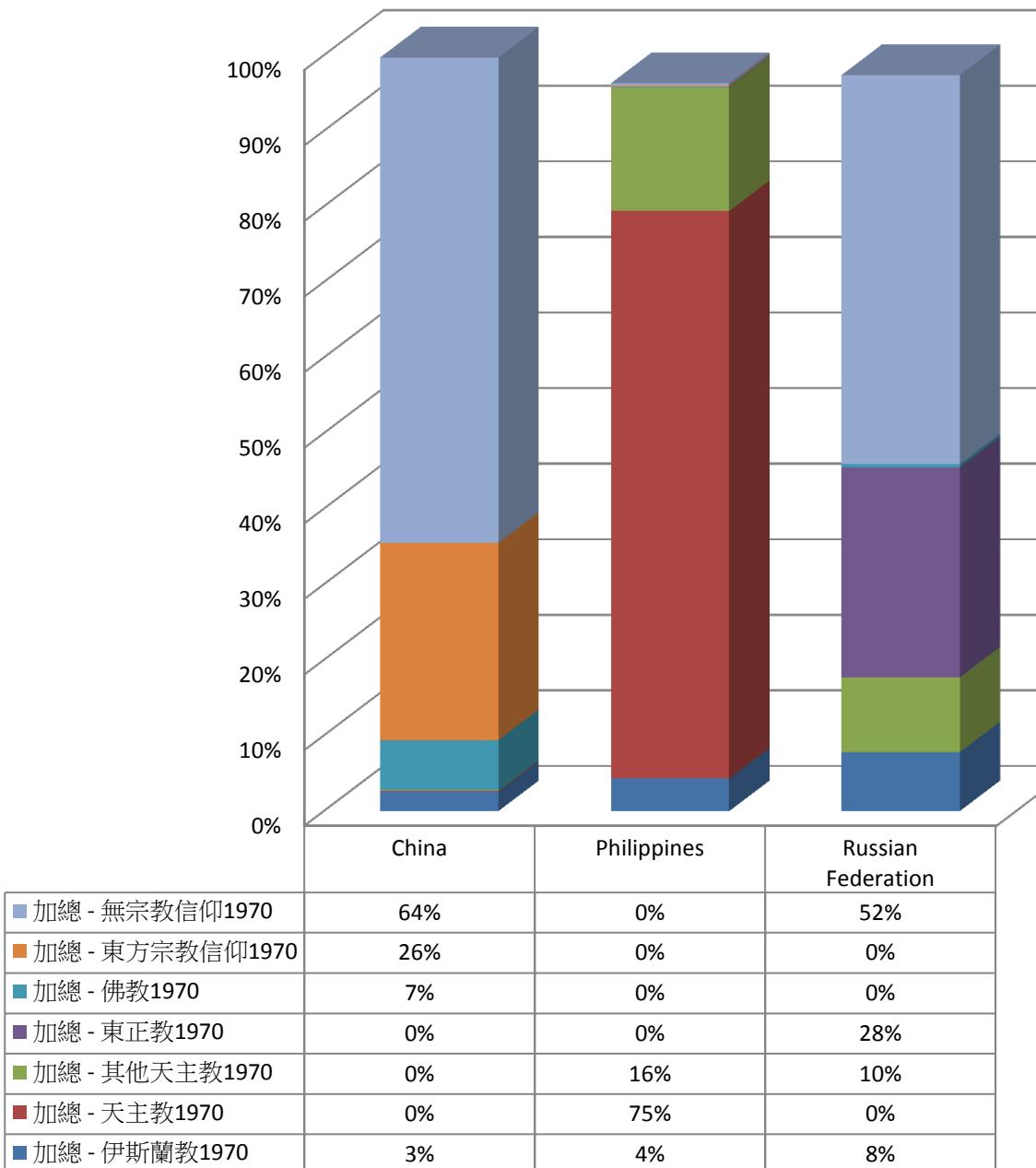
1900年中國、菲律賓及俄羅斯主要宗教信仰人口百分比



1900 年個案主要宗教信仰人口分布。

筆者自行製表。資料來源：Robert J. Barro, Paul M. Warburg, <http://scholar.harvard.edu/barro/publications/religion-adherence-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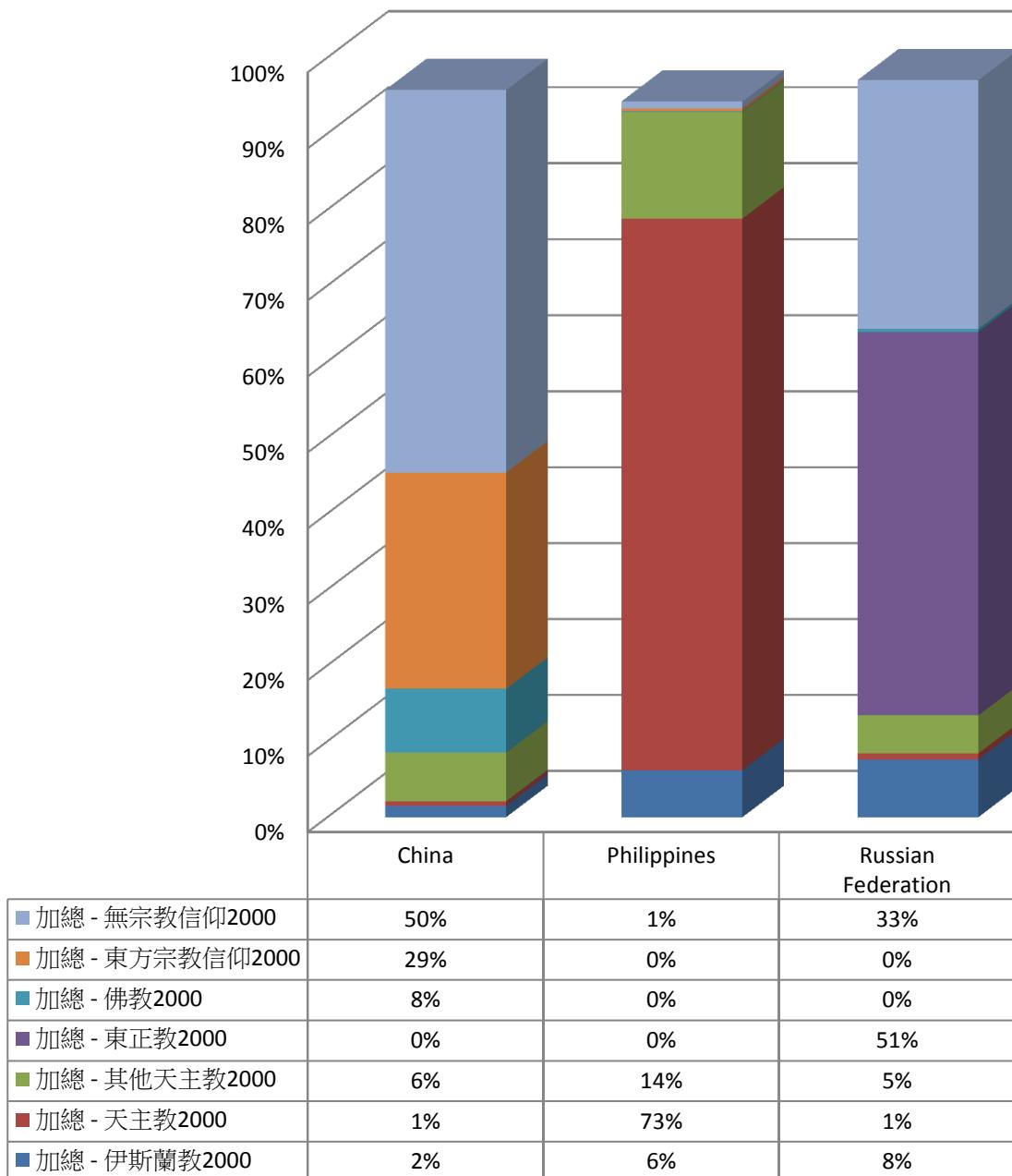
1970年中國、菲律賓及俄羅斯主要宗教信仰人口百分比



1970 年個案主要宗教信仰人口分布。

筆者自行製表。資料來源：Robert J. Barro, Paul M. Warburg, <http://scholar.harvard.edu/barro/publications/religion-adherence-da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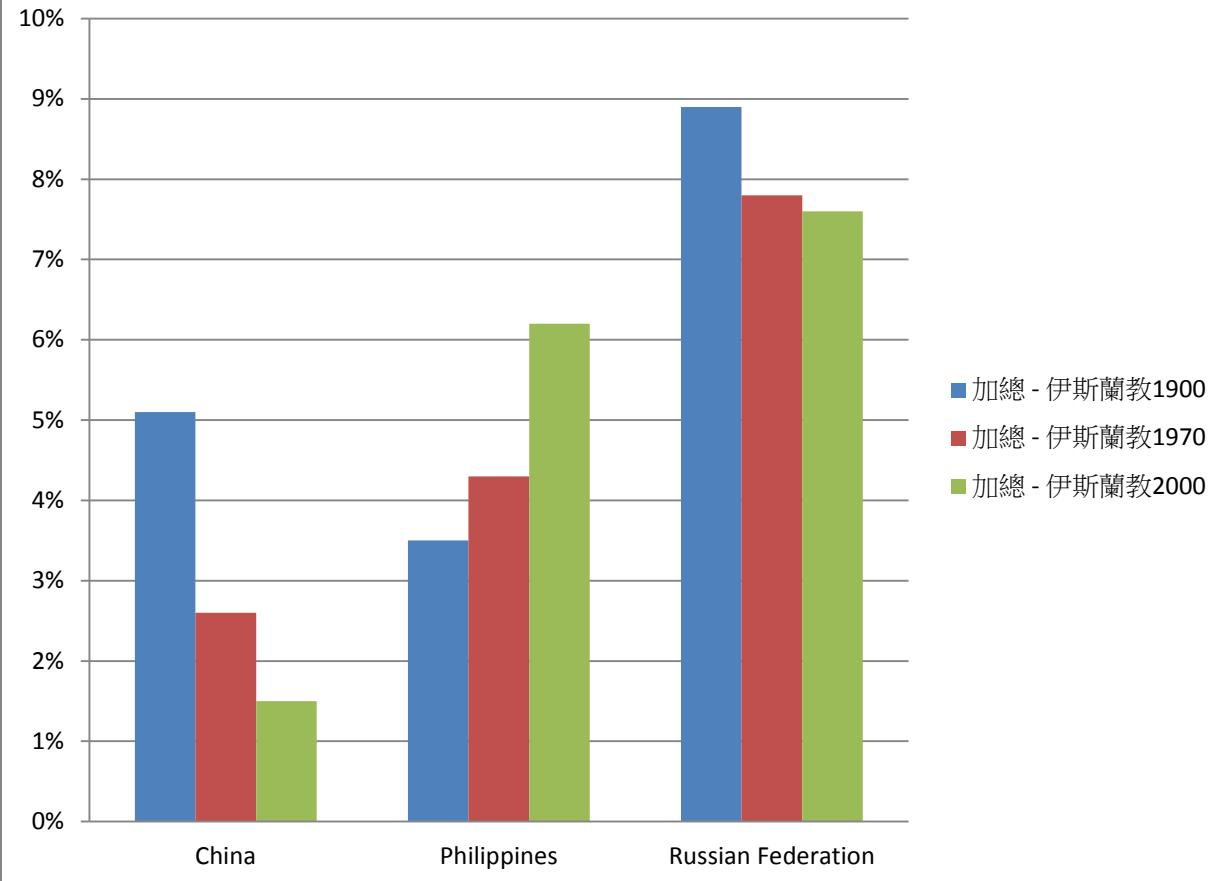
2000年中國、菲律賓及俄羅斯主要宗教信仰人口百分比



2000 年個案主要宗教信仰人口分布。

筆者自行製表。資料來源：Robert J. Barro, Paul M. Warburg, <http://scholar.harvard.edu/barro/publications/religion-adherence-data>。

個案1900年、1970年及2000年信仰伊斯蘭教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變化表



個案 1900 年、1970 年及 2000 年信仰伊斯蘭教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變化表。

筆者自行製表。資料來源：Robert J. Barro, Paul M. Warburg, <http://scholar.harvard.edu/barro/publications/religion-adherence-data>。

參考書目及資料

壹、中文書目

Earl Babbie 著，林佳瑩、徐富珍校訂。2006。《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台北：
雙葉書廊。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2002。《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
探索》。北京：時事。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2004。《國際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
年鑑》。北京：時事。

方天賜、孫國祥。2007。〈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
二版：194-218。台北：揚智文化。

方淑惠譯，Dennis Pisziewicz 著。2007。《恐怖主義與美國的角力》。台北：國防
部部辦室。

王玉民。199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葉文化。

朱威烈 等著。2010。《中東反恐怖主義研究》。北京：時事。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

吳叡人譯，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著。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
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

李鳳新譯，Marc Crepon 著。2005。《製造敵人的文化》。台北：果實出版。

汪毓璋 主編。2009。《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論文集》。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汪毓璋 編著。2006。《國際重要恐怖活動與各國反制作為大事紀》。台北：幼獅
文化。

沃爾特・拉奎爾(Walter Laqueur)。1996/9-10 月。〈後現代恐怖主義〉。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2002。《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頁 158。

岳大鵬。2011。《分裂中國—新疆內蒙西藏動亂》。香港：明鏡。

邱伯浩 編著。2006。《恐怖主義與反恐》。台北：新文京開發。

邱穎壤 編著。1996。《國際政治(全)》。台北：華視文化事業。

邱穎壤 編著。2004。《國際反恐與亞太情勢》。台北：政大國研中心。

邱德亮、黃宏昭譯，Jean Baudrillard 著，朱元鴻主編、校閱。2006。《恐怖主義的精靈》台北：麥田出版。

阿里夫・賈邁勒(Arif Jamal)。2001/10/9。〈是恐怖主義還是聖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2002。《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頁 109-110。

俞力工。2008。《反恐戰略與文明衝突》。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

胡祖慶譯，Austin Ranney 著。1991。《政治學》。台北：五南。

胡聯合。2001。《當代恐怖主義與對策》。北京：東方。

范明強。2005。《社會學視野中的恐怖主義》。北京：解放軍。

孫渤。2011。〈俄羅斯的反恐怖鬥爭：形勢、問題及前景〉。汪毓璋，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中華國土安全研究協會，《第七屆「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術暨實務研討會》：1-15。台北：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

耿曙、姚源明。2007。〈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二版：146-167。台北：揚智文化。

馬傳鎮。2008。《犯罪心理學新論》。台北：心理。

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Samuel P. Huntington 著。2008。《誰是美國人？》。

台北：左岸文化。

張亞中 主編。2007。《國際關係總論》二版。台北：揚智文化。

張紹勳。2001。《研究方法》：520。台中：滄海書局。

張舜芬譯，Jonathan Barker 著。2005。《誰是恐怖主義：當恐怖分子遇上反恐戰爭》。台北：書林。

梁永安譯，Robert Wright 著。2013。《神的演化》：377。新北：大家。

許春金。2006。《犯罪學》。台北：三民書局。

許雲翔、江佩娟、葉錦娟、劉中文譯，Percy B. Lehning 編著。2002。《分離主義的理論》。台北：韋伯文化。

陳光中、秦文力、周愫嫻譯，Neil J. Smelser 著。1995。《社會學》。台北：桂冠。

陳斯英。1985。〈伊寧事變前後的新疆政局〉。載甘肅省圖書館書目參考部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冊）：415。蘭州：甘肅省圖書館。

曾祥穎譯，Olga Oliker 著。2006。《車臣戰爭 1994-2000：城鎮戰之經驗教訓》。台北：國防部部辦室。

曾章瑞、周茂林、胡瑞舟。2005。《新世紀國家安全與國防思維》台北：空大。

黃富源、范國勇、張平吾。2002。《犯罪學概論》。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黃裕美譯，Samuel P. Huntington 著。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

楊佳蓉、莊勝雄譯，Chester Wong 著。2013。《特戰綠扁帽》。台北：商周。

蒂埃里·德蒙布里亞爾(Thierry de Montbrial)。2001/10/4。〈革命與民族的恐怖主義〉。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2002。《恐怖主義與反恐怖

鬥爭理論探索》：頁 53。

劉承宗。2009。《恐怖主義與現勢分析》。台中：天空數位圖書。

劉軍寧譯，Samuel P. Huntington 著。2008。《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台北：五南。

劉復國。2007。《東南亞恐怖主義與亞太安全》。台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蔡文輝。2001。《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

鄧紅風譯，Will Kymlicka 著。2004。《少數群體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權》。台北：左岸文化。

盧嵐蘭譯，Norman Goodman 著。1996。《社會學導論》。台北：桂冠。

貳、中文期刊

Erkin Ekrem(2008)〈中蘇關係中的「東突」問題(1944-45)〉。《兩岸發展史研究》，第 6 期：109-213。

吳征宇。2001/12。〈關於層次分析的若干問題〉。《歐洲》，第 19 卷第 6 期：3-10。

吳啟訥。2009/9。〈民族自治與中央集權—1950 年代北京藉由行政區劃將民族區域自治導向國家整合的過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5 期：81-137。

哈日巴拉。2008/10。〈新疆的政治力學與中共的民族政策〉。《二十一世紀》，卷 109：26-35。

宋學文。2008/12。〈層次分析對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與模型建構〉。《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4 期：181。

李玉珍。1995/8。〈車臣事件與俄羅斯聯邦的民族問題〉。《問題與研究》，卷 34，第 8 期：35-46。

侍建宇、傅仁坤。2010/10。〈烏魯木齊七五事件與當代中國治理新疆成效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卷 11，第 4 期：149-190。

孟鴻。2010/9。〈新疆民族關係及歷史事件〉。《中國邊政》，第 183 期：19-35。

侯艾君。2006/10。〈流放車臣人：原因、事實與後果〉。《二十一世紀》，卷 85：118-127。

胡瑞舟。2003/1。〈反恐戰爭對美國內外互動關係的影響：一年後的分析性概述〉。《遠景基金會季刊》，卷 4，第 1 期：41-64。

翁俊桔。2004。〈斷裂的文明衝突：菲南分離運動之個案分析〉。《問題與研究》，卷 43，第 6 期：103-127。

趙竹成。2011/7。〈中國的民族分離運動-新疆案例的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 32 期：13-50。

劉青雲。2004/9。〈菲律賓南部摩洛分離運動之形成與發展〉。《亞太研究論壇》，第 25 期：121-133。

參、博碩士論文

吳榮裕。2009。東突極端組織活動與中共國際反恐戰略之研究。私立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長杰。2005。從民族主義到恐怖主義－以車臣共和國作分析（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四年）。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禮棟。2000。菲律賓摩洛人分離運動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悧吉。2008。東突問題之研究：分離主義或恐怖主義？。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靖芳。2002。民族分離運動的比較研究：以俄羅斯聯邦之韃靼共和國與車臣共和國為例。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巧怡。2003。俄羅斯聯邦與車臣問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肆、西文書目

Azani, Eitan (2009) *Hezbollah: The Story of the Party of God—From Revolu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ar, Shmuel (2006) *Warrant for Terror: Fatwas of Radical Islam and the Duty of Jiha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Barreveld, Drs. Dirk J. (2001) *Terrorism in the Philippines: the bloody trail of Abu Sayyaf, Bin Laden's East Asian connection*. NE: Writers Club Press

Benjamin, Daniel and Steven Simon (2002) *The Age of Scared Terror*. 18. New York: Random House.

Clarke, Michael E. (2011) *Xinjiang and China's Ris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Routledge: Oxon.

Clutterbuck, Richard (1990) *Terrorism and Guerrilla Warfare: forecasts and remedies*. 13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onquest, Robert (1970) *The Nation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170. London: MacMillan.

Coolsaet, Rik (2008) *Jihadi Terrorism and the Radicalisation Challenge in Europe*.

-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Crenshaw, Martha (1978)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21-153.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Crenshaw, Martha (1995) 'Thoughts on Relating Terrorism to Historical Contexts', Martha Crenshaw ed., *Terrorism in Context*:3, 24.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renshaw, Martha (2003) 'Why America the Primary Target?' *The new global terrorism: characteristics, causes, controls*: 160-172.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 Crenshaw, Martha (2008) "The Debate over "New" vs. "Old" Terrorism." ed. by Ibrahim A. Karawan, Wayne McCormack and Stephen E. Reynolds. *Values and Violence: Intangible Aspects of Terrorism*:116-136. Utah: Springer.
- Crenshaw, Martha (2010) *The Consequences of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Dane, Francis C. (1990) *Research Methods*.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Dunlop, John B. (1998) *Russia Confronts Chechnya: Roots of a Separatist Conflict*.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rrer, Miriam Coronel (2005) "The Moro and the Cordillera Conflict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truggle for Autonomy." ed. by Kusuma Snitwongse and W Scott Thompson. *Ethnic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121-162.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Fox, Jonathan (2004) *Religion, Civilization, and Civil War: 1945 through the new millennium*. UK: Lexington Books.

Fox, Jonathan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UK: Routledge.

Fox, Jonathan and Shmuel Sandler (2004)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Fox, Jonathan and Shmuel Sandler ed.(2006) *Religion in World Conflict*. New York: Taylor&Francis Ltd.

Galeano, Eduardo (2000) *Upside Down: A Primer for the Looking-Glass World*, New York: Henry Holt.

German, Tracey C. (2003) *Russia's Chechen War*. New York: Routledge.

Giglio, Davide (2004) *Separat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China's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Peace Operation Training Institute.

Gurr, Ted Robert (2000) *Peoples Versus States: Minorities at Risk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offman, Bruce (2006) *Inside Terrorism, 2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Hoffman, Bruce (2008) Accessing the State of Al Qaeda and Current and Future Terrorist Threats. ed. by Ibrahim A. Karawan, Wayne McCormack and Strphen E. Reynolds. *Values and Violence: Intangible Aspects of Terrorism*:99-115. Utah: Springer.

Horgan, John (2005)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Howell, Llewellyn D. (2003) Is The New Global Terrorism a Clash of Civilization? Evaluating Terrorism's Multiple Sources. *The new global terrorism: characteristics, causes, controls*: 173-184.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 Hughes, James (2007) *Chechnya: From Nationalism to Jihad*. Phnnsylac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Kamalov, Ablet (2009) “Uyghurs in the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ed. by Colin Mackerras and Michael Clarke. *China,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History, transition and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115-132. Oxon: Routledge.
- Kaplan, Morton A. (1964)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 Karmon, Ely (2005) *Coalitions betwee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Revolutionaries, Nationalists and Islamists*:19-58. Boston: BRILL.
- Kegley, Jr., Charles W. (2003) *The new global terrorism: characteristics, causes, controls*.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 Koppel, Nikolas J. (2010) *Combating Islamic Militancy and Terrorism in Pakistan's Border Reg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 Malley-Morrison, Kathleen (2013) “Preface.” ed. by Kathleen Malley-Morrison Sherri McCarthy and Denise Hine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War, Torture, and Terrorism*: xii-xv. New York: Spiner.
- Martin, Gus (2013)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4th Edition*.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Millward, James A. (2004) *Violent Separatism in Xinjiang: A Critical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 Millward, James A. (2007)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illward, James A. (2009) "Positioning Xinjiang in Eurasian and Chinese history
Differing visions of the 'Silk Road'" ed. by Colin Mackerras and Michael Clarke.
*China,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 History, transition and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55-74. Oxon: Routledge.
- Mutalib, Hussin (2008) *Islam in Southeast Asia*:64-79.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Rapoport, David C. (1971) *Assassination and Terrorism*: 44. Toronto: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 Rapoport, David C. (2004) "Four Waves of Modern Terrorism." ed. by Audrey Kurth
Cronin and James M. Ludes. *Attacking Terrorism: Elements of a Grand Strategy*:
46-73.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Riedel, Bruce (2008) *The search for al Qaeda: Its Leadership, Ideology, and Futur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Sageman, Mark (2008) *Leaderless Jihad: Terror Networ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Salter, Frank (2008) "Ethnicity and Indoctrination for Violence: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ing Terrorists." ed. by Ibrahim A. Karawan, Wayne McCormack and
Stephen E. Reynolds. *Values and Violence: Intangible Aspects of Terrorism*:
63-79. Utah: Springer.
- Savitch, H. V. (2008) *Cities in a Time of Terror: Space, Territory, and Local
Resilience*. England: M. E. Sharpe, Inc.
- Sidel, John T. (2007) *The Islamist Threat in Southeast Asia: A Reassessment*: 44-48.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iegle, Larry (2003) *Criminology, 8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 Simon, Gerhard (1991)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372-373.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Vertigans, Stephen (2009) *Militant Islam: A sociology of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altz, Kenneth N. (2001)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yne, Martin I. (2008) *China's War on Terrorism: Counter-insurgency, politics, and internal security*: Oxon:Routledge.
- Ye'or, Bat (2011) 'The Impact of the 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n Europe' ed. by Sarah N. Stern. *Saudi Arabia and the Global Islamic Terrorist Networ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伍、西文期刊

Charron, Nicholas (2010)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A post-Cold War empirical analysis of Samuel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or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5, no.1 , p.107-127.

Cornell, Svante E. (2003)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the Conflict in Chechnya: A Case for Distinction',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27, no.2, p.167-184.

Crenshaw, Martha (1981) 'The Causes of Terrorism',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3, no. 4 , p 379-399.

- Davis, Elizabeth Van Wie (2008) 'Uyghur Muslim Ethnic Separatism in Xinjiang, China', *Asian Affairs*, vol.35, no.1:15-26.
- Dunlop, John B. (2000) 'How Many Soldiers and Civilians Died During the Russo-Chechen War of 1994-96?'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9, no.3/4, p.328-338.
- Fox, Jonathan (2007) 'Religio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ise of religion and the fall of the civilization paradigm as explanations for intra-state conflic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3, p.366.
- Fox, Jonathan (2012) 'The Religious Wave: Religion and Domestic Conflict from 1960 to 2009', *Civil Wars*. vol.14, no.2, p.141–158.
- Gartzke, Erik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2006) 'Identity and Conflict: Ties that Bind and Differences that Divid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P. 53-87
- Henderson, E. (2005) 'Not Letting Evidence Get in the Way of Assumptions: Testing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sis with More Recent Dat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vol. 42, p.458-469.
- Männik, Erik (2009) 'Terrorism: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ENDC Proceedings*, nr 12, p.151-171.
- Milligan, Jeffrey Ayala (2006) 'Reclaiming an Ideal: The Islamiz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vol. 50, no. 3, p.410-430.
- Morada, Noel (2012)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Between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the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 Prospects for Peace

- and Implications for R2P', *APC R2P Brief*, vol. 2, no. 8, p.1-6.
- Neumayer, Eric and Thomas Plümper (2009) '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p. 711-734.
- Russett, Bruce, John R. Oneal and Michaelene Cox (2000)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Realism and Liberalism Déjà Vu? Some Ev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7, no. 5, p583-608.
- Tusicisny, A. (2004) 'Civilizational Conflicts: More Frequent, Longer, and Bloodie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1, no.4, p485-498.
- Vidino, Lorenzo (2005) 'How Chechnya Became a Breeding Ground for Terror,' *Middle East Quarterly*, vol. XII, p.57-66.
- Wang, David D. (1996) 'An oasis for peace: Zhang Zhizhong's policy in Xinjiang, 1945–1947.'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15(3/4):413-429.
- Wilhelmsen, Julie (2005)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Chechen Separatist Movement',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7, no.1, p. 35-59.
- Wucherpfennig, J., N. Metternich, L.-E. Cederman, and K. S. Gleditsch (2012). Ethnicity, the state and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 *World Politics*, 64 (1), p. 79-115.

陸、網路資料出處

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ARDA), THE RELIGION AND STATE PROJECT. <http://www.thearda.com/ras/>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Association of Religion Data Archives. The Religion and State (RAS) project, <http://www.religionandstate.org/>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World Fact 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最後檢索日

期:2014/5/18。

Clarke, Michael (2007) 'China's "War on Terror" in Xinjia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auses of Violent Uighur Separatism', Regional Outlook Paper No. 11.

http://www.griffith.edu.au/_data/assets/pdf_file/0005/18239/regional-outlook-volume-11.pdf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Correlates of War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Dunham-Scott, Diana L. (2012) Understanding and Engaging the Muslim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RAND.

http://www.rand.org/pubs/rgs_dissertations/RGSD301.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14/5/18

ETH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earch <http://www.icr.ethz.ch/data> Cederman, L.-E., A. Wimmer, and B. Min (2010).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62(1), pp. 87-119. 最後檢索日期:2014/5/18。

Global 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milf.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3/5/26。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4) 'Southern Philippines Backgrounder: Terrorism And The Peace Process' ICG Asia Report N°80.

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sia/south-east-asia/philippines/080_southern_philippines_backgrounder_terrorism_n_peace_process.pdf 最後檢索日期:2014/5/4。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2) 'China's Central Asia Problem' ICG Asia Report N°244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north-east-asia/china/244-chinas-centr>

[al-asia-problem.aspx](#) 最後檢索日期:2014/5/4。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2) 'The Philippines: Breakthrough in Mindanao' ICG Asia Report N°240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south-east-asia/philippines/240-the-philippines-breakthrough-in-mindanao.aspx> 最後檢索日期:2014/5/4。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13) 'The Philippines: Dismantling Rebel Groups' ICG Asia Report N°248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south-east-asia/philippines/248-the-philippines-dismantling-rebel-groups.aspx> 最後檢索日期:2014/5/4。

Karim Bahgat and Richard M. Medina (2013) An Overview of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in Terrorism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7, No1: 50. <http://www.terrorismanalysts.com/pt/index.php/pot/issue/archive> 最後檢索日期:2014/5/18。

Maliach, Asaf (2006) Islamic Terrorism in the Philippines-an Updated Perspective. <http://www.ict.org.il/Articles/tabid/66/Articlsid/214/currentpage/21/Default.aspx>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Minority At Risk Project <http://www.cidcm.umd.edu/mar/>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http://www.nctc.gov/>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NAVCO Data Project

http://www.du.edu/korbel/sie/research/chenow_navco_data.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Nye, JR, Joseph S. (2006)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6/02/22/think_again_soft_power 最後

檢索日期:2014/5/9。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http://www.terrorismanalysts.com/pt/index.php/pot> 最後檢

索日期:2014/5/9。

PITF State Failure Problem Set, 1955-2012 Ethnic Wars 2012,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Quaker Council for European Affairs (2007), *Effective Counter-Terrorism,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European Union Responses*, p.6-7,

<http://www.qcea.org/wp-content/uploads/2011/04/rprt-counterterrorism-en-feb-2007.pdf> 最後檢索日期:2014/7/8。

RAND-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

<http://www.rand.org/nsrd/projects/terrorism-incidents.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Scher, Gideon (2009) 'Chechen Jihad: An Analytical Overview' Legacy Heritage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http://www.ict.org.il/Articles/tabid/66/Articleid/743/currentpage/11/Default.aspx> 最後檢索日期:2013/5/26。

Shichor, Yitzhak (2007) *Changing the Guard at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986.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Singh, Bhavna (2010) 'Ethnicity, Separatism and Terrorism in Xinjiang,' IPCS special report.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http://www.ipcs.org/pdf_file/issue/SR96.pdf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START databas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http://www.start.umd.edu/gtd/>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ICT) database,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in Herzliya, Isreal <http://www.ict.org.il/>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http://www.state.gov/j/ct/rls/crt/index.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03) *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2*

<http://www.state.gov/j/ct/rls/crt/2002/pdf/index.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s of State (2013)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2*

<http://www.state.gov/j/ct/rls/crt/2012/index.htm>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中國分離主義運動網站整理

http://www.geocities.ws/guoshiren/separatist_movement.html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俄羅斯全國 2002 人口普查資料 <http://www.perepis2002.ru/index.html?id=87> 最後

檢索日期:2014/5/9。

俄羅斯行政區畫地圖

http://www.vidiani.com/maps/maps_of_europe/maps_of_russia/administrative_map_of_russia.jpg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美國政府印務局網站 <http://www.gpo.gov/fdsys/pkg/CFR-2010-title28-vol1/pdf/CFR-2010-title28-vol1-section-0-85.pdf>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網站 <http://www.fbi.gov>

[//www.fbi.gov/albuquerque/about-us/what-we-investigate](http://www.fbi.gov/albuquerque/about-us/what-we-investigate) 最後檢索日

期:2014/5/9。

菲律賓國家統計局 2012 及 2003 人口普查資料

2012:<http://www.census.gov.ph/statistics/census/population-and-housing>

2003:<http://www.census.gov.ph/content/autonomous-region-muslim-mindanao-nine-every-ten-persons-were-muslims>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菲律賓總統辦公室下設「總統和平進程顧問辦公室」網站 (Office of the

Presidential Adviser on the Peace Process, OPAPP) <http://opapp.gov.ph> 最後檢索日期:2014/5/9。

新疆統計信息網 <http://www.xjtj.gov.cn> 最後檢索日期:2013/7/6